YISELIE
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墓园之花

——我的舅妈施劳姆津

〇[以色列]约拉姗·坎纽克/著
〇沈志红/高穗/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YISELIE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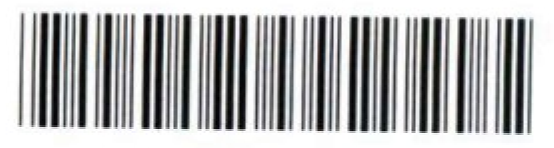
墓园之花

——我的舅妈施劳姆津



ISBN 7-80647-236-3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墓园之花

——我的舅妈施劳姆津

○[以色列]约拉姗·坎纽克/著

○沈志红/高穗/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墓园之花－我的舅妈施劳姆津/[以色列]约拉姗·坎纽克著；
沈志红，高穗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以色列文学丛书)
ISBN 7－80647－236－3
Ⅰ．墓… Ⅱ．①约… ②沈…③高… Ⅲ．长编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135 号

书　名：墓园之花 ——我的舅妈施劳姆津
作　者：[以色列]约拉姗·坎纽克 著
沈志红　高穗 译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875
字　数：13 万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00 元
ISBN 7－80647－236－3/I·168

邮政编码：330002

序

高秋福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色列文学独具特色：流短而源长，物阜又人旺。

所谓"以色列文学"，严格地讲，应该是构成以色列国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总称。在以色列各民族的作家中，绝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犹太人，也有少数用意第绪文和其他文字写作的犹太人，还有一些用阿拉伯文写作的阿拉伯人。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国民的主体，而绝大多数犹太作家是用民族语言希伯来文写作的。因此，用希伯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以色列文学的主体，是以色列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

以色列是 1948 年建国的。以色列文学迄今只有五十年多一点的历史。因此，我们说以色列文学"流短"。但是，以色列文学上承迄今至少有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古典文学，积淀深厚，因而我们又说它"源长"。希伯来语从古至今一直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纪元前产生的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公元二世纪前后，犹太人因兵燹之灾被迫从长期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流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语渐趋衰微，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几近中断。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

起，大批犹太人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移居巴勒斯坦地区，流徙世界各地一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的现代希伯来文得到复兴。这样，现代希伯来文学才有了发展的机遇。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之后，现代希伯来文学真正踏上了复兴和发展的道路，并迅即带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重新跨入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一时间，以色列文坛上真可谓"人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同时也可谓"物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代文坛上也熠熠生辉。

以色列文学的成就当以诗歌和小说最为突出。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深受犹太民族独特历史和以色列国独特经历的影响。因此，以色列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视角。其一，悠久的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以及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文化，总是以色列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其二，犹太民族流亡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漫长而独特的流散与回归的过程，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强烈的反映。其三，大批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地区之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重建家园，创办了独特的农业集体村社"基布兹"。基布兹的成员集体劳动，各尽所能，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生活物资。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对不少犹太人、特别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影响。其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对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犹太人大肆屠杀，罹难者有六百万之众，占当时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文学中，以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为题材，出现了揭示犹太

民族悲苦命运的独特文学流派——“大屠杀文学”。其五，从1948年到1982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五次规模不同的战争。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色列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不尽相同，对吁求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也存在不同的主张。这些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六，以色列文学既承袭了历史悠久的希伯来文学的传统，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时，由于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色列早期的作家受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而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则在以色列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之，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经历极为独特，这就构成了以色列文学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的极其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作为以色列文学主脉之一的现代希伯来诗歌，由被称为“犹太民族诗人”的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发其滥觞，随后有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阿维拉汉·本-伊扎克、戴维·沃杰尔等杰出诗人崭露头角。以色列建国之后，作为移民的犹太人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民族战争与建设新生活的活动中融合在一起，从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新的民族观念、新的艺术和审美情趣的诗人。其中最引人注目有耶胡达·阿米哈依、艾米尔·吉尔博亚、丹·佩吉斯、泽尔达·什纽尔森·米什考斯基。七十年代之后，出现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诗人，其中的佼佼者有迈尔·威泽蒂尔、约翰·瓦拉赫、艾哈隆·沙布泰。他们运用越来越纯熟的现代希伯来文，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前人的大量诗歌作品。

作为以色列文学另一主脉的是小说。在希伯来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年代登上

文坛、六十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莫尔·约瑟夫·阿格农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以色列建国后,同诗歌一样,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新人不断涌现,接连推出佳作。有的文学史家将五十年来以色列的小说创作粗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多数作家是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犹太移民,少数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在基布兹里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后来参加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和民族立国的使命感。有的文学史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独立战争作家群"。本杰明·塔木兹、阿哈隆·梅吉德、伊扎克·奥帕兹、摩希·沙米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从1967年"六日战争"到1982年入侵黎巴嫩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以色列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形成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敢于大胆描写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凸现个人的作用。有的评论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社会生活作家群"。其中最有名的是约拉姆·坎纽克、阿哈隆·阿佩费尔德、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约书亚、约书亚·肯纳兹。第三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批东方犹太作家和女性作家在以色列文坛上崛起。他们对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极为关注,但写作上大多采取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萨维昂·利布莱希特、奥丽·卡塞尔-布鲁姆、叶胡迪特·卡切尔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作家群的形式及其主要创作倾向上来说的,并非没有争议。实际上,以色列文学的历史太短,不少作家实际上跨越了其中两个甚至三个时期。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的民族,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是,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

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长期受到阻隔。八十年代末，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改善。1992 年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些作品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就我所知，这些被介绍过来的作品大多是单本形式，还没有较系统地以多本丛书形式出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提出了出版以色列文学丛书的设想，得到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同意用几年时间，把以色列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他们对以色列文学发展的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过程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安南副社长和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都希望我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在中国同以色列建交过程中曾奉命多次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的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多有接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科恩女士，并同她探讨如何把以色列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说实话，我对以色列文学了解不多。因此，真的要担负起这套丛书的主编之责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惶恐。我惟愿认真把这套丛书编好，以不辜负他们的信托和希望。

这套丛书的选本大多是由希伯来文转译的英文本，个别是由意第绪文转译的英文本。不少英文译本中夹杂着一些希伯来文、意第绪文、阿拉伯文，甚至法文、德文、拉丁文词汇或语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我国一些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丛书的编选和翻译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尚祈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00 年 7 月 30 日于北京新华园

第一章

内海米亚舅舅去世那天，天气很热。就连那些曾经见过罗斯切尔德男爵在里肖停留的老人们都坚持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的天气。人群从四面八方乘着小汽车和巴士赶来，车后面卷起一阵浓密的尘土，与摇着钱罐的乞丐混合在一起。人们缓慢的姿态仿佛凝固了一般。内海米亚的老伙伴们念及他们年轻时的友情，来的时候都穿着醒目的礼服，打着领带。他们的衣服隐约有些透明，仿佛显露出身体中自负的灵魂。他们沿着泛着微光的碎石子路走着，希望能够领悟自己身上的渴望与绝望。衣着考究的白发妇人们戴着抢眼的阔边夏帽，一边战战兢兢地往前移动着身体，一边朝乞丐的罐子里塞着硬币。她们仿佛是用烧焦的黄土和香槟酒做成的一般，用测量好的步子朝着庇荫的地方移动，看上去像是飘浮在热浪里。

我们在远处就可以看见施劳姆津大舅妈。她身着一袭光彩照人的黑色礼服，就像一只黑色的乌鸦那么漂亮。给施劳姆津大舅妈做了四十年衣服的老维索夫斯基太太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一边从挎包里抽出一块淡粉色的手绢，擦着鼻子，一边用一种平滑的、如水晶般透明的声音对我说：阿米那达夫，连眼泪都融化了。真是没用……我们就像一些从剪报本上剪下来的碎纸片，连模样都看不清了。看看我们这辉煌的一代，还剩下些什

么。我们的眼泪都融化在热浪里。

乞丐们用空洞的声音喊着:施舍可以补偿死亡,施舍可以补偿死亡。疲惫的鸟儿在空中盘旋,随后就消失了。一具尸体被人从停尸房中抬出来,后面跟着一群穿黑衣的男男女女,火一般酷热的广场上充塞了他们的恸哭声。施劳姆津大舅妈仍然那样光彩照人地站在那里,带着有节制的愤怒看着那些哀号的女人们。她转过身,对小施劳姆津妈妈说:那个人本来可以支撑到明天再死的,可是这些家伙们都等不及了。人们总是这样差劲儿!

维索夫斯基太太叹了口气,对我说:她穿着我缝的那件衣服是不是很美?她前几周到我这儿试了三次衣服。在她死之前,她会先到墓地里,躺在地上,把坟墓的尺寸量好。她喜欢完整的东西,但她却把人们拆散、打碎。让她满意可真难啊。她来了一次又一次,直到衣服完全合适为止。她的体型做衣服很难。

在一张破板凳旁有一株正在开花的无花果树,人们拥挤在树荫下,朝施劳姆津大舅妈站的方向望着。我想,那个从"快乐巴黎沙龙"来的女裁缝维索夫斯基太太一边在她的心里盘算着谁该留下,而谁该走,一边在向我暗示,施劳姆津大舅妈为了这一刻已经处心积虑地做了准备。她的话音中有一丝恼怒,但又似乎是崇拜。除了小施劳姆津妈妈之外,她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还能和施劳姆津大舅妈保持良好的关系。卡比洛维茨一家挤在一起,面色苍白,穿着在柜橱里锁了二十年的贵重衣服。他们说:她在痛苦中却仿佛胜利了一般;她理解死亡……我们的施劳姆津。

等到那些哀哭的女人们一离开,施劳姆津大舅妈便转向那些穿黑衣服的流浪汉,他们原本正挤在一株爬墙虎的树荫下,吮着冰镇汽水。她一点儿也没有讨价还价。她平生第一次同意照价付钱。作为报偿,他们将为内海米亚舅舅祈祷。价值二十块

钱的祈祷。不是十块,也不是十五块……热烈的祷告,祷告词中上帝的名字要清楚地念出来。他们全都来到停尸间,然后在施劳姆津大舅妈的示意下,朝墓地走去。热浪如石头般沉重,令人感到压抑。施劳姆津大舅妈的额头上见不到一滴汗珠。她望着丈夫的遗体,只差一个月,他们结婚就满四十年了。他们的婚姻异常美满。即使周围是一片悲伤,她丈夫的遗体此时却仿佛沐浴在一片突如其来的光亮之下。她用眼睛估算着来了多少人;她的目光越过内海米亚的遗体,把人们重新排列着,在一个又一个人身上堆积起层层仇恨。她点着人数,略去小孩子,却着重数着那些没来的人。她清点着所有老特拉维夫人,在心中减去那些已死的人。当她意识到老施姆洛维奇已经去世了,就葬在附近,因而无法出席葬礼的时候,她的心中很漠然。不管怎么说,她不能完全原谅他。她继续数着那些虽没有去世却没到场的人,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混合着敌意埋在心里,同时也在心中掂量着自己有多么美丽,在这方面她毫不畏惧,丝毫没有任何妥协与疑问。她的美貌和那身考究的衣裙如此相配,与她面前这群被热浪煎熬得又疲倦又痛苦的人们相比,她的美貌显得那么突出。流浪汉们用价值二十块钱的声音祷告着,两个地位显赫的老人由于在内海米亚年轻时与他相识,因此也随着念了几句。

强烈的渴望停留在空气中。声名显赫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他们也曾经是孩子。树梢垂到地面。树根却朝空中飞扬,猛烈地扫过人群,朝着充满炮火和希望的年代飞去。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瘦男人穿着敞怀衬衫,谈论着内海米亚在科学方面的前沿地位。每个人都在猜想:这个人是谁?一个有希望的遗产继承人……或者是施劳姆津大舅妈给了大学一大笔钱,才换得了这番演说?

他似乎游离于这些老人之外,很可能无法体会他们身上的

消沉。他说，内海米亚天性中既有对事物的好奇心又有一种纯真，这正是产生艺术家、圣徒、科学家和伟大的罪人的特质。他谈到生物的染色体和真菌。施劳姆津大舅妈没有在听。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一伙脆弱又满布伤痕的人们。我注意到凯齐亚刚刚停止了哭泣，正擦着额头上的汗，悄悄地朝她丈夫的墓地走去。她手里拿着一个花圈，在坟墓之间显得焦躁不安。在远处，施劳姆津舅妈带着明显的敌意看着凯齐亚。鸟儿再一次在头顶上盘旋，周围是充满着死亡和威胁的寂静。热空气压在我们身上，浓重而苦涩。一架飞机缓缓掠过天空，一度打破了寂静，但随即寂静又占了上风。飞机投下一个黄色的阴影。灯光——或者说是光柱——像剑一般刺破天空。杰尼彻维茨大夫说：可怜的施劳姆津。内海米亚走了，他走得太快了。我们到这里来得太经常了。我们把这些一度曾经像我们一样美丽的孩子们留在身后，他们已经疲倦，躺在冰冷的泥土里。这是一种惩罚。他冲着内海米亚说着。施劳姆津大舅妈饶有兴味地看着他，因为并没有人要求他说话，可他依然说着……他发自内心地说着，向所有在场的人说着；他们现在正挤做一团，彼此依靠着，渴望着突然到来的亲密感。他说：亲爱的内海米亚，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们是被荒废了的一代。看看我们曾经希望过的、梦想过的东西，再看看现实。我们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了！你，内海米亚，有过很多成就；你甚至还恋爱过。我们原谅你了吗？我们理解你吗？在你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持过你吗？我熟悉很多梦想，也熟悉很多已死的人。我还认识多少活着的人呢？

施劳姆津大舅妈的身影中蕴涵着经过掩饰的责备。我想：她仍然在考虑是否应该由我来祈祷。她的儿子不在。她一直等到差一刻四点。所有从纽约来的航班都已经到达了。她在机场

过的夜。在电报里他曾说，他会尽量来的。她不肯给我们看那份电报。我猜他在电报里都结巴。我表兄不敢来。不过她依然不肯让我这样的人来念祈祷。她曾经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如果他这么想祈祷，让他冲着自己父亲说好了！妈妈说：可是纳夫塔里还活着呀！施劳姆津大舅妈回答：活着，还能活多久呢？阿米那达夫的祈祷对纳夫塔里很合适，对内海米亚却不行。内海米亚应该得到只有国王才能有的祈祷，不过为了他，我宁愿勉强让我那该死的儿子来念祈祷；可他却不肯赏脸，他会为此后悔一辈子的。她一度很兴奋，但很快又恢复了她那有节制的哀伤。这表情对她很合适。

施劳米特婶婶说：她选择了这样一个天气！她想看着人们受苦。人们开始散去，他们的眼睛被眼泪和热浪刺得发疼。凯齐亚仍站在她丈夫的墓地旁边，从一朵凋谢的红花上撕扯着花瓣。这个半透明的老妇人对她已死的老伴儿念叨着：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施劳姆津舅妈几乎跪下。她看着凯齐亚，走过去，仿佛要拥抱她。然后她转向我们，吼道：谁爱了？什么爱？内海米亚已经不在了，谁能去爱凯齐亚呢？她靠在妈妈和我身上，缓缓移动着。卡比洛维茨夫妇说：多么伟大的爱！她那光彩照人的身影在某一刻变得模糊起来，甚至要瓦解。我说：施劳姆津舅妈，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她回头望着空旷的墓地，在那里，逝去的岁月一层层地堆积，一排排的人正踏在内海米亚的坟墓上，顽固地从他那里窃走了另一个瞬间。对他们眼中显而易见的痛苦和渴望，她并没有注意。她看见了她的敌人。她说：他们还活着，而他却得死。她揩去了一滴眼泪，这滴眼泪在那一个特殊的时刻出现，然后就消失了。她又说：他们在意吗？他们什么也不在意。他们在乎内海米亚吗？他们原以为天气会很好，会有一场盛会，而我

就可以原谅他们。他们带来多少花？全是些旧花，从其他坟墓旁拿来的。阿东斯基去世的时候，身上盖的不都是特拉维夫墓地中的花吗？

小施劳姆津妈妈和我都没有回答。她爬进阿米胡德·米尔奎特的车子，嚷道：他们现在可以笑了，戴着小玩意儿，住着用我的钱买的房子。可是内海米亚却要呆在这儿。说完她的车便开走了。

一群如大人般的孩子看着她离去。他们每个人都在找庇荫的地方。他们面色苍白，疲倦，在热浪的驱使下朝汽车、出租车、巴士跑去。广场上空无一人。

接下来是七天的举哀期。我们看着内海米亚的照片和勋章，几乎不说什么话。妈妈端上从自己家里拿来的咖啡。施劳姆津大舅妈说，他们不配喝她厨房里煮出来的咖啡。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时不时地，她会取出内海米亚舅舅和她父亲阿东斯基的照片，这是他们绝对美貌的证明。

第二章

人们管她叫大施劳姆津，因为她比施劳姆津妈妈大四岁。小施劳姆津妈妈是内海米亚的妹妹，她的个子比施劳姆津大舅妈要矮。内海米亚死于 1961 年 9 月。他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施劳姆津大舅妈现在住在特拉维夫惟一的一所私人医院里。她的房间每个月的费用是一万二千里洛特。那些自认为能继承她财产的人们已经彼此结为盟友，他们各自守在不同的角落，他们的希望正在破灭，梦想正变得黯淡。他们彼此微笑着，那是一种彬彬有礼而又呆滞的微笑。他们的耐心正逐渐消失。他们用漠不关心的语调给小施劳姆津妈妈或者医院打着电话，竭力掩饰着他们那疯狂的企图心，希望能够探知施劳姆津舅妈确切的死期。

每天上午，就好像是巧合一样，他们中间某一个人就会来到某家银行，打探舅妈的经济状况。他们随便挑选城里几家银行中的任一所支行，然而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无法让他们放心。她的财务系统太过错综复杂，除了大脑日渐僵化的舅妈本人之外，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她现在有多少钱，过去有多少钱，将来还剩多少钱。她把资金投在公债、债券、储蓄存款，以及与美元挂钩的短期贷款上。那些似乎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们说，巨额资金以多种神秘的货币形式保存着。

老练的律师们彼此打着电话，用愉快、但又微微颤抖的声音持续着冗长而轻松的谈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年轻时起便与施劳姆津相识。他们试图弄清楚自己的地位，他们想搞清自己是不是大施劳姆津真正的代表，还是仅负责照顾她的一部分财产，抑或从来没有真正被委派照顾过她的任何财产。他们古旧的办公室中排列着书架，上面摆满了落着尘土的厚厚的法学著作。旧证书、本－古里安和英国高级专员的画像，以及与名人握手的照片将屋子遮蔽得黯淡无光。他们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试图用巧计挑出彼此的错误。他们头发花白，脸又皱又红。当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手在颤抖，他们的目光斜睨过空洞的窗户，向被废弃的街道投去。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抹去。现在和从前完全不同了。那些年轻机智的律师坐在其他街道中的新建的办公室里。老家伙们已经被人超过去了，他们最多不过是一些飞逝的影子，与那些驾着漂亮的赛车、冲劲儿十足的小伙子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多么希望能留住一些他们年轻时旺盛的活力，他们那时的时光完全被施劳姆津和阿东斯基所占据，在我表哥名字的问题上他们曾争论不休。

施劳姆津舅妈认识很多律师。她这一辈子都在雇律师，雇了一个又一个。她偷偷摸摸地与那些现在已经上了岁数、但那时都很年轻卤莽的律师会面。她给他们签署秘密指示，写一些莫名其妙的神秘的命令。她写过五份自相矛盾的遗嘱，把它们存放在保险柜里。她把保险柜的一部分密码透露给她自己的律师所不认识的另外两位律师，而其中的重要部分则由一位年长的法官掌握，此人这些年来因慢性病而住在拉那那的医院里。很多年以前，当这位先生还年轻的时候，他碰巧有一次在雅法的柑橘园中散步，一边散步一边采着花。这时他恰巧遇见施劳姆津从海边回来，法国军舰刚刚向德国人瓦格纳的工厂发射了五

枚炮弹，施劳姆津正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状态之中。

我心想：我要破译那份密码！想像一下，施劳姆津该会有多沮丧。法官也会惊奇，如果他还有能力惊奇的话：阿米那达夫？怎么会是他？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注定会死去。那些继承人也不知道。他想：她那时很幸福。那差不多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施劳姆津真是个漂亮姑娘。他依然将不常见的花朵制成干花。架子上满是花……没有人可以赠送，于是花都碎了。他独自一人坐在轮椅里，微笑着：这么多密码。这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还有那些信件的副本，其中只有某些能看清楚，其余的则令人莫名其妙。但如果把片段拼接在一起，就可以看清楚了。这些东西有的留在小施劳姆津妈妈那儿，有的在她住在芝加哥的哥哥手中。更甭提那些不知名的代理人们，他们整个晚上忙碌着，到了第二天早晨又要迎接新一轮的指示。

施劳姆津并不为她房间一个月一万二千里洛特的价格感到后悔。生命在过滤到她身上的时候被仇恨中和掉了。她看着我妈妈柔和的面庞，看着焦急的护士、树木、窗户，以及建筑在属于她父亲阿东斯基的土地上的房屋的屋顶。这块地在出售的时候价钱非常昂贵。

由于对自己所度过的一生感到失望，医院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对施劳姆津大舅妈很有吸引力。她今年六十七岁。她坚持认为医生爱上了她，虽然她并没有理由这样认为。用她的话来说：那个迷人又聪明的年轻人正为我“神魂颠倒”呢。施劳米特婶婶每天从一个护士那里得到报告，她以所有试图接近施劳姆津大舅妈的人所特有的语调说：舅妈不可能看到医生的“神魂”。因为：第一，她的视力不太好；第二，年轻医生在为上了年纪的女病人检查的时候总是心神不定。

医生今年四十二岁。他灰色的头发修剪成很时髦的样子。目前，她喜欢这种梳理得很干净、甚至有些甜蜜的样子。医生给她的印象是出身一个很好的家庭，不是那种从边远地区来的、靠成绩好而成为医生的人。有几样东西她根本无法忍受：神经质的年轻人为狂热的激情所驱使，想要改革世界，实现他们的目标。她喜欢那种很平和的人。她讨厌、拒绝……甚至连这也不准确。她满意、或者说接受了这位医生。就是这样。不过我几乎中了别人的计了，我的主角是大施劳姆津。她可是独一无二的。

每天，在常规检查之外，这位相貌英俊又家教良好的医生为施劳姆津再多做一次检查。由施劳姆津在芝加哥的哥哥付给他美元。施劳姆津指示她哥哥，必须把钱准备好，不管这笔钱的数目有多大。这些指示经由一位有名的律师交给他，再由一位著名的公证人公证过。这份文件进一步指明：你没有对此事发表意见的权利。在某一个合适的时间，通过这个或者其他的渠道，你会被告知你的服务所应得的报酬，此外还有我对你的关心。

她不愿意与她哥哥联络。人们把她当做阿东斯基惟一的孩子，而她哥哥的出生只不过是一次不值一提的失误。1917 年，她哥哥不顾她的请求，抛弃了以色列，去了美国。对此，她永远无法原谅。她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她来到她哥哥身边，向他宣布：如果你真的走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他嘲笑着小妹妹的傻话，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就走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理过他。她没有去过美国，而他也没有来过她的国家。

在内海米亚的葬礼上，她哥哥生平第一次感到看着别人、却不被别人看的滋味。

他现在是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意识到，她托付给波

士顿的名律师的那笔钱的金额实际上有多么庞大。他可以使用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但只用于前面提到的那笔需要支付的款项。他赶紧给她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思乡情绪的信。他希望在将近六十年后,他们能重归于好……他这样写着:他们的生命不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吗?除了那纠葛缠绕的家族血缘的纽带,除了那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记忆,还有他们伟大的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财产,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

她通过她的律师回信说,她事实上已经意识到他这种偏执、肤浅、且不用说毫无美感的伤感来自何处了。而且,如果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濒死的边缘,他也应该指派一个年轻人,把那笔该支付的款项管起来。首先,她还不想死。她现在正住在一所医院里,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她对他所提到的那些记忆丝毫没有兴趣,这些东西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共同点。一个人必须首先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然后才配得上跟她分享记忆。她不准备原谅他的背信弃义。她警告他,不要随便使用她父亲的名义,因为她在书写遗嘱的时候可能会患上一种慢性健忘症。

第三章

施劳姆津舅妈大约一年前住进医院。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她告诉我说,那是一个星期三,老纳忽米老师像往常一样,碰巧从她房子前面经过。于是,纳忽米便顺便来拜访,向她询问能否让他看看内海米亚的集邮册。纳忽米过去常常教施劳姆津大舅妈跳民间舞蹈,还有唱爱国歌曲,但现在他已经佝偻得快触到地了。她像往常一样回答说,她不能允许她的邮票在每个礼拜三都遭人盗窃。她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说,纳忽米并不就此死心。十年以来(或者更长时间),除了生病或者有事以外,他每个星期三都要来看邮票。他为什么来?我为什么应该同意他看我的邮票?他盯上了那些从葡萄牙寄来的三角形邮票。我告诉施劳姆津,那些邮票并不很值钱,她的藏品中有些比这值钱得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并不是每枚三角形邮票都值钱,我说道。她瞪着我。我赶紧又补充上一句: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内海米亚舅舅曾多次向我展示过他那些美妙的藏品。其实她自己对此也很清楚。她干巴巴地说道:自打那以后,十五枚邮票就不翼而飞了。它们很可能值一百五十个银币。和往常一样,我并不对她的指控作出反应。我解释说,我本人并不相信纳忽米会想要偷邮票。直到这时我才说出她想要听的那句话:邮票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他能看

见什么？自从1912年以来他就一直在爱着你。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和你一起喝茶，用他近乎失明的眼睛吸吮你的美貌。

施劳姆津舅妈轻蔑地说：这些肮脏的老头儿！你以为他是来喝茶的？他会把我推到床上，弄出个孩子来！这个白痴！

施劳米特婶婶有一次竟然敢暗示，七十六岁的女人不太可能会怀孕了。为了这句话，她一直到今天都在后悔。

在那个特殊的礼拜三，当老纳忽米消失在视线以外之后，施劳姆津大舅妈便坐在她那巨大而空旷的房子里，既不带热情也不带宽恕地凝视着那些被内海米亚抚摸过的家具，以及那些他读过或者写的书。她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笼罩在从屋顶的微小光源中射来的一束光线里。她把所有的灯都换成了小号的，以她的话来说，是为了保护我那日益减少的资源。她在做着她一生里做得最多的事，那就是：什么也不做。在她冷清的房间里，施劳姆津大舅妈坐在窗前，在她周围是镶金框的精美图画、旧书架、证书和勋章、集邮册、旧晾衣架，衣架上还挂着内海米亚的帽子和制服。她坐在那里，心里满是怨恨。电话没有任何动静，窗户也都关着。就在这时，死亡突然出现了，就站在她面前，逼真得仿佛可以触得到。她注视着它，希望能够对它说：你找错地方了。她全身疼痛，心脏开始剧烈地搏动。她感到虚弱，好像正在穿过一片浓重的雾霭，跌入无底的深渊。

她的眼睛从过去到现在都非常美丽，黑色的眼珠嵌在紫色的眼眶里。她的头发花白，但仍然很光滑顺畅；皮肤年轻而紧绷，腰板笔直，胸脯丰满而富有曲线。她细嫩的皮肤有一种隐约的红晕，这是一种身体走向衰败时的象征；但由于她身体纤细而结实，使这显得不太明显。用施劳米特婶婶的话来说，她是大自然的奇迹，历经岁月，滋味丰美，成熟而丰厚，像经年的醇酒一样。施劳米特婶婶总是用一种既喜悦又羡慕、又痛苦的眼神望

着施劳姆津舅妈，只有一个将近七十岁的女人望着另一个七十六岁，但仍然健壮、漂亮，精神饱满、富于女性的诡计，但又充满趣味的女人时才会有这种感觉。

有谁能不被施劳姆津舅妈独特的美所打动呢？只有施劳米特婶婶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只有邪恶本身，当它为自身所陶醉和迷惑（比如施劳姆津舅妈），一生都站在舞台耀眼的聚光灯下，成为对所有负面特征的否定时，它便可以免受肉体的腐坏和岁月的劫掠。施劳米特婶婶是在经受了四十多年的折磨后才悟出这句话的。施劳米特婶婶说，施劳姆津上了岁数以后更像陈年老醋，而不是陈年老酒。施劳米特婶婶总是醉心于发酵方面的事。她阅读所有可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书，在谈话时也反复提到发酵与食物的保存。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的丈夫阿伯纳已经去世。大施劳姆津已经赶走了她。她满怀眷恋地怀念着她父亲留给她的老式座钟，那座钟走走停停，然而没有必要修理它。她坐在阳台上，读着有关发酵的书，内心抚弄着关于海的记忆；那时，从这里就可以望见海……那是在建这所新房子之前了。她对瑞肖－勒－津和兹克隆·亚可夫酒很在行。她的阳台上堆满了瓶子，瓶子里满是泛着绿毛、溢着腐臭的液体。她说，我们都曾经是阿米巴虫。

小施劳姆津妈妈说，如果施劳米特婶婶没有被施劳姆津大舅妈“打入冷宫”的话，她是不会说出那样的话的。这就是那些盲目追随舅妈可是又一无所得者的命运。

看看她对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对我们所有人都做了些什么，小施劳姆津妈妈悲哀地说道。

从正在上升的迷雾后面，施劳姆津大舅妈看到死亡正穿透她封闭的城堡。她在所有门上都上了双重插销，窗户也用最复杂的装置封好，然而没有任何锁能阻挡住死亡。想到这一点，她

便无法对那些普通的保护措施放心。她回想起那个美妙的时刻，那个年轻的法国军官刚刚登岸，那是在军舰朝德国人瓦格纳的工厂的方向发射五枚炮弹之前。她对自己说：没有人值得信任。

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青春已逝，封锁在匣中。一个堪称样板的女人。她望见死亡爬上无花果树，跃上九重葛的枝条，从那里又上到隔壁四层楼的屋顶。她想大声叱责它，对它说：就连那个可怜的民歌手纳忽米也不曾因为她而爬墙呢，他至少还假装是对邮票感兴趣。用点儿小手腕，我亲爱的。这不要紧的，她想。她因为身体疼痛而呻吟，这疼痛来自某些东西的碎裂，即使它们在企图修正错误、寻求友爱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街对面是一座漂亮的四层楼房，房子的正面从施劳姆津舅妈的院子里是看不到的。房子修筑得像是希腊神庙的纸板模型，很有特点。它为什么不到那儿去找个倒霉鬼呢？

可是他们全都走了，马克斯一家人，奈文塔尔一家人，卡兹一家人都走了。从前，这个地方还不错……那时列维医生住在那儿，还有三只纯种猎狗，他总用德语说："喂，施劳姆津夫人！……你好，施劳姆津夫人。"他们全都走了。现在呢？房子里住的净是些小出版商、前途广阔的律师，还有穿着短裙的秘书。秘书们带着可笑的活力，为并不存在的客户敲着一式三份的信函。庭院荒芜，垃圾遍地，灌木和树木无控制地疯长，野猫的嗥叫充塞了清朗的天空。她被昏厥所湮没，内心感到悲伤(这是一种她所不熟悉的感觉，以致她并没有意识到她正在悲伤)，为那些毫无原因就被抛弃了的房子；为那一度华丽的庭院，那时那里满是身着短裙的女秘书，在打字机上敲着一式三份的信件，信件的地址她们无法查证；为那些装饰着风景画和旧挂历的丑陋的房间；为那些出小本美术书的出版商，他们的书就在原先卖

水果汁、花蜜、凉橘子和柠檬水的小亭子里出售。死亡继续沿着九重葛爬着，扫过她周身时的受辱感比疼痛更让她紧张。于是施劳姆津大舅妈拨通了给医院的电话，她说：我是施劳姆津，请派辆救护车来，要快。

值班的医生——他那时正呷着茶，看电视台播放的电影——问她：您是谁，您住哪儿，您父亲的名字，您的年龄，您是否有医疗保险，您感觉哪里不舒服。她被激怒了，几乎忘记了死亡。她痛骂那个医生，而那医生却显得无动于衷，甚至在听完她严厉而又激烈的长篇演说之后还显得很宽容。她骂道：也许就是你，是你让死亡到我这儿来的。就像我上次在美国时，推销员挨门挨户跟人家说他们有病。推销员坑了人家的钱，然后就不见了，紧接着医生就来卖药。他们开的是同一辆车，她说。

医生默默地看着旧西部片余下的部分。小木屋里，一个女人在尖叫。警长正骑马朝一片大雾弥漫的荒地奔去。

派辆救护车来，快点儿。你给我听着，她说道，你爸爸还没生的时候，阿东斯基(我是他惟一的孩子)就建了这些城，这样你才能在这些城里把你那些还没出世的、丑陋的孙儿们养大。

医生笑了。警长来到小木屋，女孩非常高兴。戴面具的罪犯躲在门后。火车抢劫够胆大，但医生知道正义终将胜利，这是一个令人有些沮丧的事实。那种真正的笑声，那种声音伴随着微笑而表达出来的笑声，对施劳姆津舅妈来说，就像隐含着深切悲痛的绝望状态一样陌生。从来没有人在她面前笑过，医生的笑声就像一朵稀有的热带花卉一样，让她琢磨不透。

她说：你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我希望我没打错电话，错打到了动物园。然后就“啪”的一声挂上了听筒。

医生自己来了。

她知道他会来。

为了表示对医生的尊敬，她换上了一件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裙子，梳理了头发。她命令他送她去特拉维夫城北那家私人医院。她不想和那些呻吟的病人、哭泣的妇人共用房间，还有别人用过的便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住在那儿，即便她早已痊愈。她每个月付一万二千里洛特，还不算付给那个时髦的灰头发的医生的额外检查费。她送给那个值班医生一盒巧克力，这是她住院的第二天来看她的一个上了岁数的律师送给她的。她想把它用旧报纸包起来，可小施劳姆津妈妈说，旧报纸会被人看作是一种误解，而没法让人觉得是冒犯。

想想看吧，施劳姆津大舅妈说道，那个家伙正坐在特拉维夫的医院里，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他想知道我爸爸的名字。那些无赖已经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毁了。

施劳姆津大舅妈一生都站在她自己的终点线上，在镶金边的镜子中的深处充满渴望地寻找她自己。她爱她那多彩的自己，她恨这个黑白的世界。

一个孩子(施劳姆津大舅妈曾说他像“猴子一般，生来就如野猫，肯定会死于街上的某种流行病”)有一次对我说：这个美丽的老妇人可能是经过伪装的上帝。他对她的强悍有极深的印象，这种强悍延伸到纳忽米，他定期出现在她门前的石阶上，就为了被她压迫；延伸到施劳米特婶婶，她先来了，又回到她来的地方；延伸到那些行人，他们羡慕地瞧着出租车里上了岁数的律师身上的漂亮衣服，律师们焦躁地流着汗，赶到她家，然而过不了多久就满脸通红、嘴里嘟嘟囔囔地回去了。他不知道哪块地归她爸爸所有，也不晓得她们家辉煌的家史。然而，在他的世界中，施劳姆津总是一股驱动力。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没有人留给他遗产。)他告诉我说，有一次，他从商店给施劳姆津舅妈送牛奶

来,她翻遍了衣兜——她的衣兜里满是硬币——然后找出来一分钱,作为给他的小费。他不知道她为什么恰巧有一分钱硬币。他说当她给他一分钱的时候,她像天使一样的微笑着。树并没有向她鞠躬,他说。他既没把那一分钱扔在她脸上,也没对她说谢谢,他只是离开了。她则毫无疑问地认为他和他父母一样不懂事。尽管她并不认识他们,但她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他们是什么人,值多少。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施劳姆津舅妈患了流感。那天小施劳姆津妈妈在耶路撒冷,赶上一场暴风雨。纳忽米也只在星期三才来。除了他们俩和施劳米特婶婶之外,就没有人会给她打电话。施劳米特婶婶常常会在房子附近等一会儿,然后没有进屋就满怀失落地离开。施劳米特婶婶从不按铃,甚至在她来之前她就已经被拒之门外了。所以没有人取牛奶。

继承人们给她打电话。他们焦急地期待她的死期,她的生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应该说明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是继承人,还只是她在哄骗他们。小施劳姆津妈妈和我已经决定我们不当继承人。我们跟她这样讲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意见一致。当我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施劳姆津大舅妈如何谈论那个小男孩,以及那个小男孩如何谈论她时,小施劳姆津妈妈很生气。她说:她不可能是经过伪装的上帝。小施劳姆津妈妈心目中的上帝是善良、忍受、牺牲、慷慨,以及仁爱;这些都是邪恶的对立面。她是何等的纯洁。

然而,从小施劳姆津妈妈脸上,我察觉到她对于这个一生都在诅咒她、折磨她的老妇人的一种难以名状的爱。我想:因为小施劳姆津妈妈相信美是纯粹的,而邪恶则如水晶般透明,因此她也许能够爱施劳姆津大舅妈。任何纯粹和晶体的东西都使她着迷,使她充满敬畏和同情。我为那个男孩的理论辩护。那是安息日之夜,小施劳姆津妈妈和我正坐在特拉维夫海滨的

一所小咖啡馆里，望着海水。太阳即将沉入平静的海面。小施劳姆津妈妈来这儿缅怀从前的娱乐场，缅怀旧日她当选为普林节王后的时光。我们看着海浪舔着沙滩，我说，瞧，她毁了她的儿子。他生活得一团糟，口吃，婚姻破裂，他的孩子满世界游荡、寻求原谅，却不知道为什么。她虐待她丈夫内海米亚，她使每个人痛苦。我们能为她说些什么呢？还记得内海米亚临终前的日子吗？

小施劳姆津妈妈沉默着。她抿着她的咖啡，沉醉于大海无限的美丽。她也许看见了她自己，一个身着长裙的可爱的小女孩，正跑过沙滩，身后紧随着两个留胡子的年轻人……一辆驶往雅法的马车从路上过去……一小群穿着谨慎的人朝海边走着，去迎接安息日的到来。一片引人注目又蕴含魅力的景色。我说：可怜的内海米亚，他躺在那儿，只剩下一口气；他全身浮肿，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两天。医生给他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这使得他意识模糊。惟有他那漂亮的双眸闪着光亮，好似从灰暗的洞穴里向外凝视。他试着微笑。记着，她不肯给他吃酸奶！

小施劳姆津妈妈的脸阴沉下来。她放下她的咖啡，那遗忘在沙滩上的青春岁月使她感到厌恶。如今，沙滩上满是妓女、嬉皮士、士兵和渔夫。

小施劳姆津妈妈紧抿双唇，双眼圆睁，用手敲打着桌子。她激动地说着，话音中回荡着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愤怒：你不明白！阿米那达夫。她爱他。她一辈子爱过三个人：她爸爸，她从没见过面的爷爷，还有就是内海米亚。她爱内海米亚是用怜悯、暴怒、残忍和疯狂来爱的。她一生都在追求一个目标：爱内海米亚，并阻止任何人接近他。他是个很出色的科学家，对吗？他对癌症了解得很清楚。然而他依然装作听信医生们的话，他们跟

他说，他得的是严重的溃疡。他假装听信他们的话，而她则玩弄着把戏，阻止像你这样知道他快要死了、又以为喝一杯酸奶对一个快死的人来说没什么要紧的人接近他。可是，他相信那些医生，就好比抓住了救命稻草。他需要施劳姆津来禁止他喝酸奶，这样他就能欺骗他自己。这对你来说似乎很坏，好像她舍不得给他喝酸奶，但实际上这是爱的表示，阿米，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爱。难道你认为像她这样残忍的人会去剥削他吗？他在每个征兆中寻找希望，这就是一个征兆。你和你们这整整一代人一样，你无法理解爱，我妈妈说着，一边望着逐渐变暗的海水。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瞧，也许你是对的。可是他已经意识不清了，也许一点点酸奶只会给他带来一点快乐，在他还没有……别忘了，在他临死之前，当我们都坐在他床边的时候，她一直在盯着我，怕我偷她的邮票。她挨个屋子查看，检查每一个人，看看是不是有人拿她的书、邮票，或者是那套旧餐具里的杯子、餐刀。她的丈夫就只剩一口气了，而她却还对那些葡萄牙三角邮票念念不忘！

你还不如把那些邮票拿走呢，妈妈突然说道。在此之前，她的脸还是那么柔和，此时却变得坚硬而苦涩，这是五十年来和施劳姆津大舅妈相处所得的结果。她朝平台边的栏杆走去，眼睛看着远方的海，然后又回到我身边，嘴里重复着刚才的话：你还不如把那些邮票拿走呢！她干嘛要守着她那几百万块钱？她能做好多事。……可是她爱他……没有我们的份儿。我爱他爱了五十年，我是透过她的网爱他的。

小施劳姆津妈妈开始哭起来，这是多年来为这一时刻所积蓄的眼泪。她说：那些邮票是外公的。内海米亚继承了你外公的邮票，此后我们大家都帮他收集邮票。那些邮票不是她的，应该属于你，你才是真正的继承人。你长得像你外公，你是他最亲

密的亲人。可是她不肯撒手,这个坏女人……然后妈妈就沉默了。她坐在那里,揩去眼泪,又接着说:可是酸奶那件事,是你不对。

第四章

这些年来她的朋友圈在逐渐缩小。这些人既依赖于她独特的个性，又害怕被她侮辱。许多人已经死了，或者逐渐地快要死了；有些人则被绝望所压服。有几个孤独的寡妇还留在这个圈子里，另外还有两个老处女。她们和施劳姆津大舅妈之间的关系靠着日益减少的忍让而维系着，这对她们共同拥有的儿时记忆来说，是一种纪念。至于她，她谁也不放过。不过，小施劳姆津妈妈是对的：她有魅力，神秘，聪明，会使人上当，具有一种天然的、无法言说的智慧。也许该受到责备的是我们，是施劳姆津妈妈和我，因为我们没有领会，也没有能力去领会那种纯粹的不可改变的仇恨，以及那种纯粹的、毫无根据的、然而又绝对的嫉妒。她的邪恶既持久又无情，这种作恶的冲动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我们是那种一个微笑、一句温柔的话就可以征服的人。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特性，使得小施劳姆津妈妈意识到她自己身上那种痛苦而神秘的爱，这爱一辈子都被施劳姆津大舅妈压抑着。一天，我去银行，为可怜的约翰尼签一些文件。他必须要再一次将他的房子抵押出去，因为他的三个前妻和他现在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刚刚神秘地怀孕了——同时向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我朋友的事，我在为他多舛的爱情生活担忧。我把车停在了一个不许停车的地方，在附近的

一个小亭子买了瓶苏打水。天气很热,苏打水浑浑的,味道像铁锈。透过树影,我瞥见施劳姆津大舅妈那所富丽堂皇的房子,在川流不息的汽车中,在改成办公室的楼房之间,在以匆匆忙忙赶时间的人群构成的背景下,那华丽的房顶隐约可见。我回到我的车里去取文件,却发现一张罚单。在远处,一个长相甜美的女警察正在冲我咧嘴笑着。

我冲她嚷:你看,我只离开了一会儿! 她回嘴道:覆水难收啊,亲爱的。我喜欢她这句短小精悍的成语,说了声谢谢,便朝银行里走去,一边走,脑子里还想着那些女警察,她们就像棒棒糖上的交通信号那么甜。我正走着,碰上了施劳姆津大舅妈。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她生病的前一年。

施劳姆津大舅妈穿着浅蓝色的裙子,头戴大草帽,看上去像根斯勃罗的画像。她说:阿米,你在这儿干嘛? 给你老舅妈一个吻。她把脸伸过来,位置准确得好似一个训练有素的交通警,使我除了去亲吻她那既潮湿又涂了粉的脸颊之外别无办法。在中途的某一时刻她用眼睛盯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远处,她的房子看上去既孤独又悲哀,尖尖的屋顶好像小丑的帽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她的眼睛在搜寻着,我感到自己有罪,却不知道我这罪恶感来自何处,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面前,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有罪的小丑。没等她问我,我便说道:我来这儿签约翰尼的一些文件。

啊? 施劳姆津大舅妈耳朵不太好,她说话就像所有耳聋却拒绝戴助听器的人一样,大声嚷嚷。约翰尼……诺阿姆·海姆逊,伊戈尔的儿子。

你妈妈不自己来? 施劳姆津大舅妈问道。(那个女警察正得意扬扬地围着我的车打转。她是不是又打算给我另一张罚单?)她派你来监视我? 听我说,阿米,我存在这家银行的钱,只

是我所有的钱的很少一部分。这件事你又永远无法理解。

我来这儿签一些文件，舅妈。我说道。

当然！她说话的声音压过了周围呼啸的车辆。女警察看上去吓了一跳。

我是来这儿抢银行的，我无力地说了一句。也许这样她会相信我。

她没有笑。她不懂得怎样笑——就像她父亲阿东斯基一样。她也不承认有笑声。

她说：抢银行还是签文件！

我决定做得更有骑士风度一些。我伸出手来，挽住她的胳膊，和她并肩往前走。她说：阿帕沙德这只耗子！我那个一无是处的儿子！他给你写信说了些什么？他是不是想知道还有没有东西留给他？一个子儿也没有！让他在美国、在反犹主义、在异族通婚，在所有那些东西里寻找拯救去吧！

我告诉她，自从1950年以后我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我在脑子里飞快地做着加减法，然后告诉她：已经二十四年了，施劳姆津舅妈。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给每个人都写信，写了又写，她说。不只是给我写信。如果他写信，他能说什么？我警告过他，不要跟那个下贱女人结婚。现在呢？生了四个野孩子，老婆在妓院上班。

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得很好，我回了一句。二十四年写一封信也不算太多。

他给每个人写信，她说道，说的全都是关于我。可是这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又蠢又烂，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了。现在你妈妈和我儿子在一块儿密谋陷害我，想把我赶进老人院，让我和那些没牙的老妖怪和野人住在一起。听着，阿米，你只是一个小喽啰，你连他们为什么派你来都不知道。

如果这出荒唐闹剧后面不是我儿子在指使,我就不姓施劳姆津!

我一个字也没有说,与其向她证明什么,不如因为她儿子的缘故而做个密探。我们继续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被周围迷惑的目光包围,他们对这个穿蓝衣服的女人太熟悉了。站在队伍里,我看着出纳员苍白的脸,他的目光盯在施劳姆津大舅妈身上。她说:阿米那达夫来签一些文件;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没错。我同意道。

文件?那个皱缩得像老羊皮纸一样的出纳员没有听清楚我的话,高声尖叫:文件!一瞬间,整个银行大楼一片寂静,所有的眼睛都盯向他。他脸红了,开始用手指拨弄一些单据,然后又擦擦额头上的汗。他努力想搞清楚施劳姆津刚才的话的意思,于是开始低声咕哝:什么?怎么弄的?为什么?在哪弄的?什么时候弄的?

他的朋友的文件!施劳姆津舅妈用她那洪钟般的声音大声说。

约翰尼的文件,我说道,诺阿姆·海姆逊。

什么?

可怜的诺阿姆·海姆逊,我重复道。

啊哈!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得救了。银行恢复了它从前的节奏。文件就在这儿,他敢肯定。她跟这个年轻人在一起干什么?出纳员又恢复了他的活力。

我用颤抖的手在递到我面前的文件上签了字。

她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我。

你的手在打颤,阿米。你应该去看医生。不是那些给你妈妈看病的劣等医生——他们都是贼,去找列文大夫,他是我惟一信赖的医生。

我把文件交给出纳员,将钢笔放回我的口袋,笑了。她又把

我带回到现实中。我对她说:施劳姆津舅妈,列文大夫两年前就去世了。我来接你去参加葬礼,你跟我说,你病了;你还说,一个死医生的诊断并不比一个活医生的诊断强,那个列文大夫活着的时候也没作出什么像样的诊断。你当时是那么说的。

我跟你去了?

没有,你没去。

那些无赖都死了,一个接着一个地,她说道。她的声调既不生气也不高兴,像导游一样无动于衷。律师是不会死的,她宣布。老纳忽米和律师们将永远活着。阿米,他为什么死了?他为什么一定要死?我已经知道了。我因为他给我开的那些没用的药水而冲他嚷了足足一个钟头。他发了心脏病,然后就死了。

那是更早以前的事,我说。他死在旅途中,有一个年轻女人陪着他。他死得像个男人。我总是被她那毫无感情的凝视所击中,被她那冷漠、锋利如利刃般的目光所击伤,我补上一句: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她没出声,然后她又开始高声尖叫:记得!我五五年以后就没有看见过他。这个骗子。对我儿子的朋友来说,他都算不上是个男人。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惹人烦的讨厌鬼,一个在地球上占太多地方的肥大的身躯。为了治疗中暑,他给人开阿斯匹林。他们全都是些骗子,阿米。他给人糖果和阿斯匹林,他有一只大狗,还有一条油滑的舌头。你签完字了吗?

签完了,我说。

你的手在抖,阿米。这就是你妈妈对你做的好事。你可以从现在到世界末日一直都监视我,不过你不会比现在懂得更多。

我们站在那儿,谁也不肯让步。她叫喊,然后我也叫喊。我们站在银行门口,搅起一阵不小的波动。过路的人窃笑着,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银行职员带着些微敌意和怀疑瞪着我们。她因

为我不是到这儿来监视她而感到失望。

你和你妈妈为什么不到其他几家银行查查我到底存了多少钱？其实你们把我的钱都抢光了，只剩下几分钱在我的名下。

因为我对这没兴趣，我妈妈也没兴趣。

什么？

你的钱！施劳姆津舅妈！

她想了想，冷冷地笑了一下，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笑。

为什么你没兴趣？你以为你可以不劳而获吗？

我对她说了一句她意想不到的话，我说，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得到什么，施劳姆津舅妈。

她把我这句话琢磨了一会儿，在她身体内部有某种东西被拨动了，被点燃了，被触怒了，然而她并没有表示出来。施劳姆津舅妈并不傻，话总是在她舌尖悬着。我的话让她难以理解，因此更显得陌生与具有威胁性。她被那句话的语调和音质所吸引，她一边仔细地估算着自己的感情，一边反击说：你是想讨好我，用那些共产主义者的手法来讨好你的老舅妈。

我说：施劳姆津舅妈，我得走了。

她说：是啊，总是连看看你老舅妈的时间都没有。

我会来的，我说。

听着，存在这个账户上的只是一小部分钱。她这时是在声嘶力竭地喊了。我在全国都有账户……在全世界都有。她说"全世界"的时候声音突然小得像耳语一般。

银行里的人又一次屏住呼吸。你妈妈怎么样了？她最近看上去不太好。你的儿子呢？

我的女儿们都很好，我说。

她们很可爱。不过为什么让她们受苦呢？我在瑞士有个熟人，一个很不错的犹太人。他们那里男人过剩。他们开了一家

糖果厂，他们有钱，还有古老的城堡。他们正在找以色列新娘……你那几个可怜的闺女可以在那儿找个丈夫，然后把他们带回家。要是在这儿找婆家，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凭她们的长相，不容易！我们的男孩子都在打仗时死了，我们这儿男孩子不够分的。

谢谢了，我说。

大点儿的那个，她是不是又蹲班了？她问道。

他们让她留了两级，我说，然后他们把她移送到动物园。他们不敢肯定她是一种什么动物，不过，他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她仔细地审视着我，说道：别逗你可怜的舅妈了，阿米。我不想再写一份新的遗嘱，不过我仍然愿意帮助你的女儿们。如果你不愿意要，就忘了这回事。相貌也不是惟一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她们待在这儿，待在我们的国家。你看看这所城市，它正在分崩离析。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生病。有人在路上拦住我问路。他们拿我当什么了？咨询中心？有一段时间他们不敢，可是流氓越来越多，我们该往哪儿走？当心，阿米。

我吻别了她，继续走我的路。她则返回银行去查看我是否欺骗了她。我想她知道我没有。她只是想让我认为她不能肯定，她总是把最后的决定权留给自己。

第五章

施劳米特婶婶——她二十年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尝试和施劳姆津大舅妈保持着关系，这是家族的习俗——将她无可挽回的失败都浸泡在一杯土耳其咖啡里。这是一个晦暗的雨夜，我决定拜访她。她对我说：那个女人在四处散毒！她惟一能给人的东西就是毒药。施劳米特婶婶又沉默了。她透过一道忧郁的网观察着我，这是在二十八年的执着和倔强中编织的网，透过这网她观察着这个世界，独自沉醉在对发酵的热爱中。她又说：可是她不会被遗忘。美德可以被遗忘，可是邪恶却不会，阿米。谁更会被人记住呢，是我丈夫阿伯纳，还是阿东斯基那个坏蛋！人们会记住施劳姆津的爸爸，而不是你那杰出的祖父。阿东斯基的葬礼在整个特拉维夫的历史上都是最盛大的。一大群人，哭着，嚎着，戴着花，排成一条长龙，弯弯曲曲地一直延伸到墓地。你注意到没有，那儿有多少束花？整个大花园的花都被采光了，就是为了覆盖那片新挖的墓地。她是谁？她是穿裙子的阿东斯基。

我喜欢施劳米特。她的丈夫阿伯纳叔叔是我的朋友。

每隔一两周我们在一起喝一次咖啡，是上好的咖啡，是她亲自烤过、磨碎和煮过的，所用的方法是贝都因人使用的传统方法。然后她给我看那些试管，并把有关发酵和腐烂的最新研究

的摘录念给我听。在所有这些准备活动之后，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我对她说：施劳米特婶婶，你肯定知道都有谁参加了阿东斯基的葬礼。

她笑了笑，抿了几口咖啡，也挖出一大片记忆和冰冻的悲哀。她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涌出来一大群人！我只知道这些。我也只需要知道这些。参加阿伯纳叔叔葬礼的还不足一百人。除了你和你妈妈之外，现在有谁会记得他呢？

阿东斯基的死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件。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在遗嘱上加了一条附录，然后寄给他在阿克里的律师马卢夫·阿布－阿依德，目的是想教训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马卢夫律师雇了五百个阿拉伯人，给他们每个人不少钱，另外还包括其他花费。他们在深夜被带到雅法的一所废弃的房子里，给他们穿上从跳蚤市场买来的衣服，戴上软帽，装备齐全，然后指示他们不要在第二天的葬礼上跟任何人讲话。他们还为此彩排了一次，阿拉伯人围着马卢夫站成一圈，大家一起抽泣、哀哭，难过得使他们自己都说不出话来了。

马卢夫又雇佣了整整一所幼儿园的孩子，连他们的老师也算在内。他给每个孩子发了一根树枝。整个一所小学的学生被连夜用卡车从北部的一个偏远乡村运到城里来；这些孩子们举着一张特大号的地图，地图上用醒目的标志标出了阿东斯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所购买的土地。

葬礼那天，城里八位要员于三点三十分钟来到位于瑞合夫·楚姆佩多路的旧墓地，同死者家属会面。会面的气氛十分紧张。这几位要员之所以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葬礼上应该有官方的代表到场，而参加葬礼的人也应该不会很多。他们中的七个人都害怕施劳姆津舅妈那张好挖苦人的嘴。

这时，人群开始朝着墓地的大门涌来：那所学校的学生，还

有他们的老师，整个一所幼儿园的孩子，还有五百个捧着花的阿拉伯人。前一天晚上，大特拉维夫地区所有墓园里的花束都被搜罗了来，这样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拿着一束花，而马卢夫则可以在阿东斯基给他的那笔钱（只是一小笔钱）之外再赚上一大笔。当地的首领监督着他们自己的人，并竭力装扮成犹太人的样子，带着令人惊奇的真诚痛哭流涕，仿佛他们真心热爱阿东斯基。

施劳姆津大舅妈穿着黑衣服，看上去很高兴。

小施劳姆津妈妈则吃了一惊。

消息传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偌大的广场上就聚满了人，大家都争相目睹这场规模盛大的葬礼。死者在半个小时内就吸引了一千二百人来围观。

来自著名报社的记者们找不到与送葬的人们交谈的机会，因为人们如此悲哀，以至于送葬行列里的人们都说不出话来。市长在最后一分钟才到，从大门口到坟墓，一路上都在系上衣的扣子。市长发表了一段催人泪下的演说。他演讲的时候充满了感情，他刚刚才意识到阿东斯基有这么多朋友，而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则并不像他从前认为的那样确定。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演讲词，他将几周前在另一场葬礼上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去世的人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之一，一个有魄力、有胆量，广受爱戴的人。

他说道：阿东斯基是一个里程碑。他从眼泪之谷走到了希望之门。他既不断进取，又能伺机而动；他既为众人服务，又同时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是一个德行不朽的人。因为美德永远不会终结，只会延伸……请注意这里词句的变换，体现了我们的语言惊人的简练：字母 bet - yud 读起来像“生命”一词（读作“亥”），代表“十八”这个数字，同时又代表了一句很重要的祷告词，这句祷告不仅仅是一连串伤感的祝福，还意味着希望。“十八”代表着青春，代表着未来。他的讲话很长。阿拉伯人在痛哭。记者

们开始找他们的帽子，因为宗教官员正在愤怒地盯着他们光秃秃的头顶。施劳姆津舅妈在她父亲的坟墓旁骄傲地站着。我则数着我左脚下的沙粒。

阿夫拉哈米先生也讲话了。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发表即席演说。流浪汉们吟咏的声音雄壮而流畅，就连驶过瑞合夫·楚姆佩多路的公共汽车司机也停车，向这位他们一无所知的人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很多天以后，人们仍然在谈论这件事。他们说：你看没看见他有多少朋友？以前是不是我们错了？人们心中完全被惊讶所占据，但其中还有一丝深深的失望，也许是嫉妒。那个人，他知道应该怎样死，就像他知道应该怎样活一样。他离开我们这个城市，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都是那么气宇轩昂。他死的时候九十多岁，他的葬礼的情景至今仍镌刻在我脑海中。身着白衣的儿童手捧树枝，整个一所学校的孩子手举一幅醒目的全国地图，人们唱着歌颂独臂英雄楚姆佩多和歌颂阿东斯基的歌曲。阿拉伯人在坟墓旁哭泣。一长列的陌生人聚集在翻松的泥土旁，脸上是懊丧的表情。施劳姆津舅妈那贵族般的气度，那花海，那白衬衫，软帽，眼泪，还有那满心惊讶的老者，他们无法弄懂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到底表现了一种骑士风度，还是表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爱？

出于某种理由，施劳姆津大舅妈将这个秘密透露给了我。一天，她正坐在她的花园里，恨恨地瞪着她的花、她的草和天空。我恰巧从她房子跟前经过，看见她正坐在院子里，穿着奢华，全身都是辉煌的仇恨。她看我的时候目光分散，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像是在研究一张撕破的图表或是银行收据，然后她才回到现实中，看清楚我是谁。她冲我挥了挥胳膊，那姿势像是在轰走一只讨厌的苍蝇。她对我说：原来是你呀，阿米，我那个白痴儿子的朋友。

我坐在草地上,享受着草与我的身体接触的感觉。这时是怡人的夏天,并不太热。她说:你看见他给自己安排的葬礼了吗?我儿子去了吗?没有,他没有去。他连自己父亲的葬礼都不参加。内海米亚今天在海法。你不喝茶吧!

我不喝茶。

我没有咖啡,她说。冰箱里有果汁,但别去喝。我晚饭还有重要的客人。如果你真渴的话,那儿有水。喝点水吧。

我不渴,我对她说。她放心了,眼神又开始四处飘荡起来。

你知道阿东斯基干了些什么吗?她问我。那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我知道。就算他没告诉我,我也知道。占据他脑子的是一种冲动和复仇的欲望。他真是个漂亮的男人,他们怎么也赶不上他。他们忘性很大。但他们不会忘记我的,别担心。

我没担心,我说。

我不止一次将这个故事讲给施劳米特婶婶听。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个秘密。施劳米特婶婶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发酵和生活的苦难上。

坏蛋们沉入地下,而那些好的灵魂,那些善良和纯洁的灵魂,将升到天上,她说。

施劳米特婶婶又是刚刚才回来,她又到外面长时间地游荡去了。她与这个女人斗争了二十八年,而她却一直处在这个女人全面的压迫之下。二十八年来,施劳米特婶婶不断地来“聊天”,来“一块儿喝茶”。然而施劳姆津大舅妈仍然要问:跟我说,阿米,施劳米特和阿伯纳结婚了吗?

施劳米特婶婶将头埋在蜷缩的双手中,哭泣着。我像一张破唱片一样的回答她:施劳姆津舅妈,他们是在 1936 年 5 月 8 日结的婚,就在那场暴乱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记得了?那是一个昏暗的晚上。阿伯纳刚从雅法－特拉维夫边境回来。阿维革

多·伯霍夫斯基的兄弟被打死了，我们能听见阿兰贝街上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小学校外面。阿伯纳来的时候穿着灯笼裤，裤子上染着血迹。他手里拿着一支木把的毛瑟枪。你穿着黑衣服参加的婚礼。你还说肖邦是你娘家这边的亲戚。施劳米特婶婶亲你的时候，你问她她是谁。

是啊，我记得，施劳姆津大舅妈说道，差点儿笑出来。(但实际上她不会笑。)她是谁？她到底是谁？

让她直接冲我说！施劳米特婶婶嚷道。

她在说什么？施劳姆津大舅妈问。

她说你应该直接冲她说。

谁在说我应该直接冲她说？施劳姆津舅妈问道，她的脸上挂满了真诚的沮丧和无辜。她是谁？她不是我们家的人。并非是我特别对我们家族感兴趣，许多蒙古种的人都想尽办法想钻进我们家族里来——当然是通过内海米亚这边钻进来。她为什么邀请我参加？她到底是谁？

她说你曾经在她的婚礼上跳舞，我重复道。老天爷！施劳姆津舅妈，这都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你曾经跳舞！阿伯纳叔叔和你一起跳华尔兹，而你想把玻璃砸碎。

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施劳米特婶婶当着施劳姆津大舅妈的面这样说，而施劳姆津大舅妈的脸上仍然是一脸无辜。……她转向她：难道你就没有同情心吗？施劳姆津！可怜的阿伯纳六年前就死了。我们结婚二十六年。为什么？为什么？……

现在每个人都在结婚，施劳姆津说。他们懂什么？他们干嘛结婚？想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蒙古人？你告诉我，阿米。你看上去倒像一个聪明的家伙，即使没什么教养。当施劳米特决定嫁给阿伯纳的时候——就算这是合理又合法的——你可以告诉她，对我来说…… 我在这儿！告诉她我在这儿！告诉她我想和

别人一起喝茶，告诉她我想有个伴儿！我厌倦了那些试管和发酵。

你可以跟她讲，找合适的一天，我会把她喜欢的那块小地毯送给她的！施劳姆津舅妈大声说。

我会跟她讲的，我说。

当然，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我需要解释一下，施劳姆津舅妈并没有疯。如果她真是疯了的话，事情反倒会简单一些。依据我的意见，我认为她比任何人都正常；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有很大分歧，因此，我也不愿意卷入激烈的家族纷争。每当施劳姆津舅妈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必须追随她的逻辑，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逻辑；必须跟上她的思路，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思路。她认为世界应该照她认为对的方式运行，因为她喜欢它这样。比方说，在施劳米特婶婶这件事情上——施劳米特婶婶趴在她肩头哭泣，求她让自己加入这个家族——施劳姆津舅妈的回答是："门已经封上了，我的新娘妹妹。"

施劳姆津舅妈很善于打击敌人的弱点。她跟内海米亚、阿东斯基站在一边，而另一边则是敌人的阵营。在娶施劳米特婶婶做妻子之前，阿伯纳叔叔有一个妻子，名叫玛莎；玛莎在生我的堂妹迪娜的时候，死于难产。

玛莎怀迪娜的时候，一直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她自己的妈妈就是在生产的时候死的。我的堂妹迪娜则对她称之为"将死的母亲"的厄运深怀恐惧。她打定主意要和第一个能和她结婚的男人结婚，爱他(要是可能的话)，再和他生一个孩子。要么活，要么死。她不能在恐怖的边缘上生活。施劳米特做过迪娜的教师。迪娜将施劳米特带到家里来，因为她知道，如果阿伯纳能爱上施劳米特并和她结婚的话，她，迪娜，就可以专心照顾她

自己的事。

施劳米特和阿伯纳真的彼此爱上了对方。我的堂妹和她老师之间有某种感应，和她爸爸之间也有。她促成了他们的婚姻。她又给自己找了个丈夫，年纪轻轻就结了婚。紧接着就怀了孕，然后就焦急地等待着。

家里的人都被害怕和担心笼罩着，只有阿伯纳叔叔除外。他宣称是一个无神论者，蔑视一切迷信。他瞧不起那些叩木头的人(这是从叩击十字架衍生出来的习俗)，因为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正在建设，也正在被建设着。在我们这个新的国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里，没有原始信仰和古代习俗的地位。

每个人都怜悯他，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女儿八个月以后就会死掉。

他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他常常放声大笑，到了星期六晚上和迪娜一起喝酒，坐在走廊里下着永远下不完的棋。他一有空就去赌场，跳狐步舞。他发明了一种新牙膏。他只相信那些能被他掌握在手里的东西，那些能被理智检验的东西。他的理智到了极端的程度，他是一个犹太无神论者：他狂热地相信他没有信仰。

即使到了去医院的路上，他仍在嘲笑那些宿命论者。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从上辈人传下来的、命中注定的灾祸”，他这样坚信道，而且如果一只猫从你前方跑过去，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坏事。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信仰民族复兴的人，他对迪娜说。

她的肚子因为腹中的胎儿而鼓胀着，她正全神贯注于死亡的来临。

只有在迪娜进入产房以后，阿伯纳的精神才突然崩溃了。

他疯狂地试图用自己的躯体来阻止孩子的出生。他尖声高叫：别让她生孩子！他哭着，别人领他到另一个房间，他还在那里继续抽泣。仅仅一夜，他满头的黑发便变成了花白，年轻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在那几个小时里，当我们都坐在那里、等着我堂妹迪娜死去的时候，阿伯纳整整衰老了三十岁。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死胎。我的表妹离开了她的丈夫，去了另一个世界。阿伯纳叔叔仍然是那样悲伤、消沉，带着一丝责备和无法测知的迷惑。施劳姆津舅妈信任他和玛莎的婚姻。她把这次婚姻当成一次死亡的结合，而她对死亡的结合了解得一清二楚。每月一次她要到墓地去，扮演一次婚礼。她站在内海米亚的墓地上，对他说话，宣布道：我同你订了婚。她躺在旁边那块为她准备的疏松的沙地上，紧闭双眼，两臂平伸，感受她和她的丈夫结合在一处秘密而肥沃的永恒之中。当迪娜死的时候，施劳姆津大舅妈宣布：是阿伯纳让她死的，因为他想和那个年轻女人结婚。

施劳米特婶婶是在1909年，在她两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的。但施劳姆津一辈子都把她当做新移民看待。施劳姆津舅妈认为：阿伯纳不应该同意他女儿结婚。她接着散布谣言，说玛莎并没有死，而是自杀的，因为阿伯纳和那个年轻女人有染。实际上，阿伯纳和玛莎结婚时施劳米特还只是个孩子；然而这个事实对她来说丝毫不重要。然后施劳姆津又将她的敌意扩展到了迪娜身上。她拒绝承认她的婚姻，她声称迪娜亲手杀死了家族里最漂亮的一个婴儿——她说那是和内海米亚长得最像的一个孩子。有一次，我妈妈小施劳姆津在某个骄傲自满的瞬间，暗示说我长得像内海米亚，施劳姆津大舅妈又惊讶、又怜悯地对我那可怜的妈妈说：可是你要知道，我的小妹妹，内海米亚长得很漂亮呀。

据施劳姆津大舅妈说，迪娜想让她那漂亮的孩子死。她想让阿帕沙德成为内海米亚惟一的纪念。迪娜是一个有罪的女孩，施劳姆津大舅妈声称道，而阿伯纳和施劳米特是她的同谋。

第六章

在特拉维夫北部那所私人医院明亮的房间里，施劳姆津大舅妈正在打扮着自己，这使她的仇恨又增添了新的光彩。即使已经没有住院的必要，她仍然比较喜欢待在医院里。她雇佣了私人护士，她们平均工作一个星期之后就要求辞职；她每个月付一万二千里洛特，还要付给那个时髦的、灰头发的医生一笔数目不小的美金。有人说，伴随她那日益老迈的年纪的，是她那日益增长的邪恶的天性。

我喜欢到医院来。她对自己相貌的热爱使我激动。她将她的魔鬼编织到伟大而辉煌的童话故事里去。我并非可能的财产继承人，因此施劳姆津的挥霍无度影响不到我。我甚至连邮票簿也不会继承。看着她呵护自己的美貌，我在想：冷酷而精致的美貌掩盖了多少的缺陷。她精心地修饰自己，每天都穿不同的衣裳；她的头发也经过小心的梳理。她不接待来访者，只有小施劳姆津妈妈和我会来，偶尔还会有两三个律师。医生们经过她的房间时都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她总是自己给自己梳洗打扮，我所感到着迷的就是这一点。她从不肯让任何一件旧衣裙浪费在我妈妈或我手上。她的美是注定只能由她自己来欣赏、来陶醉的，不需要任何观众。她修眉，做面部按摩，每天做两次头发，经常照镜子。她那头柔顺的银灰色头发和光滑的皮肤使她看上

去多么富有贵族气质！

在窗户下方，面对着种满了天竹葵和玫瑰的庭院，伫立着一尊式样简练的白色胸像，两旁有两帧照片陪衬。她儿子的照片已经在好久以前就被扔掉了。只有内海米亚和阿东斯基老爷这两个她热爱的人的照片还留下来。少数几个碰巧经过这里的人都会问：阿帕沙德呢？

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享受念这个名字时的快感，没有什么别的用意。然后他们似乎就在嘲弄她，和她那毫不宽容和冷酷的羞耻感搏斗。有一个医生问我：为什么不叫"含"，就像诺亚的儿子"含"一样？或者叫科达劳姆尔？或者叫提格拉斯－皮勒色尔？他们已经忘记了由我表哥的名字而引发的那场争斗，更有可能他们只是假装忘记。施劳姆津大舅妈为这个问题斗争了一辈子，争的就是那份能够成为施劳姆津的权利。从那以后，她允许内海米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做她的主宰。她的第二个儿子的出生(她的大儿子，一个蒙古人，一周岁时便死了)使她终于可以让所有人都各安其位，而且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她对内海米亚的服从；这是一种以伟大的爱情为基础的服从，是她自己的选择。她选择他作为她的主宰，并非出于责任或是驯服，而是一种斗争的结果。事实上，从长远来说，她也许会失败，但在眼前的事情上，她尽可能地使每个人承认她的权利与才能。施劳姆津舅妈把这叫做个人选择。

当我表哥出世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期待着另一场灾难的来临，那种纠缠于阿东斯基家族谱系中的、被华丽词藻修饰着的灾难，而且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情以后总能被创造出来。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身世是个谜；而谜团总能引起一系列的嫉羡和曲解。据说，施劳姆津家族的人在性格上具有很强烈的疯狂的倾向，这一直可以追溯到我们祖先那霍尔的时代。每个人对

本－阿姆拉姆的故事都很熟悉，他是施劳姆津带有传奇色彩的外祖父，一个从圣城希布伦来的密使；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和亚洲，最后却带着以希布伦犹太教堂名义募集来的钱款失踪了。关于本－阿姆拉姆的祖父鲁文的故事在上个世纪早期也在四所圣城流传着。他是一个著名的法兰克人，他领着一个拉比的妻子骑着马，赤身裸体，穿过城里；他在犹太教堂放火，以拯救人们，但最终却被狗咬死。关于这故事有若干种说法：有的说鲁文自命为救世主；另一种说法说他是约瑟夫·德·拉·瑞恩的追随者。约瑟夫·德·拉·瑞恩曾最远达到过上帝的宝座，远至黑暗的山岭之外。在那里他擒获了夜妖和撒旦，但却屈服于他们的哀求，给他们饮了香料。这次违诫极其严重，使得夜妖和撒旦得以解脱，从而阻挡了人们救赎的道路。另外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违规行为。此外，还传说家族的先父们曾经裸体在萨法德的雪地上举行苦行者的礼拜仪式，或者在烦闷的夏天往返穿行于森林之中，他们的脸上奕奕发光。他们向北直到西顿，甚至最远到了希腊女王那里。女王不知道每晚将她带走而每天早上又要返回西顿的人就是他们。当她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施劳姆津大舅妈便将他的蒙古血统归咎于内海米亚家这一方，因为他家里有这么多精神病，以及像我外祖父希姆哈这样堕落的人。在她看来，以及在她父亲看来，他的错在于他有一次花了不少钱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在阿仑拜和罗斯切尔德大街的夹角处)，为的是拴他那头驴子。他经常骑着那头驴子到内维－塞得克的女子学校去。后来，当他不再需要那头驴子的时候，他又把那块地给卖了，仍然只卖了相同的价钱。按照她的理论说，任何人如果按当初买地时付的价钱卖地，他一定会生蒙古种的孩子。可是为什么要评判她呢？她已经被悲伤占据，她已经忘记了本－阿姆拉姆家族这边所有的疯狂举动。这是她自己父亲这边的。

我表哥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体重差不多有四公斤。他的头上裹着毛茸茸的黑头发，小脸蛋十分富于表情。在产房里，施劳姆津舅妈对内海米亚说：我们的“神妙的和平王子”，他长得真漂亮。内海米亚回答：绝对不行！他应该叫希姆哈，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愿他在地下安息，也因为希姆哈代表这第一个男孩子给我们家带来的快乐。但这铸成了他的终身大错。

施劳姆津去征求她父亲阿东斯基的意见。她父亲说：希姆哈？让他用那个傻瓜的名字？首先，他死在一间小阁楼里。其次，他卖一块地只得了那么一点钱，那是犯罪。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想赚钱，又不让另一个犹太人去赚钱，那他就没有人性。不管怎么说，土地是惟一真正值钱的东西，而且它再也造不出来了。他并没有意识到马克·吐温在他之前也说过这句话。不过马克·吐温确实在以色列停留过，而且这两个人很可能碰过面。因此，当我舅舅宣布他的儿子将取名叫做希姆哈，而施劳姆津则宣布他将叫做“神妙的和平王子”时，一场上流社会的老妇人至今还津津乐道的好戏便拉开了帷幕。老妇人们坐在她们发了霉的、堆满过多家具的走廊里，她们的语气像是在谈论一场发生在好几代人之前的规模宏大的宇宙恶作剧，甚至发生在大洪水和巴别塔之前，一场恶毒的恶作剧，充满了戏谑，焕发着历史的光彩，打上了命运和永恒的烙印。

我的儿子将取名叫做希姆哈，我舅舅带着少有的坚定这样说道。施劳姆津舅妈沉默了。争论毫无意义，她那时就已经知道妥协是什么。

她有的是时间。

和往常一样，她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一个星期以后，当她从福伦德医院出院回家的时候，她说：

内海米亚，神妙的和平王子整个晚上都在哭。我舅舅平生第一次摔上了门。他在门的另一边嚷着：我不会签字的！我的儿子不会叫神妙的和平王子！然后他就大摇大摆地朝沙丘走去。那时沙丘已经被叫做宽阔大道。

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之间的冲突开始上升到战争的程度。尖声争吵，摔门，互相责骂，无数个夜晚内海米亚睡在沙丘上，而施劳姆津舅妈则带着她“不懂事的小家伙”留守在城堡里，一边透过窗子朝外叫着：我不会服输的，你知道得很清楚！

几天以后，这场吵吵嚷嚷的战事陷入停滞状态，就像它开始的时候那么突然。新的战术是无声的敌意，夹杂着恶毒和绝望。从大道到窗口的“街头巷战”以窗门紧闭而告终，怒火被锁在了抽屉中。施劳姆津去问她父亲阿东斯基。阿东斯基那时正生着病，他刚刚开始对院子中的鸟产生了一种很古怪的亲切感，而且平生第一次开始面对形而上学的问题，诸如由生至死这一步。

阿东斯基对他女儿建议说（人们后来才知道这回事）：原则上放弃神妙的和平王子这个名字（她本来已经打算这样做），但不要将这个转变告诉内海米亚。与此同时，拒绝给孩子取和那个大胡子的犹太复国主义狂人一样的名字——希姆哈——那个卖一块地只得那么一点钱的人，那个忧郁的诗人，他很可能和小精灵一起跳过舞，然后死在一所阁楼里，穷困潦倒得像教堂里的老鼠。阿东斯基建议此后再耐心地等待。

施劳姆津舅妈对她父亲的建议十分重视。

于是开始了第二轮战斗。施劳姆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把内海米亚锁在房门外；此后一年半，我的表哥都被叫做“那个人”。内海米亚一遍又一遍地在新城稀疏的街道上走着，那些曾经热爱他的人们为他感到难过，同情地朝他点点头。在这个两万人口的小城里——其中还包括十一个牙医、十五个卖火柴

的——做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的父母，同时还要互相攻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爱着对方。

施劳姆津不断地和他儿子进行交流，在他的血液中注入仇恨，喂他一种不知是什么配方的东西，管他爸爸叫做愚蠢和固执的人，对他强调：是通过她的关系，而不是靠他的科学才能或是家庭地位，他才住在、或者才能够住在这样一所坐落在漂亮的新大道上的豪华房子里。她不允许内海米亚见他的儿子，而他则急切地想念着他们两个人。

他多么渴望能接触他们，看见他们，触摸他们。他多么渴望看到施劳姆津那张冷酷而又美丽的脸，她此时正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消过毒的奶瓶给孩子喂一种神秘的东西；他多么渴望听见那咯咯咯的笑声，那给婴儿换衣服时发出的咕咕的声音；他多么渴望拥抱那孩子，而他对那孩子的样子却一无所知。他被那紧锁着的门、那香水的气味、那婴儿尿液搀和着酸酸的牛奶味的气味所折磨，而在屋里，坐着施劳姆津大舅妈，浑身充满着暴风雨一样的激情和冷静的敌意。内海米亚坐在那条还不能称其为大道的大道上，脸上满是渴望，双眼闪着悲哀的光。他唱道：人们说这世界上有爱，我的爱在哪里呢？

除了阿东斯基以外，任何人都不许进入这所房子。从送牛奶的，到小施劳姆津妈妈——她手里拿满了给孩子的礼物，却被赶出来五次——所有的人都被施劳姆津当做潜在的密探。内海米亚日见消瘦。在大道的两旁，刚刚栽种了平膝高的小树；人们听见他在那里对自己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大道两旁已经安置了一些座椅，大道已经不再被称为大道，而被称为大街，因为在此闲逛的人们已经开始说：让我们把它叫做罗斯切尔德大街吧，就像在巴黎一样。内海米亚坐在他房子对面一张新刷了漆的座椅上，想念着他的妻子。而她的窗子则从房间里面反锁

上了。

经过八个月冰冷无声的交战，这部家族传奇成了城里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不论在城外的新定居区，还是在遥远的耶路撒冷，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谈论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为了“那个人”所进行的争斗。因为阿东斯基是一个公众人物，而内海米亚又是希姆哈的儿子，希姆哈是一个为人们所尊敬和怀念的人。不仅如此，施劳姆津大舅妈还是本－阿姆拉姆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已经在希布伦和耶路撒冷居住了六代。

应该承认的是，施劳姆津舅妈的意见有一点被证明是对的，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人们不可能公正客观地看待问题。耶路撒冷除外，因为在那儿，两方面的人数持平；而在城外的新定居区，支持内海米亚和支持施劳姆津的人数之比为四比一。在特拉维夫和雅法，比例也是如此。通常，人们在街头巷尾会这样争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干嘛要取这样一个古怪的圣经里的名字？对一个真心爱她丈夫的女人来说，她真的会把他关在门外，使他受苦吗？她应该接受他的权威，他们这样争论说。希姆哈是个好人，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为什么不能取名叫希姆哈呢？等等，等等。

施劳姆津自身的美德无法在她与公众意见的论战中支持她。论战的地点是在巷角，在大街上，在新建的座椅旁，在大道旁和大树下新形成的各种议会里。那棵大树下现在被称作穆格拉比广场，原来只不过是人们来散步、来看海、来远处的海滨休憩的地方。

阿东斯基从拉姆拉雇了五十个阿拉伯人，又从耶路撒冷雇了十几个犹太人。他发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和加班费，他将他们安插在街角、大树下、海岸边，目的是为了在公众意见的主要集散地为施劳姆津主持公道。他们争辩道：神妙的和平王子是一

个绝妙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字对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的儿子合适的话，它对内海米亚也应该合适。女人是她孩子的母亲，男人应该屈从于她的意志，在取名字这件事情上更应该如此。施劳姆津的第一个孩子有残疾，因为她丈夫的家族血统里有毛病。考虑到这些，她才会希望她第二个孩子能够和先知的远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希姆哈的故事，他们说：那个傻瓜花了那么一点钱买了一块地，然后丝毫没有讨价还价，就按原价将它卖了出去。此事充分证实了双方家族中哪一方带来智慧，而哪一方带来疯颠。他们描述着那位母亲极度痛苦的样子，以及那个可怜的孩子，他被关在自己的房中，身边缺少了父亲的陪伴。一个耶路撒冷人情绪激动地争辩，还把他的话唱成歌：女人——男人！男人出自女人，男人有欠于女人，男人应该敬重女人。尽人皆知，是爱与激情使男女合一，使男人完整。

热烈的战斗，激烈的争论，尽管加班加点，尽管有这么多辩驳与争论，人们的意见也只是出现轻微的转变。我们城里的居民并没有被说服。少数人在两方面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支持这一方，一会儿支持另一方。但这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辩论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为大部分人站在反对施劳姆津和她父亲阿东斯基这边。

“那个人”长到十八个月，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坐尿盆(阿东斯基在街上骄傲地报告这件事)。施劳姆津带他散步的时候，阿东斯基雇来的阿拉伯人便簇拥在周围，以防备内海米亚及其同伙。人们或者指着他说：瞧，这就是神妙的和平王子，那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或者说：那是施劳姆津和小和平王子。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预见这场斗争的结局。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施劳姆津将获胜，也许是以妥协的方式获胜。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开始要求增加工资及延长加班的时间。于是关于妥协的谣传开

始到处流传。阿东斯基知道那些阿拉伯人也会很快要求增加工资。他于是允许谣言继续散播，并利用谣言的影响。

为我表哥的名字所进行的斗争持续了十八个月。施劳姆津和内海米亚分开房间睡觉。她在房间里开了一扇门，直接通向室外，这样她就可以避免经过走廊。她将通往她房间的门锁上，又用冰箱将门堵住。就算内海米亚想进来，他也不可能进来。可是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的眼泪只有大道上的沙子能够看见。十八个月的折磨和哭泣，经历过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和令人窒息的炎热。施劳姆津，施劳姆津！他被难熬的孤独所噎塞，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神志是否正常，担心自己的生命，他发现自己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他已失去希望。他像一个患单相思的年轻人一样痛苦。他默默地收集邮票，热心地将它们晾干、裱好；他在冬天洗海水浴；在舞会上疯狂地跳舞；在一个冬季的雨夜骑马一直向北跑到加利利；作了两首诗，并用流畅的字体抄写了十五遍。一天，他来找施劳姆津妈妈。他一把抢过她那里存放的外祖父希姆哈的照片，撕了个粉碎。然后他就和妈妈一起坐在走廊上，谈论施劳姆津大舅妈柔软的面颊、丰满的胸脯，谈论了整整两天。妈妈给他斟了一些法国白兰地，那是她特地为我结婚那天预备的，是很早以前一个葡萄园的农场主送的。内海米亚喝得醉醺醺的，在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然宜人的街道上来回兜圈。这是两千年来的第一所希伯来城市，一所白色的城市，它的房屋像白色巧克力块一样，背对着大海的波涛。内海米亚在树木和花丛中穿行着，嘴里嚷着：花儿戴到恶棍的头上！……“难道我不爱我的儿子吗？神妙的和平王子！”……“我的兄弟们做买卖时骗人！……”他一摇一晃地慢慢走着，嘴里哼唱着：通向蒂珀雷里的路途遥远，那路必通向死亡！接着他又唱起那天晚上才编的歌：荣耀，荣耀，哈里路亚……该死的冰箱。……荣耀，荣

耀，哈里路亚……他多么想念他的妻子和孩子，渴望他们的触摸和他们的味道。好人内海米亚。

十八个月以后，大街两旁的树已经长到齐腰高。阿东斯基雇来的阿拉伯人开始要求延长加班时间，但却遭到断然拒绝。就在这时，内海米亚收到了那封信。那封信是内海米亚的妻子写的，是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挂号信。这封信经过了公证，由邮递员亲手交到内海米亚手中。信中包含了施劳姆津向内海米亚提出的建议。照她的话说，这是一个极其宽宏大量的建议，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信中说，她所提出的停战协议可以成为和平的序曲，甚至可能导致最终和解；但一旦这个建议被拒绝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永久的战争状态，并且永无妥协的可能。

她建议给孩子取名叫阿帕沙德。内海米亚舅舅感到疲惫不堪。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对的，就连阿东斯基雇来的阿拉伯人也这样认为。他想念施劳姆津和孩子，以至于在某些时刻他甚至忘记了——或者他情愿忘记——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的导火线。他几乎忘记了他父亲的名字，忘记了希姆哈（快乐）这个词在希伯来语言中的存在。他开始恨那些快乐的人们，因为他们使他想起他父亲的名字。有一次他看见两个男孩子在阿伦拜街上痛饮，他便朝他们猛扑过去，还是阿东斯基手下的一个阿拉伯人将他们劝开。内海米亚变得虚弱而窘乏，他愿意他儿子叫做鲁道夫·瓦伦蒂诺，耶和阿哈兹，沙皇尼古拉，马克思，斯宾塞……什么都行。

此时，阿东斯基通知他女儿，她的支持者正在日渐减少，她的敌人的力量却在日渐增强。而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求正反映了那些没有头脑的暴民之无礼与蛮横，他们的举动正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施劳姆津舅妈从报纸上读到为即将到来的舞会做准备的报道。她意识到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挨

斯特王后能比得上她。因而,她要求恢复她王后称号的请求便显得很重要,使她能因她的人民之故将自己献给亚哈随鲁王。她将自己的儿子视作她为以色列的永恒而做的最主要的贡献。而且,说实在的,她为什么不能在贬损她的那些人面前加冕称后呢?在神妙的和平王子这件事上作出一些让步,肯定能使事情更加顺利一些。对此,她父亲举双手赞成。

内海米亚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他现在无法清醒地读信,也无法像城里的其他居民那样,在三月寒冷的夜晚,整整一周都在重复:内海米亚在堕落,从堕落下降到毁灭。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笑,也无法对阿帕沙德或是阿帕沙丁卡这样好玩的名字作出任何欣喜的反应。他心中那被压抑的热情在燃烧。他冲向施劳姆津的房间,房门被锁上了,后面还有冰箱顶着。空气中充满了他所渴望的香水的味道,婴儿的尿味,一种神秘配方的牛奶酸味。他发现门上有一张写着他名字的字条,他一把扯下来,读道:

致所有相关人士:

对今年三月十五日信中所提姓名一事表同意之一方,当致上经公证之道歉函,以申明(其)接受阿帕沙德一名,且希姆哈一名——此为其于懦弱之刻所提出——为一悖理之想法,意欲打击其妻(为前述同意之一方之妻,倘其果同意)。其妻一生历尽艰辛,产下一子,惟一之目的在于为同意之一方产生一财产继承人,以延续其姓氏。而此名(希姆哈)之蓄意提出,其目的在于使本国之一可靠公民蒙羞。此公民为一出身拉比与建国功臣家族之女,其祖父为一显赫希布伦大儒;其目的在于在无数人面前诋毁一妇人,此妇人认为希姆哈——同意一方之父——为一荒唐滑稽之人物,

缺乏远见，对其女性学生做出不正当之求爱表示，骑一跛腿毛驴，将犹太人之土地售与异教之人。仅念及施劳姆津之子负此人之名已为一脱离常轨之举，为对将负此名之人之大不敬与羞辱。同意之一方须彻底称悔，宣布其对其妻炽烈之爱情。

此信当以一式三份誊写：一份致阿东斯基；一份致其合法妻子(施劳姆津·内·阿东斯基)(以客厅办公桌上层抽屉内粉色纸写成)；一份致亲爱的儿子，其在永远的以色列国无有名字已十八个月，且对其祖先一无所知。

对你的尊敬日渐减少的施劳姆津

内海米亚徒劳地想撞开那扇门。他大声叫喊，但是屋里没有反应。他披上一件外衣，系上领带，奔到雷霍夫·耶胡达·哈-列维那儿，可是公证人已经回家了。他又跑到公证人在雅法的家中，付了双份价钱，将那封信誊写了三份(一份以粉色纸写成)，同时呼吸着公证人嘴里呼出的大蒜的气味。公证人穿着睡衣，一只手拿着东西吃，另一只手摆弄着面前的工作。然后他便将信以挂号信寄出。

两天以后，壁垒被打破。内海米亚舅舅和施劳姆津舅妈又一起待在他们可爱的卧室里。

战争结束了，各方面都接受了和解。我表哥的名字现在叫做：阿蒂·布兰德。

施劳姆津大舅妈不肯退让一步。二十八年来，她在往美国给他写信时一直叫他阿帕沙德·雅科比，然而信总是被退回来，信封上用英文盖着章，上面写着：收信人地址不详。她把退回的信收集在一起，用粉色丝带捆好，将它们放在抽屉里。最终，我的表哥坚持不住了，他跑到邮局，希望邮局能够把写给阿帕沙

德·雅科比的信都交给他。他读完了这些信，然后，如果是在冬天，他就将它们扔在火里；如果是在夏天，就将它们扔在垃圾堆里。有一次，我在那布勒斯喝醉了酒，身旁一个裸体女人陪着，她唱着蛊惑人的歌曲，我们在她光溜溜的肚皮上吃着煎饼卷，窗外则是维苏威火山的景色。我给我表哥写了一封情感细腻的信，向他描述我床上的这个唱歌的洋娃娃，描述那布勒斯，维苏威，庞培，以及奇妙的煎饼卷。我将信寄给阿帕沙德·雅科比。一年以后，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的几个字"收信人地址不详"是我表哥的手笔。

阿蒂·布兰德连写信都口吃。有一次，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前一年冬天开始写的，第二年冬天才写完。信里总共有十五句话，他向我解释他为什么和一个被他妈妈称作是"上海妓女"的女人结婚。我给他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裸体女人，一条蛇正钻进那个女人的神秘部位。这张照片是有一次他在雅法买的，后来留给了我。

施劳姆津舅妈说，她儿子会使她过早离开人世。她说，那个败类，总是用很贪婪的眼神看内海米亚和阿东斯基的照片。他住在美国，和一个从上海来的妓女在一起，现在正一步一步地杀死他妈妈。

为什么是从上海来的？我问。

因为那个蠢货从俄国逃到了日本，然后又从那儿跑到美国。

可是为什么是上海呢，施劳姆津舅妈？

在日本能有什么事情给她干？那是犹太人呆的地方吗？施劳姆津舅妈问道，继续用她那冷冰冰的渴望仇恨着整个世界。

第七章

在北特拉维夫私人医院的办公桌上，施劳姆津舅妈的两个亲人立在那里，镶着金框。那个灰头发医生眼中的表情让我想起所有与施劳姆津熟悉的人：向往，谄媚，急切地等待着算账那天的到来。内海米亚和阿东斯基，镶着金框，在她身边看上去非常愉快。他们毫无敌意，与其说彼此竞争，倒不如说相互补充。内海米亚在这张照片中身着官服，这是 1952 年，他当驻欧巡回大使时拍的照片。他看上去很古怪，像某些骨瘦如柴的孩子化装成英国贵族——像可怜的摩西·蒙特费欧先生——那样，或者像个小贩。他头上是一顶大礼帽，手里的羊皮纸上印着以色列独立宣言。他的身后是哭墙，拉结之墓，本·古里安，在第一届犹太人代表大会时站在桥上的赫茨尔，两个种树的孩子，一枚巴尔·科赫巴时期的硬币，一枚以色列国防军的徽章，早年暗中殖民时的吉布兹。他被这一幅幅斑斓的图画所湮没，苍白而模糊的身影同拉结墓的线条混合在一起，还有本·古里安那灼人的凝视，以及晨曦中那暗绿色的地平线。

另一张照片是阿东斯基的。他穿得也很正式，但那式样对他很合适；他衣着合身、得体，手握一柄金头的节杖。他身后的图画上散乱地画着贝鲁特的房屋；奥马尔清真寺；圣坟教堂；帝国大楼；一枚白兰地酒的封印，显示其在 1899 年列支敦士登所

举行的国际大赛中获得优秀奖；两只石狮子；一个穿黑衣的女人；一听油；一只看不清的手臂拥抱着那个女人和那听油；两只色彩斑斓的孔雀，孔雀灰色的脖子上垂下一枚徽章，上面写着：优素福－穆哈穆德——专业艺术摄影师。

这两张照片面对面地立着，好像阿东斯基和内海米亚正在跨越古代的城墙进行一场谈话。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均具有无可争议的力量，像两个纸做的战场大元帅，身后有巨大的王国在支持。

在那张褪色的照片里，内海米亚舅舅的眼睛看上去很明亮，但其中弥漫着一层雾蒙蒙的甜蜜。在我舅舅活着的时候，他有一双深褐色、甚至近于黑色的眼睛，嵌在紫色的眼窝中，好像施劳姆津舅妈的那双眼睛一样。

他们两个人的右手上有相同的手纹。那些算命的人认为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都有一条很长的生命线，他们的性格线和情感线也吻合。在他们左脸颊的同一个位置上，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大舅妈都长着一个酒窝。他们的身高一样，他们橄榄色的皮肤和他们头发的颜色也相同。事实上，他们的头发是在同一天变白的。那是1948年的植树节的一天。施劳姆津回忆说：我们那时都在院子里。我们看着对方，同声惊呼：一根白头发！那天天气很好，是初春。克维斯基先生院子里的杏树刚刚开花，就像在书里所描述的那样。

那张照片真是丝毫不会掩饰，使得我舅舅看上去像是一个乞丐，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得到了一位贵族的父亲。但是阿东斯基的照片却和他本人很像：自命不凡，与这本书的作者并非没有相似之处。这也许能够解释我对他和他女儿所表现出来的脆弱。

在一次又一次企图拜访施劳姆津大舅妈的努力失败以后，

施劳米特婶婶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悲哀。在这样一个时候，她对我说：阿东斯基愿意在依布拉西姆·帕沙王宫或者是泰姬陵的神秘角落当一名亲信。

可那是印度的建筑，施劳米特婶婶，我说道。

那就在阿卜杜拉或者是亚哈国王的王国里好了！

我笑了：施劳米特，施劳米特，亚哈当然是阿东斯基的国王。你这次可猜对了。婶婶坐在阳台上，照顾着那些花。发酵……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仇恨呢？她想着，却搞不明白；她努力着……天哪，她费了多大的力呀……年复一年！她仍然被施劳姆津所吸引，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亚哈，阿东斯基的国王。施劳姆津大舅妈，就像耶洗别一样：女儿和情人，西顿的女儿，而且自己也有孩子，但从阿东斯基的身体里跳出来。在雅法，有多少女人诅咒发誓说，她们亲眼看见是她爸爸生了施劳姆津，而不是她妈妈。阿东斯基应该告诉过阿撒勒说(她是妈妈的一个熟人)，亚哈是一个伟人，他决定放弃自己在历史中作为立国者的地位，放弃自己作为拥有成千上万辆战车的庞大军队的统帅地位，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显赫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非流动资产专家的地位。像希姆哈那样的小丑，他说道……那些像耶利米和希姆哈那样坐在城堡里的小丑，他们的演讲里净是责备人的词句，使得人们用石头打他们。他们穿着麻袋布，高喊着并不很押韵的诗句，砸碎瓶子，使人们陷入混乱，迫使他们离开他们的土地……希姆哈和跟他一样的那种人重写历史，把整本整本的书都献给小丑和那些他们叫做先知的一无是处的人，他们在这些人面前充满敬畏，这些人的光芒使他们眼花缭乱；而那些最伟大的国王呢？……他们在书里只给他们留了一个章节的地方。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一个葡萄园。什么葡萄园，为什么是葡萄园呢？阿东斯基抗议道。真是违背常理！而且，为什么不把

那个葡萄园拿到手呢？他争辩道。

那伯斯到底拿它做了些什么？

每个国王身旁都有一群谄媚的人和敌人。那些被某个耶洗别所激怒了的微不足道的狂热分子。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被扭曲了，他宣布道。人们应该强调约书亚和亚哈，而不是希姆哈那种人。不要有希姆哈的书。

那会是一本很悲伤的书。耶利米也是一样！不是？阿东斯基开始变得焦虑不安，不过马上又回到了他那尽人皆知的冷漠状态。金法郎开始在他眼睛里跳舞。

施劳米特搞不懂。她为什么要搞懂呢？她和我，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被神化了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住着的还有那些纸板做的国王们……施劳姆津，本－阿姆拉姆，阿东斯基……他们是为我们而创造出来的。这些词句是很昂贵的，施劳米特。阿东斯基为教堂建设基金捐赠了一百法郎。只有那时他才避免了被逐出教会的危险。他喃喃自语道：诗人！想想看，花那么点钱买了一块地，然后又把它卖掉了。人们要么是在谈论那伯斯的葡萄园，要么是在谈论大卫和巴斯色巴在一起时的所作所为……这些伪君子。

伟大的人们创造历史，他说道；他们胸怀伟大的热情。那些小人物写那些胸怀伟大热情的大人物的事迹，他们用自己的软弱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变得柔弱无能！

但这些话他从来没有大声说出来。不会再有被驱逐出教会的危险了。这样，阿东斯基又省了一百法郎。

阿东斯基从不吃亏，他已经将他为新教堂捐款的事传遍了整个雅法。他还公开向麦瑟斯、哈勒封、卡哈那、利伯曼、齐汀哥夫和瓦伦罗德致谢，感谢他们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用他们伟大的智慧和慷慨使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后他就跟雅法市

长一起去喝阿拉克酒，并把他向教堂的捐款提高到两百美元。这以后，他便着手以天价卖给阿萨姆·卡萨尼一块地。卡萨尼转手将这块地卖给麦瑟斯。接着又分别卖给哈勒封、卡哈那、利伯曼、齐汀哥夫和瓦伦罗德，价格越来越高。阿东斯基把他捐给教堂的钱全挣回来了，另外还得了百分之二百的利息。在这笔交易中，阿萨姆·卡萨尼赚的也不少。

这样大家都高兴。

雅法市长收到阿东斯基给他寄来的一个新印度水烟袋。兴建教堂的文件批下来了，上面还有烫金说明，以及五位官员的签字。

施劳米特把这所教堂叫做那伯斯的葡萄园。

事实上，人们把这所教堂叫做希姆哈的葡萄园，为了纪念希姆哈，耶和塞夫·塔比比的儿子。他是那本《亚伯拉罕的葡萄园》的作者，那本书质疑了施劳姆津的祖父，希布伦的拉比本－阿姆拉姆的见解和他的故事。本－阿姆拉姆带着一笔可观的财产失踪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关于那十个消失了的部落和神秘的撒姆巴提昂河的秘密。

“那伯斯的葡萄园”是一栋相当漂亮的建筑，连白色瓷痰盂都配备齐全。阿东斯基很荣幸地被一次又一次地叫上前来，朗读经文，于是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说他为什么不待在上面。这时，施劳姆津大舅妈便决定，“那伯斯的葡萄园”应当成为表率。

此后，当霍乱开始在埃及流行的时候，阿东斯基和他的阿拉伯人走了抽五根烟的距离，买下一小块地，把地用栅栏围起来，给这块地起名叫做“霍乱地”。正如他所预料的，霍乱开始在雅法流行，病菌是由从埃及到巴勒斯坦找工作的工人带进来的。犹太人不敢把他们的死者埋在雅法，而阿东斯基的这块地已经准备好了。他等待着……他在沙丘上等待着，远离一切。这块

地现在叫做特拉维夫的旧公墓。只有那些最有地位和最显赫的公民才能埋在这儿。

特拉维夫便是围绕着这块墓地，向北、向南建的。这块地里所有的地方都被用上了。埋在这里的人包括阿东斯基本人，我的外祖父希姆哈，还有我的两位祖母。获得这块地是阿东斯基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任何能够预测传染病发展趋势的人注定能够赚大钱，施劳姆津大舅妈这样说。不过，她又加上一句，教科书里教的都是别人。谁会提到阿东斯基呢？施劳姆津说：在特拉维夫有那么一些无赖，他们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缘故买下了地，反对“那伯斯的葡萄园”，完全按照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行事。今天，当一个孙子够年龄的时候，这些人便卖掉一块地；当有什么地方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们便卖掉两块地。他们拥有自己的柑橘林和葡萄园，他们非常受人尊敬，他们出现在每一本教科书中，打扮成先驱的样子，身背行囊，手持前往巴勒斯坦朝圣的拐杖。他们所说的话变成了标语。人们用歌曲来纪念他们。在一个个如阿伦拜、蒙特费奥、第辛戈夫这样的街名中，人们称赞他们是先驱。我们的国父们！而阿东斯基，他所买的地胜过任何人，他买地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可他却不得不在自己举行葬礼的时候找来五百个阿拉伯人。而其他人，他们的葬礼却吸引了政府首脑、地位显赫的大臣，而且不用付给这些人钱，甚至连外交使团的人都来了，施劳姆津舅妈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吗？那伯斯的葡萄园？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施劳米特婶婶说，施劳姆津也会把它肢解掉。对她来说，什么是公理？在一个真正正义的世界里，她将失去她生活中所有的意义，像一朵凋谢的花一样崩解掉。她具有鼓动性的力量，燃烧着活力。她能够成为一支光芒四射的试管，成为青霉素的一种来源。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她

能使人们恢复健康。于是，施劳米特婶婶阴郁地喝着黑咖啡。她处在绝望的边缘，迷恋着她的老座钟，等待着救世主的铃声。

第八章

巴黎,1952年。阿米那达夫正在巴黎学习。他住在一间很寒酸的房间里,靠吃西红柿皮为生。冷水龙头在临近苏珊房间的院子里,苏珊有一头蓬乱的头发。在冬天里没有毯子;还有一个冒着蒜臭气的老房东太太。她会骂道:如果你觉得冷,我总在这儿。她的眼睛明亮而僵死。内海米亚这时正做驻欧巡回大使,而阿米那达夫此时正在挨饿。一年都用院子里的冷水刮脸并不能使一个人的皮肤变得细嫩。夜里非常冷,要想工作是很困难的。巴黎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的都是战争的记忆。美国人和美国大兵正在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

当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因为官方访问而来到巴黎的时候,阿米那达夫收到一张请柬,邀请他在星期二的中午在歌剧院前与大使见面。每个人都帮他为这件事做准备,给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教给他在时髦餐馆吃饭时所应该有的礼仪,点菜的顺序,为了开胃应该吃多少道沙拉,应该喝多少葡萄酒,怎么样在餐后将手浸在温水里。每个人都为他感到高兴。对于住在穷人区的人来说,能够在马克希姆或者是其他高级餐厅吃饭,能够和大使会面,能够坐罗斯罗依斯轿车,这并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事。

在歌剧院前,阿米那达夫亲了亲施劳姆津那涂了粉的宽阔

的脸颊,和内海米亚热烈地握手。他们两人都穿着裁剪得很好的英式服装。内海米亚戴着一顶黑帽子。他们看上去和这条大街毫不相干,在这条街上,衣着漂亮的人们步履轻松地朝着咖啡馆,朝着美国信通走去。内海米亚问他生活得怎么样,阿米那达夫说还凑合……生活还可以,只是……这时,她插进来,说:阿米的样子看上去糟糕透了。这是一个凄凉萧瑟的秋日,而施劳姆津舅妈喜欢秋天,她的美好时刻就发生在那个秋天的日子里,那天,那艘法国船向德国人瓦格纳的工厂发射了五枚炮弹。她的情绪很好。她说:与其说阿米看上去很糟糕,不如说阿米看上去像一块破布;或者说,他那个小气的妈妈为什么不给他寄点钱来呢?

小汽车在苍白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成群的鸽子掠过,周围是涂着大胆颜色的墙壁。咖啡店里满是妙曼的女子。男士们穿着西服,戴着手套,朝这些水晶做的生物眨着眼。阿米那达夫期待着,他四处张望。这场面像一张巴黎的老明信片。内海米亚说:怎么了?不方便?她再一次打断了他的问话,内海米亚只好在人行道的裂纹中寻找他的人生的意义。她说:阿米,你应该能帮助我们。内海米亚对那些专为旅行者开设的讨厌的餐馆已经厌倦透了。那里面净是些滚烫的小薄烤饼,侍者打扮得像小丑一般,散发着科隆香水的臭气。我们厌倦了总是吃蜗牛和蛙腿,还有那令人恶心的辣酱油里的蜘蛛。内海米亚希望你把他带到一家简单的学生餐馆。你知道,阿米,就是那种很富有民间气息的地方,就像在家里的特努瓦餐馆一样,是巴黎风味的特努瓦。我们想记得我们是谁。我们对这些虚伪的东西已经厌倦了。

内海米亚没有抬起头来,因而阿米无法看到他的眼睛。

咱们走吧,她说道。

阿米那达夫困惑了一会儿,他将他的期待咽到了肚子里,

说，好吧。

内海米亚看上去犹如刚从水中被捞出来一般，情绪低沉而疲劳。他的帽子有如被贴在头顶上，脸上则带着少有的疲惫的痕迹。难道是耻辱之网？他不知道。阿米那达夫同情内海米亚，这个人总是穿戴得像一位上了年纪的王子。在歌剧院的背景衬托下，他显得如此英俊潇洒，如此和蔼可亲。我可以把他带到我的房间，让他看看我是如何生活的，他想；让他看看我是谁，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会感到震惊的。可是施劳姆津会回家，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以及任何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人）阿米那达夫在靠妓女养活，住在一个廉价的窑子里——那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肮脏的窝。最后，她还会带着沙哑的声音说：当你遗弃你的祖国的时候，看一看你还能得到什么？

咱们叫辆出租车吧，阿米那达夫说道。这是小施劳姆津的儿子所特有的天真无邪。我认识一家又好又便宜的学生餐馆。

恰在这时施劳姆津又记起了二十五年前她和内海米亚的一次旅行，记起了那时他们如何住在巴黎，如何喜欢乘巴黎地铁。我们乘的是三等舱，她补充道，和那些迷人的巴黎人在一起。

不过他们早就变了，阿米那达夫顶了一句。可是她没听见，或者假装没听见。我想看看他们，她说，我们想重新做普通人，我们已经厌倦了那些上了浆的衬衫……对不对，内海米亚？他朝着那载满了历史的人行道嘟囔了几句。接着他们就去坐地铁。

三等车厢里挤得连条缝也没有。内海米亚悄无声息地忍受着。施劳姆津则在高声叫喊中忍受。他们怎么能受得了这些：大蒜和洋葱的臭气，跟一大群人生活在一起，一个月洗两次澡……就像来自我们舒克·哈－卡麦尔的贫民区的犹太人一样。内海米亚吃了一惊，开始拼命地读他的英文报纸。她尖声叫道：

内海米亚,你在毁你自己的眼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车开动的时候看书!还记不记得上次在贝文斯鲁克老爷家?从那以后我已经冲你嚷过多少次了?可是你做事总像个孩子一样。她又转向阿米那达夫:我不能相信他,我必须一直盯着他。他可不是普通人,他总是忘记这一点。他在世界上代表以色列,就像赫茨尔一样。他这是在自杀。内海米亚将报纸折起来,把头埋在手心里,发出了一声呻吟。这是无声的呻吟,让阿米那达夫心中顿时溢满了对他的家乡和对他青年时代的思念。也只有他才能听见内海米亚发出的这声呻吟。它来自那遥远的日子,那时内海米亚常常让阿米那达夫看他的邮票,而这时候施劳姆津会突然闯进来说:是回家的时候了,你母亲还在等着你呢。再说,内海米亚也很忙,但他又不好意思对你说。我的可怜的人!

他领会了她所传达过来的信息,但却朝着那挤满了人,并充溢着人的恶臭的汽车微笑着。

餐馆里挤满了画家,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等座位的人排成一行。阿米那达夫认识的那个老板正在用一块脏抹布抹着桌子。他们坐下来,随即过来一个侍者。侍者的白制服上染着污渍,头发油腻腻的。他给他们端上来一些清汤,还有煮过头的素菜,普通葡萄酒,以及一些味道不怎么样的奶酪。施劳姆津不让他们在这种不干净的地方点荤菜。肉里面一定有好多细菌,她说。梅毒在法国很常见,这你是知道的。应该让医生来给你检查检查。梅毒是一种很严重的病。你应该照顾自己的身体,至少在你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应该如此。内海米亚的肠胃很娇气,她在等他付账的时候又补充道。她把每一个硬币都检查了一遍,然后才让他把它们交给侍者。他还想在小费里添两法郎,被她抢救了回来。

他不懂事儿。在出来的路上她朝阿米那达夫解释道,一边

把那两法郎塞进自己的钱包。法国人吃饭的样子难看极了，她说，听上去她是在为法国人民的前途忧虑。阿米那达夫试着朝内海米亚笑笑，他可真善于逃避他的注视。

他们来到一家咖啡馆。在墙角隐约贴着一张告示：犹太人与狗禁止入内。这家店的老板不太懂历史，施劳姆津说。过了一会儿，趁她去洗手间的当口（她用英语解释道，我去往鼻子上扑点儿粉），内海米亚侧过身，迅速地说话了。他的眼睛里注满了爱。他说：我知道，情况一定很糟。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没钱了？

阿米那达夫回答得也很快：情况很糟，没东西吃，经费到现在还没来。不过以后会来的。在这笔钱拿到之前，你能借我些钱吗？我没钱付房租了。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正经吃饭了。再说，我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

内海米亚慌忙掏出钱包。他正在一堆钱里乱翻，施劳姆津出现了。她的粉涂得很快。内海米亚脸白了，他假装心不在焉地玩弄钱包。她高声宣布：内海米亚！那是政府的钱！

是我的，他还嘴道，话语中很紧张。

是政府的！

是我的。

成天照顾你，我已经很厌倦了，内海米亚。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你在这里代表一个很穷的国家，而小施劳姆津和黑市有瓜葛，她可以给她可爱的儿子寄点钱来。他已经患了梅毒，甚至在你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的手脚就已经都没有了。只要依靠她和黑社会的牵连，她能够很容易把以色列的资金转移过来，然后再在黑市换成法郎。这事不该由你来管。你还有官方的任务。

他不知怎么办才好。阿米那达夫很怜悯他，同时也怜悯她。

她继续说道:不用在阿米面前隐藏什么。他很清楚他妈妈做什么,就像你我一样清楚。况且,如果他真的想堂堂正正赚钱的话,他本来应该待在家里,找份工作。可他想到巴黎来,在他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他的祖国。你当然了解那些艺术家。他不管怎么样都想当个艺术家,这倒很像希姆哈的孙子。一个艺术家必须要尝过挨饿的滋味。他坚持要当一名艺术家,可是我怀疑他能否成功,因为最后毕竟还要凭点儿才能,不能只凭挨饿!谁都知道,不管他有没有才能,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挨饿的艺术家是没法画好画的。事实上,伦勃朗就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吃了。托尔斯泰为什么不把他画的苹果吃了呢?

内海米亚说:基金还没有来。他已经没吃的了。

这很好!到此打住。这适合他的性格,真是希姆哈的合适继承人。所有这些背弃他们祖国的年轻人——谁能被落下?

内海米亚还试图插话。

阿米那达夫连试都不试。

我们为什么要建国?她问。

内海米亚想出一个新对策:阿米那达夫为他祖国的独立战斗,受了伤……这难道不是他通过努力得到的吗?难道他不是经过努力才得到这个学习的机会吗?

画画吗?一个新成立的国家需要画家吗?让他学农,学建工,学化学。干嘛学画画?谁会在这儿生活?犹太人在巴黎上学,阿拉伯人却住在阿东斯基买来的土地上。他怎么突然有功了?阿东斯基为他的人民服务了五十年,他又得到了什么?有哪一条街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些无赖可真健忘。应该怪他妈妈。她在税务部工作的时候认识本-古里安、雷梅兹和芬斯塔克,是她跟他们建议说:别以阿东斯基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她还在替希姆哈打仗。她把儿子送到巴黎来,为的就是吸引妓女,

无所事事，乞求施舍。新一代的犹太人！解放了的犹太人！托尔斯泰，来自本－耶胡达街，在沙丘间游荡。

施劳姆津将内海米亚拽到外边。风在轻轻地吹。汽车疾驰而过。房屋灰暗。雨开始稀稀拉拉地下着。

内海米亚停下片刻，系上衣扣子。他的手滑进上衣口袋，掏出一包"表演者"牌香烟，将一张钞票塞进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用上衣作掩护）。他将香烟丢在地上，示意阿米那达夫拣起来。施劳姆津正忙着整理她的帽子。阿米那达夫尽量使自己感激的神情不流露出来。内海米亚小声说：别着急，我会再给你寄些来的。这点儿先用着。她每天晚上都要清点我钱包里的钱。我会跟她说，这张钱丢了。

但愿她会相信，阿米那达夫说。

他亲吻了施劳姆津舅妈的脸颊。她说：代我向你妈妈问好。给你自己买件新外衣，你穿得很难看。我们会给你寄张明信片的……对不对，内海米亚？还有，别忘了，来看看你的老舅妈。走之前，她又说：我今天下午得睡觉。我们要和法国外交部长一起吃晚饭。卢浮宫？那儿没什么值得看的东西……埃及雕塑，反闪米特人画的画。我需要睡觉，内海米亚。你可以准备明天的演讲。

施劳姆津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阿米那达夫心想，美丽得就像锐利的鹰眼。

第九章

我在星期三遇见了当老师的老纳忽米。他在街上走着，很疲惫。一个迷失了方向的男人，徒劳地寻求着施劳姆津。很多年以前，当小施劳姆津妈妈还在剧团扮演舒拉米特的时候，纳忽米就记得她。纳忽米在追求我舅妈。他怕到医院去探望。为什么要看到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场面？我不能去，他说。根本没有必要去……我想到我自己的身体，扭曲，粗糙。我还会在这儿呆多久？我担心。你在笑我？

没有，我说。我自己也担心。

我向他描述了医院的房间，施劳姆津那巨大而空旷的房子，以及她枕头下的钥匙。我们又谈起内海米亚的制服，因我表哥的名字而引起的那场战争，从来没装过一只鸟的镀金鸟笼，挂在墙上，却从来没有人看过一眼的画。我心中突然涌上一丝恶意。我突然说：她躺在那里，算计着她房间的花费，从日后的遗产中每小时减去十六里洛特。想像着阿米胡德头发灰白的样子。

纳忽米没有接我的话茬。他脑中似乎充满着遥远的幻像和毫无理性的情感，那些在并不存在的街道上的鸟正占据着他的心。那些我并不熟悉的岁月使他困惑，好像时间是世界上惟一实在的东西。他说：我们一定要理解施劳姆津，她身上有一种辉煌的东西。她仍然是一具摔碎了的偶像，倒在废墟中，像一座古

老的宫殿一样慢慢衰老。我引了一句爱默生的话:人是废墟中的上帝。

纳忽米掏出一个笔记本,激动地翻着,双手颤抖。他找到标着施劳姆津的那页,记下我的话。他又让我将这句话的英文写下来。我照着他说的做了。好极了,他说,一边把笔记本放进口袋。很对,这句话完美地表现了施劳姆津,表现了她的辉煌,从这个世界的主人那里得到的辉煌。一句充满了热情和暴风雨的话。

我们喝着果汁,沉默着。我接着想到,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这些认识她的人(除了她的儿子阿蒂·布兰德之外)都能在她身上找到一些值得我们爱的东西,一些我们无法确认的东西。我们都被她的魅力所俘获,她那狂野的性格,她的奇异。她的邪恶使我们着迷。

纳忽米说:你知道吗?她让老阿伯拉姆斯掌管她那乱糟糟的账户。

那个住在拉那那医院里的法官?

是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那个男人很老,非常老。他已经看到他的梦正在结束。他现在是什么?一个破损的工具。年纪和我一样大。他的一半身体已经瘫痪。人们得把他放在便盆上。可怜的家伙。他的灵魂已经死了。形单只影。从前,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不都曾有过梦想吗?你听没听过葬礼上的演说词?我们都是爱做梦的人。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角落。我们是锁链上的一环。空气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你怎么把它放进去的?废墟中的上帝?我们所有的人身上都有废墟中的上帝的痕迹。我说话的口气像个老

师——事实上，我是老师。我做了五十二年老师。多少青春在我手中枯萎掉。如果我说话很夸张，请原谅。我所看到的是现在的社会——电视，粗野的男孩，长头发。我感到无法理解……人们言语粗俗，话语中充满暴力。既谈不上温情，也没有神秘感。没有奇迹，也没有真正的愉悦。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外面，一片混乱。那些跟我学跳舞的女孩子们像花一样开放，这些花被那些年轻人摘了去，他们留着胡子，唱着爱国歌曲："上帝将建设加利利"，"犹太在血与火中倒下，犹太也将在血与火中站起来……"时代变迁……岁月流逝……我在哪里？阿伯拉姆斯甚至不知道，答案就在他手中？如果他知道的话，他能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吗？

纳忽米又喝了些果汁。天气晴朗，花从紫色的树冠上落下。他沉思着：重建时曾经如此圣洁的土地现在看上去已经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吉普赛人的脸。高楼。小汽车。噪音。误解。冷漠。空旷的房子。路。政府。然而梦是不能被人夺走的。我是一个老人，守着我的梦。你知道，我兄弟在二十年代背叛了这块土地，他跑到美国去，在那儿卖衬衫。他对我说：为什么非要在这块虱子和阿拉伯人四处滋生的土地上建设了又建设？他嘲笑我，阿米那达夫。他靠卖衬衫在一个叫长岛的地方建了大楼。施劳姆津说那是一个好地方。我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从我到这儿的那一天起——我那时十四岁——我就发誓永远也不离开。而我真的从没离开过，一天也没有。我住在雷赫夫·马莱茨的一所小公寓里。周围噪音很大，阿米那达夫。有一天，有一次会议，我是从杂志上看到的，所有的人都去了。会议设在曼恩演讲厅。你见没见过那座宏伟的建筑？他们看起来都很有钱，穿着华丽，开着豪华车子。戈尔达在那儿。我当然记得她来雅法那天的情景。我们在海边，看着犹太人从船上下来。那是一段

压抑的日子，很多人离开，却只有很少的人来。所有的人都来开会。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人们不停地谈论着过去的好时光。戈尔达说，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莫哈米亚的一间小厨房里度过的。萨皮尔也发了言。当我们把他最亲密的朋友带到加利利的时候，他还很年轻。我们那时坐在马背上，阿米那达夫。那是一场梦。在梦里，萨皮尔仍然是科斯洛夫斯基。戈尔达回忆起霍乱和蚊子。我的眼里充满泪水。那时我们是一家人，没有阿东斯基，没有施劳姆津，只有我们其他的人。你的妈妈，你的祖父，那里有很多著名人物。每个人都盯着我，我像是一个局外人。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属于这儿。我的背是驼的，也没有司机来给我开轿车。我穿得像我的祖父。

纳忽米提高了声音，咆哮道：会议过后我去见戈尔达，她被人群包围着。我对她说：你好，戈尔达。她轻松地打了声招呼，但她的眼睛并没有发亮。她没有认出我来。她的保镖把我推开。我想提醒她，她曾经滑到泥里，而我……可是他们将我推开，搜我的衣袋。他们将我带开，阿米那达夫，仔细搜我的身。老纳忽米，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教舍托克姐妹跳民间舞的人，却被保安搜查。难道我是恐怖主义者吗？

戈尔达冲着各种人微笑。人的碎片，而不是神。然后就离开了。她没记起来。可是听着：我兄弟后来回来看看，想给他自己在撒维翁建一栋别墅……我跟你讲过这个吗？没有？他为自己开了一个欢迎宴会，我那可爱的兄弟——他从他那衬衫王国来。他派了一个司机开车来接我。我不想这样，可他却坚持要这样。我到的地方是一座宫殿，阿米那达夫。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理石做的，闪闪发光。甚至还有从香港来的亚洲仆人。他们看上去像日本人，鞠着躬，嘴里滔滔不绝地念着：谢谢，谢谢。什么都是谢谢。我要水果汁，他们也说，谢谢。戈尔达她在那儿，

萨皮尔也在那儿，还有所有那些将军们，还有作家，都在我那受人拥戴的兄弟身旁穿梭往来。他们来赴宴，令人恶心的宴会。你知道，组成他的王国的不光是衬衫。在长岛五十年的时间他都用来压迫寡妇和孤儿，为老年人建房子，然后再偷他们的钱。现在他在这儿，看着所有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金制的衬衫偶像面前卑躬屈膝，真令人尊敬。他冲我笑笑，用俄语说：看他们在我周围跳舞！就连你们政府自己的脑袋都在转圈。他说，你在这里已经六十年了，吸干沼泽，吃疟蚊，在平斯克、伯尔和你所有那些社会哲学家身边建设，也被人建设。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需要有人在萨皮尔面前替你说句好话，好让他为你安排一间好一点儿的公寓？我是一个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的口袋鼓鼓的，而你毕竟是我亲爱的兄弟。我的亲兄弟在嘲笑我……

他说得很对。我回到马莱兹街的家中，坐在窗前，看着一群孩子在揍一只猫。即便是这样，阿米那达夫（纳忽米的声音变得十分尖利），他们也不能剥夺我的梦！他们不能把它从我身边抢走！我们所追求的是美丽的，独一无二的。有人曾经说过，一种思想不应该为采用这种思想的人负责……所以，戈尔达和萨皮尔在那儿，而我也在那儿！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一个灿烂的时刻，围绕着这个时刻，我们构筑了整个生活。那些建筑在俄国或波兰，为高墙所围绕的神圣社会，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吗？一个国防部，再加上一个爱乐乐团？这就是犹太民族所作出的伟大反应吗？要想获得拯救，需要好几代人！不仅仅是为我，也是为了戈尔达。但这是值得的，只为了那一个时刻。即便是为了你的大舅妈施劳姆津，也是值得的！

他不做声，又陷入了沉思。此刻，他的脸非常英俊，柔和而又神采奕奕。哪一个时刻？我问道。

他长久地注视着我。鸟儿扑啦啦地飞过晴朗的天空，紫色

的花仍然在落着。生活或许美好，或许丑恶，或许漫长，或许短暂，他说道，但除了我们能为自己所做的之外，生活中既没有公平，也没有不公平，不管我们是否满足了某种宿命，或者，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还能够成为我们自己。施劳姆津全身充满了仇恨，她从不忏悔，又像毒蛇一样狡猾。有那样一个瞬间，她所渴望的那个瞬间，那个瞬间塑造了她，将她刻在时空中。请注意我们的语言是多么简练。雕刻与渴望，毒蛇与狡猾……她的生命在渴望着，她时刻在渴望着。我已经跟你说过阿伯拉姆斯，那个住在拉那那医院中的老法官。他都快九十岁了。他有一次骑着驴从佩达·提克瓦到雅法，为的是摘花。阿伯拉姆斯过去常常制作干花。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弗拉迪亚·阿伯拉姆斯基。他遇见施劳姆津的时候，她才十六岁。那是那艘法国炮艇向瓦格纳的工厂发射了五枚炮弹之后五秒钟。那一刻在施劳姆津的一生中是一个顶点。她此后曾对我描述说：纳忽米，你是一个有趣的男人，一个滑稽的人，有好多不着边际的幻想。这些幻想就像蜘蛛网一样冻结起来。我曾经有过一个崇高的时刻，纳忽米。多年以后，我将这个秘密透露给那时见过我的一个人。那个时刻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的时刻……而阿伯拉姆斯却怎么也搞不懂，我为什么会那么信任他。不过我却知道，纳忽米说，用含泪的双眼幻想着施劳姆津。他总结道：她是一个很强硬的女人，阿米那达夫……尽管这样，你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吗？

没有，我承认道。

在邪恶和财富之间有某种微妙的联系，我对此十分肯定。她拥有一切：金钱，荣誉，残忍，权力，智慧，伪装。阿米那达夫，你是继承人吗？

不是。

遗嘱上有小施劳姆津妈妈的名字吗？

谁知道！我想没有。妈妈也肯定觉得不会有。

那我呢？他微笑着，一个破碎而忸怩的微笑。

你？我笑出了声。为什么是你呢？

她也许已经不想再继续压迫我了。为什么？难道她不给我剩些什么，好让我继续做梦吗？让我梦想我的梦？那些不眠的夜晚？不。我会在她之前死去的。我们都会死在她前面。她的遗嘱中一定会包含着一些残片，记录着她十六岁那年在雅法时的那个特殊的时刻。此外还有五百万美元的收据。

此外还有没有别的？我突然变得担心起来。

她会把她的钱留给以色列的土地，纳忽米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漫不经心，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占据了纳忽米的梦。自从那场有他那受人尊敬的兄弟和一群孤儿参加的晚会，以及戈尔达围着金牛跳舞以后，他的梦就终结了。

老纳忽米站起身来走着，驼着背，在人行道上找着自己的脚印。他又走回来，像一个英雄一样，没有脚印。他甚至没有向我告别。他来到施劳姆津家，站在紧闭着的门前，隔着长满杂草的大花园，花园里的常青藤上满是长久未经修剪的触须。他的眼里充满了柔情和渴望。

第十章

现在，让我们讲讲施劳姆津大舅妈一生中最特殊的那个时刻。这是由纳忽米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再由小施劳姆津妈妈告诉我的。我随后又转告给了她的儿子，阿蒂·布兰德。他怀疑地笑了，心想这个故事一定是我编出来的。

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施劳姆津十六岁。一天，她驾着阿东斯基的豪华马车从雅法往亚莫辛去，最后一次拜访可怜的哈瓦亚·阿萨姆·卡萨尼。

阿萨姆·卡萨尼曾经卖给阿东斯基不少土地、契约和建房许可证，包括各种至少在理论上说属于奥托曼政府的土地。卡萨尼能够通过各种曲折而又危险的渠道，将证书搞到手。这些证书装饰精美，印着漂亮的花体字。卡萨尼从那些没精打采的先生们手中搞到这些证书。他们在贝鲁特熬过他们最后的时光，喝着阿拉克烧酒，身旁有法国姑娘依偎在他们的怀里。卡萨尼这个老练而又饱经世故的调停人此时正被搞得焦头烂额。他的四周到处都是危险：犹太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他试图和所有的人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但他却无法肯定到底哪方会最终取胜。如果他偶然认识的年轻的阿拉伯人开始谈及大叙利亚，将巴勒斯坦称作南叙利亚，并开始撰写文章咒骂犹太人，他便会偷偷地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聚会，听那些狂热的犹太复国主

义者谈论锡安国、安那脱斯，以及示罗。早年在特拉维夫，当阿东斯基还留在雅法并拒绝在狭小的新移民区里住下的时候，阿萨姆·卡萨尼已经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一大块地，在这块地旁边的那块面积很大的土地上，后来建立起特拉维夫第一片城区。阿东斯基本人只承认有两种情绪。第一种是在一桩土地买卖成功或失败后所会有的快乐或者难过；第二种便是对他女儿施劳姆津的爱。卡萨尼对阿东斯基非常了解，因而对施劳姆津的赞扬毫不吝啬。事实上，他确实很尊敬她，并承认她的能力。后来建立起特拉维夫的那块地是以亚克布斯·科恩的名义买下来的，而他便是少数几个知道亚克布斯·科恩身份的人。不过后来，土耳其指挥官决定在雅法和新建的移民区之间设置军营，以破坏买地运动，并削弱新建立的移民区。雅法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街上跳舞，高唱着"打倒以色列移民区"。而阿萨姆·卡萨尼此时正在这群人中间，在笛子的疯狂伴奏下狂热地跳舞。他正在猛烈地旋转的时候，突然瞥见窗户上施劳姆津的脸。

她正在看着他，表情冷漠而阴郁。他顿时满心羞愧，便假装醉酒。她知道他没有醉，对此他心里也很了解。阿东斯基此时也正在观察着这一场景。她对阿东斯基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扫罗的女儿米切尔一样，眼看着大卫就像那些愚蠢的年轻人一样活蹦乱跳，心里充满了对他的轻蔑，这种轻蔑让我心满意足。阿东斯基说：施劳姆津，是他让我得到所有那些土地的。她像一个机械娃娃一样冲她爸爸微笑。卡萨尼看见她在微笑便朝她挥手，然后便继续和他的弟兄们一起庆祝特拉维夫的毁灭。

阿东斯基说：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一点儿也不实际。这块土地拒绝任何统治者，它会继续将他们赶走，就像它在这之前数不清的岁月里所做的那样。这块土地既不能容忍犹太人，也不能容忍以实玛利人。过来，我们一起喝点儿味道不错的咖

啡。卡萨尼会跳舞的，然后他又会拿更多的许可证来。他会为他这次愚蠢的表现付出代价的。他知道，连谁会是暂时的胜利者都很难预料。从长远来看，一个冷酷的神将取胜，他是人民和统治者的敌人，是这块苦涩的土地的主人，是不动产之王。

阿萨姆·卡萨尼生活在持续的恐怖当中。当他快要死的时候，阿东斯基派他的德国医生沃尔夫先生去看望他。沃尔夫先生也是阿东斯基惟一的朋友。许多年前，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曾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在此之前，他曾当过船长，乘船来往于太平洋：他因此到过很多地方，收集珍稀蝴蝶，将它们黏在玻璃板下。他几乎忘记了他的出生地——科隆。只要他还能够喝啤酒或是上好的葡萄酒，他便拒绝为自己虚度的光阴而哀叹。他的十一个妻子总共为他生了二十五个孩子。此外还有六个儿子，以及住在若干所修道院中的女儿。在噩梦中(这是他极少数清醒的时刻)他那些不认识的儿子和女儿们会出现在他在雅法的家门前。那是一座很漂亮的房子，周围环绕着巨大的花园。他们会敲着门，叫道：爸爸！他过去常常查看窗户是否关好。他将门闩好，坐在火炉边，手里举着一支上了膛的枪，在恐怖中等待着。曾经有一次，一个阿拉伯男孩敲门请他帮忙。医生朝他开了枪。这个男孩后来成了他的贴身仆人，照管他美丽的花园。他的家靠近雅法教堂。在礼拜日，沃尔夫先生常常热切地祈祷。在下午他会用密码给柏林一个神秘的小办公室写信。这些信件皆以事实为根据，内容既复杂又充满机智。谁也无法像他那样了解以色列的犹太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及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即便人们常常看见他处于醉醺醺的状态，他的头脑仍然聪明而富于决断，他的目光敏锐，能够穿越醉酒的乌云。他那堆金币在逐月增多。

人们不知道沃尔夫先生的名字是什么。靠在一艘太平洋商

船上当船长，他学到了医学知识。他喜爱阅读医学课本，这使得他能够以一个职业医生自居，在某些连真正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却能够取得成功。

那是施劳姆津因为一个特殊的时刻而感到无限幸福的一天。沃尔夫先生正骑马往阿萨姆·卡萨尼家去，为的是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彻底检查。阿东斯基给了他很多钱，并作了很详细的指示。卡萨尼不需要问任何问题，问题还没有提出来，答案就已经写在医生的额头上了。医生挤出一丝微笑，吻了吻卡萨尼发光的额头，给他开了药，然后就骑马回家。这时是早晨，天气迷人，充满了芳香。他一边骑马，一边自己唱着歌。这是一首希伯来歌曲，是他从女子学校的姑娘们那里学来的。他对她们垂涎已久，只是她们总是躲着他。他唱道：迦南的夜晚多么可爱……他在歌中将“迦南”唱成“大炮”。

此时，年轻的弗拉迪亚·阿伯拉姆斯基正在雅法的柑橘园中摘着花，他瞥见了远处的沃尔夫先生。沃尔夫一边骑马，一边带着德国口音唱着：迦南的夜晚多么可爱……阿伯拉姆斯基招招手，继续采花。那是一束怒放的花朵，在潮湿的土地上它那隐藏着的美丽让人感到惊异。它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夏天和一个短暂但又多雨的秋天之后，早早地开放了。

事情就是这样：正当弗拉迪亚·阿伯拉姆斯基充满热情地采着花，而沃尔夫先生骑着马，唱着一首伤感的希伯来歌曲的时候，阿萨姆·卡萨尼正烦恼而困惑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那最终时刻的来临。

他躺在那里，穿着白睡衣，头上系着阿拉伯人一样的头巾，看上去脸色十分苍白。他低声祷告着，手里数着琥珀珠子，热切而又悲哀地思考着一个充满了忙碌的天使的毫无意义的永恒。

沃尔夫先生回到阿东斯基那里。阿东斯基立刻起身前往他

亲爱的、将死的朋友那里。他随身带了一大张像羊皮纸那样的纸,为的是对他一生的交易作个结算。他等待这个时刻的来临已经许多年了。他一直在仔细地盘算着,当两只狐狸,两个经验丰富的老兵,或者是两个久经沙场的斗士为了一个一生才会有的生意机会而站到一起的时候,只有像离弦之箭一样的敏捷与精确才能使争斗的双方都获得胜利。

在这场精细的交易中,阿东斯基和阿萨姆·卡萨尼像两个象棋高手,而他们这场交手的结果则取决于一个出人意料的开局。阿东斯基手中正准备了出其不意的一招。他设计了他的朋友阿萨姆·卡萨尼的生病,然后又将沃尔夫先生介绍给他。十五年来,他一直坚持对阿萨姆·卡萨尼说,沃尔夫先生是巴勒斯坦最好的医生。现在该是发出致命一击的时候了。阿东斯基知道阿萨姆·卡萨尼在心中怨恨他的孩子们,他们宁愿选择住在遥远的地方:这些浑身洒满香水的不肖子孙,说着法国话,用他的钱过着堕落的生活。

于是阿东斯基便在阿萨姆·卡萨尼的榻边,一字一句地研究合同的细节。就是这份合同使他用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八千亩地,这样便宜的价格比他从前所付的要低得多。他假装漫不经心地掠过诸如政府授权土地买卖,以及需要三个合法签名等条款。而此时,阿萨姆·卡萨尼正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命运对我真不公平。死神找错了人,也找错了时候。阿东斯基会赚钱,而我的那些无赖孩子们却该哭了。他对自己笑了,但他马上又重新陷入思考。啊,这该诅咒又可怕的死亡,他小声说着,带着适度的悲伤。毫无疑问,阿萨姆·卡萨尼正在焦躁地和自己讨价还价,这是那些富有而又被宠坏的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所特有的方式,他们会把死亡看作是对他们个人的报复,而不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他对这个时刻感到恼怒。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时

候？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在清真寺那边坐着一个一百多岁的人，牙齿都没了，浑身颤抖，丑陋，肮脏。他睡在街上，靠残羹剩饭生活，什么也不做，什么贡献也没有，对别人毫无用处。以我的成就，以我所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早就死？上帝让阿赫玛德·依朔西那个可怜的老头儿活着，却让阿萨姆·卡萨尼死，它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天哪，那个老头儿躺的那块地方就是用我的钱买的……我们两个人中间，谁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贡献大？是依朔西还是我？

阿东斯基从阿萨姆·卡萨尼处出来，派施劳姆津去看望他。他替她雇了马车和阿拉伯马车夫，然后送他们上路。过了一些时候，沃尔夫先生所开的药力强劲的药开始产生一片迷雾，这可能是由于一些超自然的担心所造成的，也可能只是由于疲劳。阿萨姆·卡萨尼开始看见形状不定的灰云在他眼前漂浮。透过他紧闭的眼皮，他看见他从来没到过的城市，他从来没有漫步过的海滩，以及深红色的田野中的花朵。在阿萨姆·卡萨尼漫长而又充满动荡的一生中，他从未摘过花。

这是秋天的一天，天气阴郁可畏，但又充满辉煌。施劳姆津正乘着她的马车，去看望阿萨姆·卡萨尼。她手中拿着一束花，是阿东斯基和他的妻子给阿萨姆·卡萨尼的礼物。阿东斯基向她示意，要她在卡萨尼最后的时日里给他带来快乐。阿东斯基心想：毫无疑问，他会说，啊，花束，为了放在坟墓上，就像犹太人那样。我卖给你父亲一块墓地；现在，你想把我葬在那儿？不，我想要一个穆斯林的葬礼，没有鲜花，施劳姆津，只有给先知的墓志铭。

可怜的阿萨姆·卡萨尼并不知道，他将被葬在一块遥远的墓地，靠近雅贡河，在空旷的沙地里，靠近谢克的坟墓。他也不知道，有一天，那里将建起一座豪华的旅店，而这个为我们国家赎

回土地的人，他的坟墓将要被移开。他也不知道，阿萨姆·卡萨尼的名字将要被抹去，不留任何痕迹与回忆。这样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根本无法让施劳姆津感兴趣。她也从来不会对这感兴趣。当我告诉她，他们把阿萨姆·卡萨尼的墓地移走，在原地建了一座希尔顿饭店的时候，她在她的北特拉维夫的私人医院里这样说：那又怎么样？当你出生的时候，他们在你祖母的家里埋了一个瓶子。你猜猜那是谁的瓶子？你妈妈的？那是施维多夫先生本人给我的瓶子。你妈妈曾经问我：能放在我那里一天吗？我便把瓶子给了她。你猜猜他们怎么着？他们在里面放了一个字条，然后把它埋在房子底下。你妈妈把那个瓶子还给我了吗？你为什么替一个已经死去的阿拉伯人操那么多心？那些偷越过边境，轰炸我们北部定居区的人就是他的孙子！对不对？

施劳姆津也不为沃尔夫先生担心。此刻，他正在去找阿东斯基的路上，将许诺给他的那块绿宝石拿到手。紧接着，他便在一家小咖啡馆与性情粗暴的司令官会面，那个司令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情报员带给他的情报：即英国叛军和他们的犹太人同伙即将对南叙利亚发动攻击。沃尔夫将宝石卖给他以后便买了德国人瓦格纳的汽车，这个德国人的工厂马上就要被五发炮弹摧毁。然后他就给德国皇帝写了一封秘密的信，信中描述了犹太人如何背叛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如何背叛犹太人，声称德国人很快就要悄无声息又不费武力地占领这个地区。至少他们这样希望。

在她对卡萨尼的拜访期间，施劳姆津所表现出来的悲伤将是有节制的和聪明的。他会理解她的。她既不会流泪，也不会口若悬河。她会表现出适度的悲伤，满是鲜花，美丽和寒冷。他将会懂得感谢她的来访，即使他很清楚是谁派她来的，以及为什

么派她来。毫无疑问，阿萨姆·卡萨尼会想：人与人之间是不允许有虚伪的——对此阿东斯基和施劳姆津持相同的见解。一个人必须承认仇恨与嫉妒，但仍然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卡萨尼对自己说，在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则。而他则专心想像着天堂之门，以及在他混沌的意识中飞翔的鸟儿。

第十一章

这是秋季里的迷人的一天，天空蔚蓝而清爽，像一层薄雾一样。周围的宁静像是羽毛聚集在一起。海面平静，微波不起。道路两边是柑橘园、仙人掌篱笆、茉莉花和夹竹桃丛，香气中混杂着薄荷和阿拉伯树胶的味道。树枝的轮廓清晰，像是被一位细心的妈妈沐浴过，看上去十分规整。施劳姆津坐在马车里，穿着一件白纱裙，领子像小横幅一样，头戴一顶精致的花边帽，手里攥着白手套。她的手里拿着一束花，包在薄纸中。当施劳姆津瞥见那艘船在海平面上出现，并缓缓向岸边驶来的时候，她叫马车夫把马车停下来。过了一会儿，船上的桅杆、旗帜、舷窗、大炮便都看得见了。在平静的海面的衬托下，它们带有一种轻松、可人的气氛，静立在水中，浸在水面上映出的天空中。然而，这一景象却让施劳姆津觉醒，一种无法言喻的暴烈的感觉使她震动。她将花束贴紧她狂跳的心；她的手攥紧玫瑰枝，玫瑰刺入她的手，使她身体里涌入一阵突如其来的快感。她渴望在丛林中狩猎，渴望在一个传奇故事中被绑在火刑柱上，渴望呐喊，渴望爆发。有一些危险的东西在一瞬间突然都在她身体里爆发，不管她多么的清纯，不管那天的天气如何迷人，甚至比她后来回忆起来的要好得多。淡淡的白烟从船上向上空盘旋，差一点儿就触到了在天空中盘旋的鸟群。施劳姆津的脸庞精致可爱，深色

的眼睛陷在紫色的眼窝里。她带着明显的愤怒望着，而此时细小的波浪正像苏打水的泡沫一样，舔着被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海滩。

在平静中，施劳姆津察觉到一些偷偷移动着的人影，他们的动作很快，使她看不清楚。马儿在远方奔跑，卷起一阵尘土，像烟囱中冒出的烟一样冲入围裹在甜蜜中的寂静。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些烟不是真的，她从远处看来，它们就像画在一块大帷幕上的狮子和老虎一样。她，施劳姆津，那时是一个五岁的孩子，穿着好看的裙子，手里拿着一门玩具大炮，向假想的敌人开炮。她正在照相，背景是丛林，为了这个永恒的纪念。那时她是一个可爱的鬈发女孩，在阿布·哈姆迪设在布斯特斯街上的摄影室里。两只锚抛入水里。然后，在一阵噼里啪啦声中，一只白色的划艇被放入水中。当起重机将划艇放入水中的时候，有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个穿着耀眼的白衣服的人)直直地站在船上。小船脱离了大船，向岸边驶来。一长、两短三声口哨刺破天空。有的旗子降下来，有的升上去。戴着小望远镜的水手在甲板上穿梭。船上大炮的护套被卸了下来，炮好像在瞄准施劳姆津。炮筒稍微抬起，然后又放下，最后又调整到适当的位置。只有在这时，这个平静的场景才变得具体起来，即使它本身始终非常具体。所有的事情都在向一个未知的、但是摄人心魄的结局快速推进。尘土落下，马儿跑到了岸边的某个地方，正对着那艘船。能够看见几个骑马的人，他们中的三个人朝水边走去。施劳姆津从后边辨认出哈桑·贝克的罗圈腿和伯哈·阿拉丁的豪华外衣。马匹逡巡着，发出惊恐的嘶鸣，在松软的沙滩上踩着蹄子。施劳姆津的车夫刚刚还坐在座位上，现在突然大叫：那是法国人的军舰！在这一刻之前，她只意识到人们之间的距离。她听说过一场可怕的战争就要爆发；现在她才懂得战争能够变得多么

辉煌与高贵。

船划过水面，像镶嵌在水晶中的一个玩具。土耳其人在不断喷着鼻息的马上疯狂地打着手势，他们的目光集中在那渐渐靠近的船身上。背景中的船笼罩在迷雾中。伯哈·阿拉丁的后背僵硬地紧绷着，像被拉紧的弹簧。施劳姆津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身体能够这样紧张。水面上驶过的船就像去年夏天她和她爸爸在卡尔沙德听到的《天鹅湖》音乐一样，而这船与伯哈·阿拉丁紧张的后背之间形成的有趣的对比，使她着迷。她想，野性与精巧的对抗，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这种定义带给她一种强烈的沉醉，即使她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准确地描绘出来。她对自己解释说，这一切的辉煌与宏大，或许还有土耳其人的绝望，以及这即将迸裂的平静，都让她着迷，或者让她屈服。她自己仅仅是一件肃穆的舞台布景，是精巧的舞台效果、灯光、帷幕以及背景的一部分。伯哈·阿拉丁无法和受人尊敬的犹太人守护人的形象相比。纳忽米老师在上民间舞蹈课和教民歌时无数次地提到了这个英雄。他也不像一个拒绝宗教的犹太青年，跨上马，肩上扛着枪，去往加利利的山冈，为的是重新打造自己，向人们宣布：冲破篱笆的人会被蛇咬。他们的服装是一样的——胡子与绷紧的脊背——但是在被纳忽米理想化了的形象与伯哈·阿拉丁的形象之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差别。在一场盛大的游戏中，每一方都承认对方的实力，每一个敌人都渴望着他的对手。在这场游戏中，伯哈·阿拉丁就是被瞄准对岸的大炮所崇拜的敌人。她回忆起那场在卡尔沙德的《天鹅湖》演出，一个穿皮衣、戴提洛尔帽的古怪老头儿向她鞠躬，脸色变得苍白。他说：您永远的仆人，弗罗林！那一晚上他便断了气，在他脏乱的屋中的床边，一张发黄的纸上潦草地写着她的名字。她去参加了葬礼，目睹她的年老的崇拜者被放进坟墓；她无

法哀悼他。她心想，天鹅与憎恨，被她从来没有用过的词唤起。和平与喷鼻息的马……胡子在白色的身影衬托下更加醒目，像是刻在黄油上一般，在一艘水晶船上朝着被夸张的愤怒移动。鸟群继续在明亮的天空中表演他们令人目眩的绝技，施劳姆津平生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被她自己以外的不朽的事物所迷醉，这些美丽的事物镌刻在不可能在别处存在的、完全不掺任何杂质的大理石上。她也许隐约想到，她此时身穿白裙、手持鲜花所参与的这一刻是生命攸关的一刻，从这件事以后，什么都变了。整个世纪，也许是整个千年，都被密封了。从此以后，世界将不再是她和她爸爸所描绘的图景的反射，即使别人都无法理解他们。也许世界上已经没有，也不会再有任何冲突。她，施劳姆津，是最后的挑战。她刚刚消灭了她的敌人，一个都不剩。

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蔑视她在学校的同伴，蔑视那在夜晚的喊叫和耳语，以及那些伤感的歌曲。同时她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爱这块绝望的、布满伤痕的土地。她以梦和果园为单位来衡量这块土地，土耳其官员、德国工程师和地位显赫的犹太人都来这里建设梦的城堡。她想起希姆哈那个相貌英俊的教师，他经常骑着驴子去内弗－塞德克的女子学校。

她于是作出一个决定。她想起了希姆哈的儿子内海米亚。她见过他两次，但她从未把他放在心上。现在，当她面对着伯哈·阿拉丁僵硬的脊背，当她面对着一个即将爆发的伟大的时刻，而那艘船正悠闲地向前逼近的时候，她却突然被震慑住了，被内海米亚，被她的生活、被她对他顽强的爱，被他对她疯狂、神秘得近乎天真、绝对、直至终极的爱所慑服住了。她的整个未来仿佛都在那一刻展开了。

施劳姆津曾经见过内海米亚两次。一次是在莱赫夫·赫则尔街上，住在那条街上的人们认为那条街在犹太历史上占据着

独特的地位，是将两千年的流放与以色列古老的荣耀连接在一起的交叉路口。这一天，这个超越历史的交叉路口挤满了人。学生们从大学预科学校出来进去，彼此打着招呼。街上几座一两层高的建筑看上去像是被这激动的场面弄呆了。希姆哈和他的儿子内海米亚正匆匆忙忙地朝某处走去。内海米亚那时十七岁，十七乘以两千年的苏醒。但是在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看上去总是十七岁。然后女王施劳姆津和亚述国王内布查德内察就出现了，内海米亚事后这样说。阿东斯基对她说：希姆哈的儿子与他的父亲非常相像，整天梦想着埃及硬币上的孔。如果不信仰这块土地，便不会信仰犹太人民。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家能够将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但是由于有那些能够看清楚硬币的孔周围有什么东西的人，我们的人民便能够得救。希姆哈连那个孔也不值。

她没有把这次相遇放在心上。也许根本就忘了。

他们另一次见面是在体操馆的院子里。他咧嘴冲她笑，对她说：施劳姆津女王，随我到海滩上去吧。我们将研究沙滩学，我的美人儿，——“因为海龟的声音能够在土里听见”。

她转过身，而他面对的是特拉维夫最美丽、也永远是最美丽的后背。

她现在才意识到，内海米亚爱她爱到发狂的地步。他的形象开始变得实在起来，开始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他是她全部的生命，而她也是他全部的生命。他将成为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父亲，她的后世子孙的祖先。她会用她的身体庇护他，将他从两千年来第一个希伯来大学预科学校的梦境中拯救出来。

在雅法海岸的礁石上，望着渐渐驶来的船，她心中与他订了婚。

寂静仍未被打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枪向着施劳姆津

瞄准。她在想:给阿萨姆·卡萨尼带的鲜花?放在坟墓上的鲜花。我的青春将要被埋葬在那里,因为我不久就要结婚了!

施劳姆津平生第一次被怜悯所压倒。对自己的怜悯,对内海米亚、对土耳其军官、对那永远无法再回来的那一刻的怜悯将她征服。

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一刻里。她知道,从此以后,她将不会再成长,再变化,再依靠任何事。她未来所有的时刻都被这短暂的一瞬所创造了,激发了。

这条逐渐靠近的船和伯哈·阿拉丁僵直的背影(他是这块土地的所有统治者当中最残酷的一个)形成某种张力,这张力对她来说如此鲜明,等同于她的爱情。她仔细打量着这艘船,看着船上的男人。那人穿着耀眼的白制服,戴着色彩鲜艳的帽子,手里拿着旗子。他手中的旗子并没有舞动。船在丝绸一样的波浪间优雅地行进,使得他的姿势看上去盛气凌人。船一靠岸,两个划桨手便跳下船来,等待着年轻军官下船、登岸。他们俩向他敬礼,然后便在他后面牵着船。军官小心地踱着步子,停下来,在晃眼的太阳下眨着眼睛,并把旗子递给站在一旁候命的一个划桨手。他又敬了一个礼,并换了一个较为轻松的姿势。军官朝仍然在马背上的土耳其人走来。他们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假装毫不在意地还了个礼。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说一个字。不过施劳姆津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些大人物(包括伯哈·阿拉丁和罗圈腿的哈桑·贝克)也都被这不真实的、令人困惑的场面迷惑住了。她的马车夫刚发出一声哀叹,又用他多毛的手把声音抑制住。施劳姆津心里充满对他的厌恶,因为他玷污了这个美妙的时刻,使她无法聆听这乐声,以及帷幕即将落下时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帷幕在卡尔沙德的小剧场里落下来时那样。

年轻的军官没有听见马车夫的哀叹。马车夫的脸仍然埋在双手里。军官从腰间抽出一卷纸,也许是羊皮纸,然后将它递给伯哈·阿拉丁。他在嘴里嘟囔着法文。

伯哈·阿拉丁听不懂。

一个土耳其人从后面走过来,接过羊皮纸,大声读起来。伯哈·阿拉丁注意地听着优雅的法语,然后又听着生硬的土耳其语翻译。翻译的法文念得很流利,还带着炫耀的神情;而他的土耳其语却很蹩脚。划桨手们仍然笔直地站在水边,任太阳烘烤着他们的头顶。

在这封信里,法国舰长以法国舰队司令、法国政府和军队首长的名义,请求雅法的司令官能够给予他特许,使他能够朝德国人瓦格纳那间坐落在雅法沙丘上的工厂发射五枚炮弹。那个土耳其人停顿了一下,朝施劳姆津身后的一个地方指了一下,又继续念道:因此,船长以上述名义,希望他的要求能够被认真考虑,并希望他的上述行动能够得到适当的报酬。最合乎逻辑的回报——土耳其人念完又继续翻译道——将是:在船朝德国工厂开火以后,土耳其人立即朝船上发射五枚炮弹。法国人进而要求,上述的五发炮弹——假如土耳其人真的发射的话——应该延迟到他们的船起锚以后。

这时土耳其人开始后退。伯哈·阿拉丁、哈桑·贝克还有另外几个高级官员开始商讨这个建议。他们激烈地做着手势。

此时的施劳姆津紧张而关注,浑身燃烧着无声的热情的火焰。她知道雅法既没有大炮,也没有人来发射它们。当她望见土耳其人点头、法国人敬礼的时候,她对自己笑了,即使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笑。法国人一还了礼,两个划桨手便朝他们的船示意。甲板上的旗子升起又落下。水手们来来往往,用小望远镜研究着海岸。施劳姆津望见伯哈·阿拉丁身上的紧张在消失,后

背放松下来。他优雅、沉着地朝法国军官敬了个礼，就像一个男孩在参与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背景中的船显得如此愉快与颓废，以至于施劳姆津从她的花束上扯下一朵花，然后将它疯狂地抛向她的马车夫。此时她的马车夫仍然在那里颤抖着，将头埋在手里抽泣。

伯哈·阿拉丁下了马。军官走上前来，吻他的双颊。伯哈·阿拉丁显得很吃惊，慌忙用手擦脸，紧接着就疯狂地亲吻那个瘦弱的军官。他身后跟着又矮、又胖，罗圈腿，长着浓密的大胡子的哈桑·贝克。哈桑·贝克用一大串热情的亲吻回应军官的敬礼。军官紧张得身体几乎失去平衡，脸上绷紧，努力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在远处，施劳姆津注意到那微笑下面掩盖着的不安。当那个瘦弱的法国军官被三个狂热的土耳其人在一阵孩子般的快乐之下疯狂地亲吻时，她在一旁注视着这令人痛苦的场面。在她看来，那个军官就像是一朵精致的花和一个上了弦的洋娃娃的庄严的组合。他在动作中表现出来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他在动作中表现出来的完美，看起来就像是刻在他的身体中一样。然而他看上去仍然那么天真、孩子气、可爱，又有些愚钝，好像在哼唱一支消失已久的老歌。她对自己解释道，这是传统，法国传统。她的注意力转向钢琴、音乐老师、昏暗的房间中温柔的陌生人。您好，马赫卢夫先生，晚上好，阿卜杜－哈米德先生……香水的香味，隐约的伤感，薄瓷茶杯中的一撮糖，夜晚降临时在凉爽的微风中的下午茶。

土耳其人由于被这个重要但又有趣的事件所激动，给予那个军官无数的亲吻，而那个军官变得越来越苍白，虽然他的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最后，他从一个划桨手手里拿过旗子，先向旗子、然后又向土耳其人敬了礼，然后就向他的手下人示意。他等着他们把船推进水里，登上船，立正，手里高举着旗子。小船朝

着大船一片闪烁的银光划去。

土耳其人迟疑了片刻，惊讶地凝视着这具有威胁、又干净利索的动作。然后他们就掉转身，朝城里的方向快马加鞭地奔去。飞扬的尘土与沙砾遮蔽了地平线。马车夫催促施劳姆津，她轻蔑地将他赶走。他困惑地望望她，耸了耸肩，将马系在树上，溜到附近棕榈树丛中一些废墟的掩护下。惟一能够看见的是他的香烟的烟雾，从破损的窗户中飘散出来，而他正试图用碎石块将窗户塞住。

施劳姆津身穿白色的新娘装，手持花束，面向大海站立着。她全身充满了快乐，一种介乎残忍的胜利感与绝对的屈服之间的感觉。

马蹄声……此刻的施劳姆津正在安排她和内海米亚的婚礼，塑造她的生活，抚养她的孩子。所有这些都不带任何过度的惊喜。一切都已经被事先预料到了，但仍然使人惊奇。她的车夫叫喊着，但她并没听见。在她身后，在山上，德国人瓦格纳的工厂附近，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启动一辆汽车。能够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以及一条狗的持续而长久的哀鸣。施劳姆津并没有往后看，甚至当她听见瓦格纳的车从土路上驶过的时候她也没转身。

瓦格纳的车是雅法惟一的一辆小汽车。孩子们朝它扔石头；蒙着面纱的女人们诅咒它，嘴里念叨着咒语，以保护她们不受邪恶的眼睛的伤害。从车中散发出来的恐惧的味道使施劳姆津有了反应，她不用转身便知道那是瓦格纳先生在开车。他头上戴着一年四季不离身的太阳帽，嘴里含着雪茄，他那些穿着华丽的夫人们在催促着他。她知道，无论是他们，还是任何别的人（可能除了伯哈·阿拉丁以外）都无法领会这一细腻的时刻。她有一次曾对纳忽米说，他们错过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时刻。他

们活着，他们死去，对那些伟大的时刻毫无所知。我记得自己被生下来，在什么时候、怎样和在哪儿被生下来。而且，我死的时候也将是醒着的。当那五发炮弹发射的时候，我在那儿。那是我生命的中点，正中点，我从里到外注视着那个时刻。

施劳米特婶婶过去常常一边喝着香浓的咖啡，一边说：她不会错过的，这很清楚！她会像看贝特·戴维斯的电影一样看着自己死去，包装得像色彩鲜艳的礼品一样来到天堂或者地狱之门，那是她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她将教给上帝什么叫做热情。其残酷对她来说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施劳米特婶婶说，施劳姆津大舅妈一直在乘着玻璃底的船穿越生活，在下水道中航行。她了解所有事物的价值；她从远处对邪恶嗤之以鼻……你知不知道，她收集了满袋子的硬币？她处处节约，与别人讨价还价，攒下一笔财富。内海米亚去世的时候，她将那袋硬币扛在背上去了银行……你知道她在三十五年里攒了多少小钱吗？甚至还不包括她在巴黎和伦敦当大使夫人，和格拉夫·波托斯基一起吃饭的那段时间。

多少钱？（在我们家里，带修辞色彩的问题代表一种亲密。）

她有十五万六千里洛特。全都是硬币！

施劳米特婶婶若有所思地喝着她的咖啡。

施劳姆津那时不知道施劳米特婶婶在多年以后对她所作的评论。她站在山上，燃烧着热情，看着大炮进入位置：大炮被抬起，放下，瞄准。红色和黑色的旗帜在高耸的桅杆上跳着旋转的舞蹈。她带着尴尬和快意微笑着，花束紧贴在她的衣服上。就这样，施劳姆津感觉到，五发炮弹以一两分钟的间隔像电流一样飞快地划过她的发梢，四周回响的爆炸声将她震慑，而这爆炸声则使她四周的俗世震惊和感到羞辱。发射的间歇则是一片寂静，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穿插在巨大的爆炸声中间的是她

的车夫躲在掩体里的抽泣声。鸟儿在惊恐的悲哀中盘旋。两枚炮弹击中了工厂,另外三枚在附近爆炸。接着又听见几声枪响。鸟儿又恢复了它们优雅的姿态。海面也恢复了平静。船起锚,将船首对着岸边。一瞬间的背叛与紧张。施劳姆津知道没有人会瞄准她。烟雾从船上蔓延开,旗子在荒凉的甲板上升了又降。

令人提心吊胆的十分钟,充满危险。死一样的寂静,连一声马嘶都没有。能听见零星的几声枪响。一缕烟从瓦格纳的工厂冒出来。先是一声汽车喇叭声,紧接着是一声狗的哀鸣,在远处回响。马儿们喷着响鼻,停在路上。施劳姆津的车夫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然后,法国军舰鸣响了汽笛,发出一种隐藏在惊慌下的轻蔑的音调,转了个圈,掉头朝海平面驶去。

一群被烟雾和桅杆的美丽所迷惑的海鸟在后面跟随着,疯狂地转着圈,组合成惊人的芭蕾图案,形成大胆和有想像力的图形。烟升得越来越高。身穿白衣的消瘦的军官像一朵精致的花,举止像一个上了弦的洋娃娃。他的形象印在施劳姆津的视野里,然后与寂静合二为一。

第十二章

施劳姆津大舅妈理解这一刻，为这一刻而欢喜。她曾经对我说：我崇尚那一刻。可是阿布－奈姆却躲在废墟里。

她的儿子阿特对我说：她谁也不同情……他不相信会没有伤亡，甚至连瓦格纳的工厂也只是部分受损。

现在也一样。在特拉维夫北边的私人医院里，在那些她忘记了所有事情的日子里，她没有忘记当炮弹擦过她发梢时那辉煌的一刻。她说：纳粹的工厂被摧毁了。他们在出生之前就是纳粹。

她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她怎样在那一刻诞生了自己，并把内海米亚作为自己的丈夫。

小施劳姆津妈妈纠正她说：是你嫁给了他。

是我要了他！她愤怒地还嘴道。蠢货！我是说，是我要了他。我知道这其中的区别。

啊，小施劳姆津妈妈说。

然后我想到了“怀胎”这个词，施劳姆津大舅妈继续说。

小施劳姆津妈妈的脸红了。

别做鬼脸，施劳姆津大舅妈在明亮的病房里对小施劳姆津妈妈说。因为你没剩下多少脸面了，别再嫉妒我了。你长成那个样子并不是我的错，医生们疯狂地爱上我也不是我的错，他们

总是爱上我——我能怎么样呢？有没有人说过，上帝是公平的，他总是遵守规则？给你找对象可不太容易。顺便问一句，你那可怜的纳夫塔里怎么样了？

他三年前就死了。施劳姆津妈妈平静地说。

这不是什么悲剧，施劳姆津大舅妈说。对他，对你，对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是。你会找到别的人的。在你这个年龄，男人要的是钱，不是相貌。而且不管怎样，你有钱。你肯定能在纳忽米那儿找到个什么人。他们星期五晚上便聚在那儿，分享鸡汤和记忆。那儿可提供足够的鳏夫。你有钱、有公寓，还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很困难的。

从这一天起，施劳姆津大舅妈便打定主意，认为我妈妈已经秘密地与一个年轻人结了婚，但却不敢把他带到医院来，以免他也和别的年轻男人一样爱上她。把他带到这儿来，她说，我会把自己弄得和你一样难看的。我不会告诉他你偷我小地毯和银子的事儿。

有一次，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小声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那个年轻的丈夫刚才在这儿，他还试图……你猜怎么样？跟你外祖父一模一样。你知不知道你外祖父也曾经有这种企图？别感到奇怪。他跟每个人都来这一手。我刚跟内海米亚结婚，有一天晚上他就来了，也试图那样。告诉我，她说，你妈妈的新丈夫——他比你大吗？

不，我说。他比我小。他念十二年级，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只有一只眼，有一半犹太血统。他被判有叛国罪。他杀死了自己的妈妈，还不止一次。他卷入一场密谋推翻政府的阴谋中。他是个时装设计师，他只会说英语和阿拉伯语。他连割礼都没受过。

她瞪了我半晌：你怎么知道他没受过割礼？你和你妈妈讨

论那种事情？

他是我的养子，我说。差不多是我生了他。

多好的家庭，她说。你，施劳米特婶婶，还有你妈妈！

说得很对，我说。

在这期间，她对妈妈说：你来这儿，以为能够得到什么吗？实际上，我确实想到了"怀胎"这个词，而且我也确实让内海米亚做了我的丈夫。你假装是我丈夫的妹妹，来这里乞求施舍。你什么也得不到……你的样子看起来糟透了，她又说。你看起来很疲劳，是偷东西把你累坏了。你再也不会拿到我的钥匙了。我的医生们在保护我！

妈妈什么也没说。

我说"怀胎"，施劳姆津大舅妈又重复道。

我听见了，小施劳姆津妈妈说。她十分难受，但语气仍然温和。

施劳姆津大舅妈毫无顾忌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灰暗的天空。快要下雨了。我怀孕了，她说，在我身体里，怀着我自己！

她对文字总有一种奇特的才能，我评价说。老纳忽米纠正我：过去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几乎是神赐的才能。我们珍视那些追随我们的人，他悲伤地说，那些羞辱我们，用匕首刺穿我们的人。

在我身体里，怀着我自己！

小施劳姆津妈妈重复着这句话（我后来又重复给老纳忽米）。她试图同情施劳姆津大舅妈，心想：她是怎样在剑拔弩张中找到这样富有人性和有教养的词的。

我离开妈妈家。这是星期六的晚上，天下着雨。我心想：为什么不写写施劳姆津舅妈呢？我走上罗斯切尔德大道。在紫色树冠的枝杈浓密的树木的包围下，阿东斯基的楼房在夜晚显得

很空旷。一条停放小汽车的大道。我走到施劳姆津的房子前，房子很安静，被九重葛环绕着。院子里是我舅舅四十五年前栽的树，那时他为阿戎森工作。四周一片寂静，穿着短裙的秘书们过去曾在租来的打字机上敲着一式三份的信件，现在却在夜总会跳舞，闲逛，躺在温暖的床上，看着电视中的惊险电影。我悄悄溜进院子。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每次我经过那扇巨大的、吱吱作响的门时，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恐惧。院子里散发着草的潮湿气息。草地因无人照料而疯长。我仔细观察着这所房子的后墙，那里仍然留有三十年前存在过的狗窝的痕迹。我等待着。瑞克斯会不会冲出来迎接我，闻我的裤子，希望得到爱抚？在这个院子里阿帕沙德曾给我看过一些照片，上面是一个裸体的女孩和男孩在开罗的一间堆满旧家具的房间里。然后施劳姆津就突然出现，她脸上的表情既严厉又充满了轻蔑。她对她儿子说：如果你用手干那个事，那你就没有用来尿尿的东西了！阿帕沙德的眼中带着疯狂的敌意盯着她，仿佛他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后来他便拿起施劳姆津刚刚从裁缝维索夫斯基太太那里试好并买来的裙子，把它抛进瑞克斯的狗窝。

我的表哥将裙子铺在地上，在上面放了两块多汁的骨头，召唤他那心爱的狗过来。瑞克斯吓得直发抖，它的舌头上淌着唾液，拒绝分享这顿美食。我表哥命令道：去呀，瑞克斯，去！动手啊，你这个狗娘养的！可怜的阿帕沙德嘴里不停地诅咒着，结结巴巴地蹦出每一个音节：狗—狗—娘—娘—娘—养—养—养的。狗儿耐心地等他说完。表哥的脸由于激动而涨红了。他开始四脚着地。此时他穿着三角裤，这是他的贵族学校（赫兹里亚中学）和特拉维夫金童的标志；戴着贝蒂·格拉堡奖章，衬衫袖子挽到肘部。他用舌头舔那块骨头。狗开始叫唤。它因为嫉妒而愤怒地哀嚎。我表哥爱瑞克斯胜过爱世界上任何活着的东西。他

太喜欢这只狗了，以至于施劳姆津舅妈不允许狗呆在家里。有的时候，背着施劳姆津，我表哥会和瑞克斯在狗窝里过夜。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舅舅开着一辆T型福特车，罗斯切尔德大道上的人们将土地卖给英国人，建军营，为了爱国主义而行骗。在那些金色的日子里，阿帕沙德常常和瑞克斯一起睡觉，尤其是在夏天。有许多次灯火管制；吃光了大量的酸乳酪；跟英国人打了很多轮网球；我舅舅的发明则推进了盟军的事业。施劳姆津在这段时间一边用薄瓷杯喝着茶，一边训斥小施劳姆津妈妈：你儿子阿米那达夫爬树，划破裤子，在移民营里和共产主义者来往，跑到北部去建新的定居点，在那儿他们很快就会遇到一大堆裸体女人，跟他们生孩子。可是阿帕沙德却打网球，在雅法给从来不涂脂抹粉的女孩拍照，和出身良好的年轻小姐一起参加晚会！你儿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成一个男人？

瑞克斯终于跳过来。它先贪婪地舔了舔我表哥，然后便开始大口咬那块骨头。它把一块骨头藏在裙子下面，然后便开始刨，直到把裙子撕出一个大洞。它啃第一块骨头的时候便将另一块塞在裙子底下，还没等啃完便去找那块藏好的骨头，把它刨出来。它以疯狂的速度换着骨头，总是把一块骨头藏在裙子下面，而那条裙子看起来与其说是一件衣服，不如说是一张破网。裙子上的洞给阿帕沙德绝望的双眼带来了光芒。

正在这时施劳姆津大舅妈突然出现了。她沉默了片刻，用无声的仇恨盯着她的儿子，然后她又看着我。她的举止像一只受过训练的动物。她在压抑、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将目光盯在儿子身上。他的膝盖在颤抖。狗后退到一个角落，开始哀鸣，然后就开始狂吠。施劳姆津舅妈看都没往它那个方向看一眼。它蜷起身，想要靠近我表哥，但阿帕沙德把身子移开了。这时瑞克斯犯了一个它短暂的一生中致命的错误。它朝施劳姆津的方向走

去，想要拯救自己。它试图舔她的腿。我表哥突然发出一声狂乱的呼哨。

施劳姆津舅妈抓住那根平常用来锁小窝棚的棍子，朝瑞克斯打去。那是迅猛的一击，就像日本武士发出的一击，然后她就不见了。

这一击足以让人粉身碎骨。

血从我表哥嘴里喷出来，仿佛被击中的是他。他的嘴干燥，血从里面喷出来。我赶快离开。施劳姆津舅妈在前门拦住我：从院子那边走，她说。没人请你来，你应该像一名雇工一样的离开。

从那一天起，瑞克斯就一直在哀号。每当我表哥去上学，它便被拴起来。施劳姆津朝它身上泼水，把它的食物放在它的锁链的活动距离以外的地方，这样它能够看到食物，却够不着。在晚上我表哥会给它拿来吃的。

后来我表哥去参加一次学校组织的出游，要离开五天。内海米亚偷偷给瑞克斯送来吃的。瑞克斯碰也不碰。它将锁链拉紧，以靠近阿帕沙德的自行车。它躺在那儿五天，动也不动，然后在我表哥从旅行回来之前的两小时，死在了自行车旁。

阿帕沙德回来的时候显得很疲惫，皮肤晒得黝黑。他看见瑞克斯爬在自行车旁，就俯身抚摸着它。瑞克斯身上还是热的。它的脸上没有被折磨过的痕迹，好像它在期待着安宁的降临并得到了它。

我表哥坐在死狗身旁。他身上背着旅行包，脸上的皮肤晒得发干。他哀哭着，结结巴巴地不时念出死狗的名字的前两个字。

狗窝不在了。有一些小狐狸朝北逃去，它们在这个正在坍塌的城市充满伤感的房屋中，哀悼着特拉维夫建设者留下的精

巧而漂亮的建筑。我想描写施劳姆津，她就躲在特拉维夫的建设者们上演的这出戏剧的深处，她在那些纸糊的宫殿之中，这些宫殿现在已变成空旷而凋敝的建筑。她创造了一个儿子。他的光芒熄灭了。后来，在创造的过程中，她也许已经让他的光芒熄灭了。他口吃，总是莫名其妙地焦虑，喜欢保护迷失生活方向的人。虽然他的生活用安全别针缝在一起，但他自己却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奇怪是什么东西激励着施劳姆津舅妈——喧哗与骚动，麦克白说。我坐在院子里，雨已经停了。苦难出现在我们的土地上。狗窝不见了，小狐狸们不见了。房子在疲惫的尊严中坍塌，乞丐们在昔日当权者统治的新街道上。特拉维夫的上层人物一度住在这里，蜘蛛网和铁锈仍在，傲慢和褪色的庄严仍在，还有那些穿着短裙的秘书们，向并不存在的客户敲着一式三份的信件。

一种若有若无的气味充斥了院子，让人想起薄薄的烟雾，潮湿的草地和烤咖啡的味道。从路上传来刺鼻的苯的味道，混合着七重葛的香气，让我想起内海米亚。他常常在星期六下午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读书。我想到可怜的瑞克斯，还有它眼里那受伤的表情。在施劳姆津打它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像瑞克斯那样看过我。内海米亚的眼镜……那一击……我表哥结巴着说出他的狗的名字。施劳姆津对小施劳姆津妈妈说：我在自己身上怀了我自己。我懂了，我突然间明白了。我猜想：在法国军舰发射五发炮弹那个令人迷惑的日子之前，施劳姆津并没有有意将关于雅法沙地的那些甜蜜又可怖的故事与西辛医生联系在一起；西辛医生戴着白帽子，骑马穿过暗夜，将一个希伯来男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过那时所有的事情都汇集在一起了，她感受到失败与巨大的胜利混合后的惊讶。她嫁给了内海米亚；更重要的是，即使他对此一无所知，她仍然嫁给了他。她将

她的整个生命攥成一个球，在手里抚弄着；生与死压缩在一起，一个纯一的本质，显示着种子包含着树木、树木包含着种子的均匀和谐。她关于她在自己身上怀着自己的说法意义非常明显。为了防止出现任何变化，为了在生命的永恒的变化中塑造出一个最终的形态，为了能以与过去所呈现的模式相同的模式得到重生，她生出了她自己。为了能成为女主人，为了在湍急的水流中把握住一个方向，为了能够在针尖上代表永恒，这就是我站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时的理解。一个穿白色薄纱裙的年轻姑娘，面对着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我想进到里面，用手摸摸墙壁，看看邮票，怜悯一下这个一生都充满复仇情绪、现在又如此孤独的女人。我并没有去开房子的大门；我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地窖的门，走进房子。即使施劳姆津大舅妈这样恶毒，我仍然被她的魅力所征服。我用手电将地窖照亮。这里有旧衣服，衣架，家具，我祖父发霉的书，还有食物。她什么时候买下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是怎么积攒起来的？为什么要积攒这些东西？五大箱老头牌麦片，够吃十年。两箱肥皂，一箱桶箍，一小盒肥皂粉，十箱衣夹子——够一百个家庭挂一辈子衣服了。施劳姆津大舅妈家里没有洗衣机。她从不把衣服晾到屋外。从前洗衣工每周都来，把衣服取走，然后又送回来。床单是浆过的，叠得很整齐。她家里没有桶，那她为什么要收集那些桶箍呢？我走到外边，想起那只被打死的狗。烤咖啡的味道充塞着我的鼻孔，我想道：星期六下午，内海米亚正在院子里读书。施劳姆津正在接待几个朋友。房间笼罩在阴影下，充满了愉悦的薄荷香气。台阶上的阳光越来越暗，房子里寒冷而清爽。施劳姆津用雕饰着精巧花纹的薄瓷杯盛茶，她带着很明显的、上流社会的倦慵。她好像在用蛇形的银钳子从无边的气泡中将糖块捞出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装饰过的，控制好的，带着富有悲剧色彩的仪式性。她像那个

杀死瑞克斯的日本武士那样倒着茶，她优美的姿态中传递着一种无所谓的绝望。她并没有在倒茶，是茶自己倒着自己，带着有时十分强烈的微妙感，用不愿意屈尊工作的手倒着自己。夫人们喝着茶，压抑着自己的热情。我站在一边，看着妈妈和施劳姆津大舅妈彼此传递着无声的信息，她们之间既充满了憎恶又充满了难以理解的亲密感。这样的场面应该被二十年代的时装摄影师拍摄下来，用来表达即将到来的毁灭，以及威尼斯和卡斯巴德精致的贵族生活。我舅舅在草坪上读书。那个可怕的一击与倒茶之间的联系到底在哪里？它确实存在，同样的优雅，同样的活力。一个女人就是这样在自己身上怀了自己。她的确使内海米亚跟她结了婚。

对面二层楼上的男孩在叫他爸爸。看哪，他叫道，有人在那个老夫人的院子里走来走去。

一个穿睡衣的男人打着哈欠出现在阳台上。我于是离开。我想去见妈妈，告诉她施劳姆津大舅妈那句话的意思——在自己身上怀了她自己。可是一切都变暗了，我没有去。

第十三章

整个世界大战期间，施劳姆津都生活在一种若有若无的恐怖中。人们成百上千地死去。孩子们消失在沙丘里，患斑疹伤寒而死去。邻居一个年轻的女孩被卖给了一个戴单片眼镜的德国军官。没有奥托曼国籍的犹太人被从这个国家赶出去。阿拉伯人说：投降条约即将签定——让犹太人都去死吧。船沉入微微泛着波澜的平静的海底。人们靠吃树叶和草为生。拄着拐杖的跛子费力地为土耳其军队拖着武器。打着赤脚的士兵穿着破烂，沿着海岸搬运着沉重的麻袋，砍下大树给向南驶去却从未返回的列车提供燃料。火车头在前往准确位置不详的前线时被俘获，向夜空中发出焦躁的吼叫。内海米亚被征服兵役。起先他穿上了土耳其军官的军服，被送进军事学校。然后他又被转到了一个步兵团去扛军需用品。他的许多朋友因患疟疾和斑疹伤寒死去。我的外祖父希姆哈在一间顶楼里藏身，死在那里。当特拉维夫的居民们被疏散到卡法·撒巴和佩塔·提基亚的时候，阿东斯基获准留在雅法。施劳姆津坐在窗前，眺望着大海。冬天冷得难以忍受，夏天酷热而潮湿，跳蚤横行。她既没有看见农村里遍地燃起的驱散蝗虫的篝火，也没有看见饥荒。她的眼中只有那个法国军官。一队队被锁链捆绑着的犹太人从她家门前经过，他们被一个留大胡子的土耳其人用鞭子抽打着。但这一

切她都没有注意到。她心里想的只有她的法国人,她正在她的私人花园中漫步;在那里,美丽的树为了她而落叶,精美的雕刻带着凝固的优雅将风挡住。她看见辉煌的炮火刺破她头顶上的光环。当饥饿的、光着脚的乐手们开始在她的台阶前演奏音乐的时候,施劳姆津看见安东尼正在拥抱内海米亚,并使劲亲吻他的双颊。正当阿东斯基宴请小雅马尔-帕沙和他那一队军官的时候,乐队在一旁演奏。雅马尔-帕沙挥了挥手,他们便停止了演奏。乐手们瘫倒在地上。一个土耳其士兵甩给他们一块干面包。他们在地上爬着,吃着干面包屑。然后他们又开始演奏,款待着阿东斯基和他的客人们,而后者正在大嚼着辣酱油烤小牛肉。施劳姆津拒绝注意他们,拒绝相信他们的存在。后来,内海米亚出现了。他神态疲惫,衣着破烂,想在她们家找个避难所。即便听到内海米亚讲述那些战斗、饥饿、屠杀的故事,她仍然坚持认为战争的恐怖被夸大了,战争并不像所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

从那次打仗以后她忍受过许多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紧接着就发生了二一年的骚乱,在这场骚乱中,阿伯纳在雅法-特拉维夫一线受了伤,阿萨夫·库斯耐斯基的腿在阿东斯基的厨房餐桌上被一盏灯笼的光切断了(阿东斯基对此并不知情)。二九年再次发生骚乱,那时内海米亚正为哈加纳研制炮弹,随后又佩带着一支老式左轮枪去保卫特拉维夫。施劳姆津大舅妈站在从她妈妈那里继承来的大镜子前试衣服,满脸是狡猾的无所谓的表情,那是疲倦的上帝才会有的微笑。三六年又发生了多起被阿拉伯人称为“革命”的骚乱。公共汽车被袭击,每天都有死讯传来。他们开始将年轻人埋葬在位于那赫拉特-依兹哈克的新墓地——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他们为什么会死。同窗好友们趁黑夜建立起新的定居点,以便在打击

到来之前找到弥补的办法。然后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枚意大利炮弹误中施劳姆津家对面的房子，房子被完全摧毁了。随后便是独立战争，西奈战争，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她从电视上看到了发生在远处的遥远的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鲜血、痛苦、极度的折磨以及饥饿。不过，在所有这些岁月里，施劳姆津大舅妈仍然继续将战争视为某种具有固定形式的事业，而面颊上的亲吻使其戏剧化；战争中会有谋杀，但战争仍然按照特定的规则运行，有时突如其来的炮火会划过她的发梢。对她来说，战争就像生活本身：无法理解却又不可缺少。难道它不像骑士精神那样，既具有辉煌的成分，又具有邪恶的成分吗？当五发炮弹呼啸着划过她的发梢，朝着德国人瓦格纳的工厂飞去的时候，那一刻回响在海滩上的小提琴声组成了迷人的记忆，成为她的一道屏障，将她与不幸隔离开，使得生活的恐怖一次也没有碰到过她。

炮火划过她发梢。土耳其人已经停止射击，船朝着海平面驶去。施劳姆津带着从未感受过的快乐，最后一次拜访阿萨姆·卡萨尼。当船驶出了视线，马车夫从掩体中冒出来以后，她在路上遇见了弗拉迪亚·阿伯拉姆斯基。几年以后，阿伯拉姆斯基将成为特拉维夫的和平法官；人们叫他阿伯拉姆斯。他正在采摘秋天的花朵。他十分专注地采花，然后又把它们放在特制的吸水纸上晾干，以至于他既没有听见炮声，也没有听见马蹄声，没有听见土耳其人的枪响。他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没有注意到瓦格纳先生开车从他身边经过。他此时正专注于淡紫色的海葱，那花儿像国王一样绚烂——他后来对满心惊异的施劳姆津解释说。她身上洋溢着快乐，以至于花的香气都无法再将他遮蔽住了。他被眼前所展开的辉煌的场景所吸引，于是向前倾了倾帽子，向她致意。她说：天气真好。他回答：

是的，很迷人的一天——多么清新的空气，多么美丽的花朵。她说：还有那船！他问：什么船？她说：那些炮弹。他说：海里的贝壳吗？她走下马车，带着无尽的快乐与对自己的渴望告诉他说：有一天，她将为他那彬彬有礼的风度而报答他。在阿伯拉姆斯一生中，他都十分珍惜施劳姆津留在他心中的喜悦的样子。她身穿白纱裙，手中拿着花束，从头到脚都那么纯洁。每当别人批评她的时候，他都会说：可是，她是那么纯真无瑕，美妙非凡。当我在果园里遇见她的时候，她是那样精巧迷人，晶莹剔透，简直是美丽与天真浪漫的化身。

在整个雅法，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听见炮响，因此施劳姆津将掌管她神秘账户的钥匙托付给他。阿伯拉姆斯现在重病缠身，住在拉那纳的医院里，半身瘫痪。他坐在轮椅上，由一名年轻的护士喂饭。这位护士从收音机里收听米基·墨茨的歌曲，或者跟着他的玩笑而大笑。阿伯拉姆斯从未结婚，也没有孩子或者亲戚。钥匙在他的手里，即便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单单挑中了他。他想：施劳姆津，内海米亚的妻子，神妙的和平王子的妈妈……他回想起一个浑身散发着快乐的小女孩。

有一次她对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尊重美，将罪人送进监狱，把花朵晾干。他甚至不记得那些人还关在那里。他信奉法律，她说。他信奉美，信奉规则。她的声音被激动环绕着，当她从一个精美的淡紫色茶壶中往精致的茶杯中倒茶时，她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同样的激动，她猛击瑞克斯的时候也是如此。

施劳姆津从阿萨姆·卡萨尼那里出来以后，便回到雅法。城市因为战争的谣言而充满了骚动。土耳其士兵在张贴征兵启事。一长队想要加入奥托曼国籍的年轻人从邮局一直排到眼睛望不见的地方。她回到家，换了衣服，前往位于特拉维夫利里安布鲁姆街上的纳忽米老师家，学习民间舞以及歌曲。纳忽米见

到她很高兴。他单独为她跳了一段圣经舞蹈，然后又为特拉维夫的几个最有学问的人的女儿重复了雅各在恳求拉班允许和他的女儿拉切尔结婚时所跳的舞蹈。舞蹈既狂热又优雅，女孩子们看到这样的舞蹈都很激动。按照纳忽米的观点，这个舞蹈通过带有魔力的舞姿表达出一种古老的活力。施劳姆津舅妈一边鼓掌，一边想起内海米亚，以及她那个英俊的法国人，他此时也许正在一群被他的魅力所迷醉的鸟儿的伴随下，跳着普罗旺斯舞蹈。他也许正在某个遥远的港口亲吻着可怜的骑兵军官，或者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轰击德国人的工厂。

离开纳忽米家以后，施劳姆津和莎拉·依兹莫斯基手拉手走着。她问莎拉（她是为莎拉的缘故才来的）新词汇晚会是否真的将于今晚在他们的老师布格拉肖夫家举行。施劳姆津突如其来的兴趣让莎拉摸不着头脑。她回答：是的，是今天晚上。被选中的词是"乐队"和"黄瓜"。

那天晚上莎拉来找施劳姆津。阿东斯基给她们端上樱桃酒，并问及她那地位显赫的父亲的情况——他们很早以前讨论过的那块地是否已经被他卖掉了？莎拉说她并不知道。阿东斯基于是对这个女孩失去了兴趣，回自己房间里去了。莎拉和施劳姆津来到她们的老师布格拉肖夫家，为的是欢迎两个新词汇进入希伯来语，并庆祝这两个词的奇迹般的复活。布格拉肖夫谈到词汇的力量，谈到我们怎样通过运用新老词汇而将不同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词汇是开端，我们从词汇开始，并在人们的精神深处和珍贵的语言宝藏中发掘出能够满足现代需要的词汇。年轻的人们喊道：管弦乐队，管弦乐队！"管弦乐队"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合唱团"。我们的管弦乐队很庞大。我们的管弦乐队今晚将要唱歌，国家管弦乐队今晚将要唱歌。

晚会充满了喜庆气氛。人们注意到，来源于拉丁文的"管弦

乐队"这个词用在一群伴奏的人身上很合适。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某些人错误地将"管弦乐队"印成了"合唱团"，而将"合唱团"印成了"管弦乐队"。就这样，在新希伯来语中，本应该被称为管弦乐队的却被称为合唱团，本应该被称为合唱团的却被称为管弦乐队。

一直到现在，施劳姆津大舅妈都在说：我们将去听我们伟大的管弦乐队演唱巴赫的赞美诗。在她看来，那些被她称为新贵的人去听的是以色列爱乐合唱团。

不过，在那时，施劳姆津对词汇并不关心，甚至对发挥词汇的力量、以此参与到希伯来复兴的命运中也不感兴趣。尽管少男少女们热情欢呼，尽管他们兴高采烈，她却仍然保持冷静。她在等待着内海米亚的到来。而他真的来了。他走近她，调动起浑身的魅力，对她说：欢迎你，美人儿施劳姆津。我们的沙滩学甚至连管弦乐队的金矿都没有挖到。事实上，他刚刚听完阿拉伯人唱"让犹太人都去死，立即投降，捣毁犹太人定居点"。他正等待着一场大战的爆发，他知道这场战争将会非常严酷。他也意识到这一千年即将结束。

不过，既然他为了得到快乐和忘却而到这个晚会上来了，他便发觉自己被一个狡猾而致命的誓言所缚住了，一个充满了羞辱和疯狂的誓言，而对方则是一个曾经有五发炮弹擦过她的发梢的女人。他弄不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当他走近施劳姆津的时候，一丝微笑跃上他的双唇。她姿态高雅地笑了，将她那明朗而带有穿透力的目光凝聚在他的身上。她的眼里充满了无声的渴望。而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则红了脸。他问她，她突然到他们这个圈子里来干什么。她用双眼打量着他。那是他所见过的最明亮也是最黑暗的双眼。她带着充满暗示的温情甜甜地回答道：我来是为了你，内海米亚。

正如莎拉·依兹莫斯基所回忆的那样，内海米亚的脸色由红转白。莎拉爱他，班上大多数的女孩子也爱他。她搞不懂为什么施劳姆津要到晚会上来，对自己给大家所带来的灾难一无所知。莎拉给内海米亚拿来一杯柠檬水。她并不知道，在这一刻，她正在往自己杯中倒着一杯毒药。

恋爱期虽然短暂但充满了浪漫。施劳姆津并不相信需要过渡期来加强了解或者自我反省。她让内海米亚以一种文雅、但稍稍有点越轨的方式追求她，这样他就可以完全从他的亲密朋友以及倾慕者中脱离出来，这样他就可以给她讲关于物质组成的奇怪而美妙的故事，讲从远方迁徙到以色列的鸟类，讲阿米巴，讲加利利的年轻的定居者，讲亚马逊的女人，晦暗的森林，在神秘的海洋中找寻岛屿的勇敢的船长，还有他自己对她大胆而又无望的爱。

她听到战争的节奏近了。一天，她宣布说：够了，我们或者结婚，或者停止见面。

他们说，他带着无限的责任屈服了，这是一个生死的契约。她带他去见阿东斯基。阿东斯基问她，他值多少钱。她带着从未有过的勇气回答：一钱不值，不过他会学会挣钱的。

他的祖上是谁？阿东斯基问，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是希姆哈，她回答。她从那时起就下决心，如果浅薄的希姆哈不很快死去的话，她就将切断他们父子之间的纽带。

就是那个花了一点点钱买了一块地，又用同样的价钱把地卖掉的那个人？

阿东斯基呆住了。阿伦拜街角上的那块地，那是我祖父买下的，是他的宝贝，却被希姆哈以几分钱就卖掉了，一点儿钱都没有赚，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快要打仗了，因此他不再需要那头驴？

施劳姆津说：他会学的。他在血缘上偶然成为希姆哈的儿子，在本性上却不是。况且，也不应该把父亲的罪加在儿子身上！她坦白地说，而这种坦白没有逃过她父亲犀利的眼睛：我是在我一生中最可畏、同时也是最辉煌的时刻遇见他的。甚至在他认识我之前，我已经让他成为我的人了。

阿东斯基快要疯了。他为施劳姆津安排好的宏伟计划破灭了。他来回踱着步子，自言自语：可是他值多少钱？为什么偏偏是希姆哈？你知道我对那个老头儿的看法……一个诗人，教师……为什么不是阿伯拉姆斯？他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他人又英俊，还知道怎样做生意。他已经值不少钱了。为什么不是从格德拉来的阿萨夫的儿子，或者是哈尔冯的儿子？

然而施劳姆津是倔强的。阿东斯基最后发了慈悲。两个人在整整三年半以后结了婚。而几个月前，阿东斯基刚刚买下阿伦拜正东南的沙丘，并不顾周围人的嘲笑，将这些沙丘称为罗斯切尔德大道。阿东斯基并没有笑，他不知道怎样笑。不过，那些笑的人也并没有能笑很久。婚礼举办得令人难忘。阿东斯基拿出了人们从未见过的美味。内海米亚的朋友们来参加婚礼是因为他们很饿，他们并不看好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的这桩婚姻。与那个冷漠而美丽的孩子结婚是一个罪，是犯罪；与一个土地投机商的女儿结婚违背了先驱者的所有信条。可是阿东斯基却要大肆庆祝。战争刚刚结束，国内仍然在闹饥荒，人们已经四年没有尝过真正的食物了。在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的婚礼上，宾客们享受着鸡、土豆，各种鱼、鱼子酱、香槟酒，还有上等葡萄酒。阿东斯基从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那里得到这些宝贝，这个英国军官负责为国王政府驻犹地亚的官员提供补给。这个军官在巴克雷斯银行的银行账户在一夜之间鼓胀起来，为“战争并非如此难以忍受”这种说法提供了惊人的证据。

从他们订婚那天起一直到他们举行婚礼，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两个人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他们会在光线暗淡的房中接吻，施劳姆津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衣衫不整，但神色却非常骄傲。她爱内海米亚，就像蜘蛛爱它的网一样。婚礼过后，他们去了美国，他在那儿得到了他的博士学位，而她则抱怨美国式的生活，她说美国人全都很蠢。他们回到家来以后，在他们之间有一种温柔的特质，这是任何人都理解不了的。不过内海米亚却睡在他为自己铺的床上。而她从这一天起则开始声称那是皇室的床。

第十四章

施劳姆津舅妈的院子里弥漫着阿拉伯树胶和天竺葵的香味——让人想起在拉姆拉的一个有着非常漂亮的院子的花园，内海米亚舅舅正和一个当地科学家进行着讨论，这个人在海德堡受过教育，他们在一起讨论着少见的邮票和珍稀的鸟类。现在，站在我舅舅四十五年前种下的树边，我被一种冲动所征服，想要讲述施劳姆津的故事，施劳姆津大舅妈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所规定的话语，用某种电磁震荡来摄取一个人的灵魂。我有一种突然的渴望，想要接触她，爱她，想要变得娇纵，就像小施劳姆津妈妈那样……想要穿过无法渗透和不规则的层层包裹去靠近她。我最近在看一些话剧，它的内容既流行又普遍，是由一个当地作家写的。他塑造了一些邪恶的人物，一些纸板做的人物，不用枪、却用一连串恶毒的字眼彼此伤害，彼此折磨，人格化的罪恶。我想写超越这一切的爱。我不想靠讽刺而成功。一个人应该屈服吗？

施劳姆津不是用纸板做的。她不是歌剧中的女主角，她折磨着内海米亚，也被他折磨着。施劳姆津爱以色列这块土地。她的名字很适合她，让人想起施劳姆津女王那个反复无常的女暴君，她的名字代表和平，她则充满活力，充满毁灭性，被别人折磨，也折磨别人，是某一个瞬间与若干世纪的交汇，带有天才与

庸才、突然的柔情与沸腾的仇恨的遗传基因。

不存在这种东西。农民一边指着一头长颈鹿一边对他说。

施劳姆津妈妈告诉我她是如何修完师范学院的课程的。内海米亚和施劳姆津刚刚从美国回来,那是 1920 年,他们在我外祖母的房子里住了一阵子。自从希姆哈 1917 年在躲避土耳其人的时候死在顶楼上以后,我外祖母便开始靠收房客来养活她自己和孩子。房子在阿伦拜街上,街与街之间有某种联系吗?约会与休息?逮捕与悲痛?在那些日子里,妈妈穿着长裙子——滑稽的裙子。施劳姆津大舅妈使外祖母相信,妈妈的腿又胖又难看,可怜的妈妈一直到很晚以后才敢露出她的腿。她学习很勤奋,还帮助她妈妈管理出租的房子,过着简朴而节制的生活,她心想:如果她父亲能够看见她从以色列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他该会多么骄傲。施劳姆津舅妈穿着丝绸裙子,戴着宽边的巴黎式的帽子,身上散发着香水的香气。她对教育一无所知,在腿的方面却是个权威。

她争论说,我妈妈是在浪费时间;趁她还年轻,把一个丈夫骗到手应该是她的责任,再迟恐怕就来不及了。

这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晴朗。妈妈正使劲儿往家跑,手里拿着毕业证书,街道仿佛在跳舞。小施劳姆津妈妈兴奋极了。在阿伦拜街上,她经过一辆满载着男孩子的马车,车上的男孩子冲她叫喊,她朝他们挥挥手。整个世界都在燃烧。阳光照在皮肤上,洗去一个沉闷的冬天留下的阴霾。阿伯拉巴奈尔先生正沿着街道散步,炫耀着他的一件带条纹的西服和领带。他说:我看见我的小姑娘正在笑呢。她毫无疑问将给她的父亲(愿他安息)带来巨大的快乐;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请她看一场好看的电影,鲁道夫·瓦伦蒂诺主演的一个伤感的电影。观众们哭了,我亲爱的,而阿伯拉巴奈尔先生的钱箱却笑了。

毕业证书摸起来的感觉很好。她为她死去的父亲而骄傲，她一心想要在小学教阅读。她带着适度的自豪和她所特有的谦逊将证书拿给她母亲看，外祖母的双眼在镜片下闪烁着泪光。妈妈说：我会成为一个和爸爸一样好的老师。不能否认，她的话语中笼罩着一层悲哀。不过，这一刻仍然是很特别的，今后不会再有了。它是一个伟大的时刻的一部分。

学习这么多年并不是每个人都做的事。既缺少食物，也缺钱。当所有人都从克法沙巴疏散回来，回到特拉维夫以后，他们是那些没有得到土地补贴的人中的一员。外祖父去世了，他们开始吃野菜。从那时起，外祖母开始收房客，主要是教师和诗人。他们能付多少钱呢？还得需要别人帮忙。有洗衣店，却没有肥皂。沿着阿伦拜街，在沙丘上，澳大利亚士兵们在帐篷下快乐地露营。透过窗户，阿伯纳和小施劳姆津看见高个子的澳大利亚人穿着白汗衫，脸被太阳晒得通红，他们在吃沙丁鱼、奶酪和黄油。外祖母常常要用旧面口袋做衣服，我们吃的是野菜和茄子，妈妈回忆说。一天，一个澳大利亚士兵来到家里，愿意付任何价钱买妈妈新烤出来的面包。他说：你有烤炉，对吗？她笑着回答：我们有烤炉，却没有面粉。他们开始讨价还价，彼此交换着一系列的暗示，随后又是一连串的疑问。他同意拿面粉来；外祖母会每天烤面包，然后把剩余的东西留下来。当那个士兵听到人们在挨饿时，他哭了。

于是情况暂时缓解了一些。大施劳姆津和内海米亚在美国。那时，整个国家都在铺路。妈妈上学、工作、烤面包、洗衣服，穿着用旧面口袋做的长裙子。星期六，她和从北部骑马来看她的年轻人一起光脚在海滩上跑。阿东斯基用他的金子在罗斯切尔德大道上盖了十五座房子，其中一座建在亚夫耐街的角上，是给他自己的。这是一座精美宽敞的建筑，顶上有一个小塔。

阿伯纳蓄了胡子，去见阿东斯基，对他说，他在法国当过有执照的花匠，于是干起了园丁的活。他用挣的钱给外祖母买了一个冰柜。阿东斯基并不知道他雇的人是他女婿的兄弟。要是他知道的话，他永远也不会同意的。他坚持认为，希姆哈的儿子连一个打碎的洋娃娃的假眼泪都不值。

后来，内海米亚和大施劳姆津从美国回来。在他们搬到新家去住之前，他们住在外祖母的房子里，而不是阿东斯基宽敞的房子里。妈妈伺候着施劳姆津，而施劳姆津每天早上出现时则穿着一件新丝绸裙子，戴着巴黎式的帽子，在她从美国带回来的许多个镜子里都很美丽。

内海米亚为西客隆亚可夫的阿隆·阿隆森工作，在周末回家。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很疲劳。妈妈过去常对我说：你看，为了得到那个文凭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施劳姆津大舅妈正站在镜子前，妈妈走进房间。外祖母马上就要哭了，随后又将手伸到镜片下，揩去眼泪。施劳姆津斜眼看着毕业证书，听到我妈妈的话，便宣布说：你会成为一个老师的，从埃瑟斯法斯特跑到普里穆，跑一整天。然后她便出去了。阿东斯基的马车在等着。他们一起去和一个驻扎在沙罗纳的英国将军吃午饭。妈妈四十年来在几所学校里教书。现在，当她住进特拉维夫北边的私人医院里时，施劳姆津说：不管怎样，我知道你跟一个年轻人、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人结了婚。他们说他太年轻了，头发都是黑的，脸像小男孩那么娇嫩。一定是你找他的。你为什么不带他来见我？即使他爱上我，我也不会把他抢走的。

她和她的父亲同英国将军一起用午餐。然后他们在那儿吃冰淇淋。我妈妈哭着说：从埃瑟斯法斯特跑到普里穆！四十年！这该怎么解释？是不是因为她父亲？也许是。他们谈论了阿东

斯基许多古怪的事。她活在他身上，他也活在她身上；她来自他，她也将走向他。当她对我讲述他的葬礼时，她笑了！我再一次站在施劳姆津的院子里，试图理解阿东斯基。理解了阿东斯基，便能让我理解她吗？

所有这一切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我不知道。艰难的时代，也许是世界末日，也许是因为一切都过去了。一场梦的结束。犹太复国主义的代价也许就是它真正的动机，将一个人摆在由金、油和厌倦组成的祭坛上献祭，这就是结局。我们都将在彩色电视的荧屏上死去，被亿万个得意扬扬的公民观看着，他们关心的是通货膨胀和星期天钓鱼。在所有的时间里，在大灾难之间，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大施劳姆津？为什么是阿东斯基？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持续了九十年的一滴眼泪。无论你向哪个方向走，你最终都将变得暴怒与忧伤；同时你也将企及一个民族的辉煌。

在终点线上，伊甸园看起来那么近！触及阿东斯基就像触及我们所有的人。触及阿东斯基意味着屠杀当中的爱，意味着坚信：奇迹就在我们中间。

第十五章

阿东斯基在1871年来到耶路撒冷。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他们说他是军官,在一些战役中打过仗,后来去了美洲,在巴巴多斯登陆,他在那儿教一个新大陆最古老的、现在却在衰落的犹太社区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学希伯来文。人们曾经在君士坦丁堡的街上见过他,他正在挨饿;也有人发誓说,阿东斯基是一个横行欧德萨海港的犹太黑帮的首领。一个栖身于破烂不堪的小屋中的老妇人声称,阿东斯基,一个勇敢的战士,曾经在皮拉乌斯,或者也许是在费乌姆的港口参加过血腥的战斗,他的父亲被一个哥萨克人用斧头杀害了。他到巴勒斯坦来之前的生活被笼罩在一片浓雾中,他尽一切努力保护这段生活。他相信,过去越模糊,现在和未来的前途越有希望。是什么使他来到以色列的?他并没有葬在这里的愿望,他也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瞧不起那些居住在四所圣城中、靠施舍过活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那时还不存在。他有时会去犹太会堂,甚至会戴那种宽边帽,但是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认为阿东斯基是个忠实服从戒律的人。

本书作者对家谱十分爱好。我发现,我的外曾祖父来到以色列的时候是在1860年,比阿东斯基早十一年。

他来是为了死在耶路撒冷,就像那时的风俗一样。他那时

六十二岁，他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将近了，于是希望自己被埋葬在橄榄山上。他说，在梦中，他被指派做救世主的脚凳。我的这位上了年纪的外曾祖父在橄榄山上呆了整整一年，很少进城，城门关了以后也很少进去。他在一个山洞里等待着，吃的是长豆角和树叶，心中热切地盼望着。他做了很多祈祷。人们开始低声耳语说，有一位圣人住在山上。他们向他求援，到他那里去寻求拯救。有一些拉比反对他，他们印发了一些攻击他的文章，在整个城里散发。他对此一无所知，冲突就因他的无辜而化解了。据说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人。他将药品混合，并写一些小册子，上面包含有对救赎日的惊人的推算。尽管他期待着死亡的来临，并为此抛弃了他在欧德萨的妻子和孩子，死亡却迟迟不来。

一年以后，他从山上回到耶路撒冷，发表了几篇颇有见地的演说。人们说，即使是那些早先反对过他的拉比们也带着敬畏和惊讶关注他所说的话。他买了一块坟地。回到城里以后，他意识到死神在别的地方耽搁住了，于是便以不错的价钱将那块地卖掉了。倒并不是因为他想赚钱；只是由于他把那块地放到市场上以后，别人所出的价比他一年前买地时高出一倍。这些事情传到了阿东斯基耳朵里。阿东斯基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对他所知道的事情却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在自己女儿出生之前就认识我的外曾祖父，他认识我外曾祖父的时间更早于他女儿站在雅法的海滩上，感受五枚炮弹划过她的美丽的头发，并在那一刻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从橄榄山上下来的那个老人的后代内海米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还要早。

阿东斯基是怎么知道的？

小施劳姆津妈妈坚持认为，一切都是偶然，而我却坚持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头脑所无法彻底了解的各种联系串联在一起的。阿东斯基认识我的外曾祖父，却不了解他。他抓住了

看似简单的原则，即：橄榄山上的墓地的价格在一年之内翻了一番。这对于土地来说是一个惯例，因为土地不能继续增殖。

当那个老人住在城里的时候，他仍然持续感觉到死亡的临近。每个礼拜的礼拜四他都会预言他将在这一天死去。到了星期四，他就会爬上橄榄山，怀着极大的痛苦等待着救世主带来他所期待的死亡。他的皮肤已经皱缩。人们同情地点点头，大声说道：他来这里死，却仍然继续活着！

他又给自己买了另一块墓地，然后又以较好的价钱卖了出去。阿东斯基对此也知道。我的外曾祖父靠这笔钱生活，他从不接受施舍，于八十八岁时去世。他去世那天是阿达尔月的七号，也就是摩西去世那天。他一直到死都自己养活自己。那天早上他上了橄榄山。在与那个为他打扫房间的老寡妇告别时，他说：我不会回来了，我们将会在弥赛亚的翅膀上再次见面的。

他真的没有回来。

他爬到他的洞里等待着，然后就死在那里。

他死的时候，脸上凝固着一抹微笑。

他的坟墓被约旦人破坏了。

大约十五年前，他的两个后代捣毁了阿萨姆·卡萨尼的坟墓，以便在那个地方建希尔顿饭店。

阿东斯基早就知道，生活在这个国家是一件既艰难又复杂的事，就连注定终身拥有的土地也只不过是未来的一块坟地。当他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便直接来到橄榄山上，丈量好一些土地，与各种掌握着天堂之门的钥匙的殡葬社团进行接触，并开始向从俄国和波兰回来的犹太人出售墓地。他四处散发信件和销售许可证，同时还向那些注定要死在异国他乡的人们出售几百个盛有圣地的土壤的小袋子，以及瓶装的、能够治疗心脏病、关节炎和无数其他疾病的约旦河圣水。他有一次打了一个阿拉伯

人，那个人告诉他，应该戴上帽子，因为这是犹太人的规矩。第二天，阿东斯基就给自己办理了政治庇护，并获得了三国国籍（奥地利、英国和俄国）。阿东斯基知道，橄榄山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山都更接近救世主的脚步。同时他也知道，在来世的椭圆形剧场中，有些位子会比较抢手，而有些位子则会没有人要。例如，面向神殿山埋葬的人将最先望见弥赛亚，因而可以先于其他人而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此外，橄榄山上的空地变得越来越少，而希望被埋葬在圣地的死者人数却在持续增加。确实，阿东斯基雄辩的信件并非一点儿反响都没有产生。顾客的人数在迅速增长，虽然土地的供应量并没有以相应的比例增长。坟地变得越来越小，而阿东斯基则在耶路撒冷为自己建了一座漂亮宽敞的房子。

他只相信金币，即使稍微受点儿损失，他也要把所有其他货币都兑换成金币。用这种方式，他建立起一种单一的指标，可以用于他所有的企业。他的死者们到达以色列的时候都已至耄耋之年，孤苦伶仃，为的就是能够埋葬在橄榄山上那变得越来越小的墓地里。尽管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仍然感到满意。死者无法看见他们下葬的地方，也看不见当时并没有亲属在场。因而，所有的人都满意了，包括阿东斯基、殡葬社团（他们的利润在不断增长）、拉比和唱经者，甚至还包括死者的亲属，因为他们不用再为葬礼花钱，同时还能从阿东斯基那里得到一份由两个拉比签字的声明，证明他们的骨肉确实被埋葬在橄榄山上，而当死者复活的时候，他将陪伴着天使和上帝，上帝给天堂带来和平，他也将给我们以及整个以色列的家园带来和平。阿门。

在他和两个耶路撒冷的拉比之间进行的私人谈话中，阿东斯基争辩说：一个死人的身材和他活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人生下来的时候是很小的，后来长成了成人的身材，而当他死的时候

他又缩回到胚胎的大小。因而，坟墓一定要大到能够容纳下一个初生的婴儿。他说，无论怎么样，这是上帝的安排。如果仅仅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尸体就会缩成十厘米乘八厘米那么小，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尸体放在一个一米半长的墓坑里呢？所有那些等待复活的骨头都只有一个初生婴儿那么大。

他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不过，当他把坟墓的尺寸加以缩小的时候，他们也并没有提出反对。

以这样的方式，阿东斯基积聚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虽然这笔财富并不太多。

到那时还不太多。

等到他的地位稳固了以后，阿东斯基便娶了拉比本－阿姆拉姆的女儿米瑞阿姆做妻子。米瑞阿姆是一个有着漂亮头发的、身材瘦削的女孩，脸上带有一种惊慌的表情，这种表情一旦挂在她脸上，便永远印在了那里。本－阿姆拉姆是希布伦社区的使节，他与迈纳罕姆－蒙德尔的儿子、著名的施纳尔－萨勒曼一起前往巴格达和埃及。然后他又用很多年在北非各地旅行，后来又回到了希布伦，娶了一个妻子，写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已经由一个从耶路撒冷的贝茨－艾尔·耶什瓦来的学者写过了。他带回来一大笔钱，还有著名的拉比所写的信，此外还有不少关于萨姆巴提翁河和十个消失了的部落的秘密。在米瑞阿姆和她的两个兄弟出生以后，他又出使了一次埃及，随后是也门，然后又骑了好几个月的马，到达巴士拉。从那里他又坐船到了印度。他在加尔各答对当地社区发表演讲，并得到了一个会讲希伯来语的拉比所写的信。此人是一个勇敢善战的沙漠部落的头领，曾经征服了许多地方。然后他又前往波斯，最后，回到了希布伦。

在1860年流行的那场霍乱中，他启用了不少重要的咒语和

咒符，在帮助病人和埋葬死者方面也出了一些力。他个子很高，目光明亮，性格暴躁，时常大发雷霆。米瑞阿姆十五岁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一次新的旅程，这次是去欧洲，跟随着哈依姆·约瑟夫·大卫·阿祖莱的脚步。他参观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最远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寄出一大笔钱，此外还有一些信件，以及一篇论述殉难的极好的文章。他把这些东西交到一个刚巧从这儿过的以色列使者手里，自己便动身前往巴巴多斯，在那儿他拜访了从希布伦来的卡里加尔拉比的墓地，卡里加尔拉比一百年前在这里去世。本－阿姆拉姆跟随着他的脚步来到了罗德岛的普罗维丹斯，在卡里加尔曾讲过道的第三教堂发表了一篇饶有兴味的演说。当他带着一大笔钱回到希布伦的时候，年轻人在街上跳着哈西德派的纯粹而虔诚的舞蹈。他写了一本书，狂热地、带着无声的愤怒工作着。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书写完之前不许家人来见他。然后他把书放在一个密封的匣子里，和匣子一起消失在马克派拉山洞——那个长老们的山洞里。

穆斯林人被激怒了，犹太人被激怒了。他们本想殴打他，可是土耳其长官和他的警察包围了山洞，进行了搜索，最后却无法找到罪犯。这使得犹太人和穆斯林人相信，山洞是空的。不过他确实在里边。整整两天两夜，他坐在那里，为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坟墓哭泣。

然后本－阿姆拉姆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得到了几封地位显赫的拉比写给萨姆巴提翁河的犹太社区、十个部落的首领，以及希伯尼亚国王的信，随后便前往欧洲。从那儿他又去了巴士拉，筹集到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钱，接着便消失了。在他最后一封信中他写到：致我居住在泪谷中的兄弟们，我已经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我将开启一个新的旅程。我有充裕的资金、数不清的硬币，还有关于我们的兄弟拉夫·卡里加尔、十个消失了的部落、

负有盛名的拉比、以及英勇的犹太战士的文字(或者是信件?)。请转达我对女儿米瑞阿姆、我的妻子和我两个儿子永远的爱。另一封更详细的信将通过一个我自己不敢采用的渠道送交你们。这封信来自我,本－阿姆拉姆,你们的奴仆,从希布伦来的使者。那个城市正为身在麻木不仁之谷中的、在我们的祖先的埋葬地旁的子孙们哭泣,愿他们的记忆得到祝福。

他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徒劳地等待着。

希布伦因为遗失了一大笔钱,很多天都处于骚动之中。

其他使者们声称,他们曾在大马士革见过本－阿姆拉姆。

还有人发誓说,在靠近德国科隆的一片森林里他在他们面前出现。另一个说法是,他已经皈依。还有人坚持说,他正在南非的某个流淌着金子和钻石的城市里伏侍一个拉比。

米瑞阿姆和她的妈妈仍然独自生活。她的两个兄弟住在萨费德。他们的小房子被尖刻的人们包围着,这些人在整个依伯拉希姆·帕沙的战争以及干旱和饥荒的动荡时期都从不肯忘记。米瑞阿姆在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她那尖刻的舌头以及她与她父亲之间密切的关系使年轻人对她感到疏远,虽然在希布伦或者是耶路撒冷再没有第二个姑娘比她更漂亮了。她的美貌是惊人的。年轻人看到她坐在窗口的身影会晕倒在地。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有一次他正在他位于希布伦的家的窗口看她,两朵小小的乌云突然出现,从此永远将光亮从他眼前遮蔽住了。其他人则遭受到短暂的损伤。他们怕她,可是却发现自己在她家周围兜圈子,口中自言自语,还常常令人羞耻地兴奋。她的母亲会追赶、诅咒他们,而他们则会回嘴说:本－阿姆拉姆哪儿去了?他抛弃了你,老女人!

阿东斯基从一个为他在鲁柏林的父亲买墓地的犹太人那里听说了本－阿姆拉姆的女儿米瑞阿姆。阿东斯基派使者到米瑞

阿姆那里，使者回来时却没有带来任何回应。阿东斯基的爱变得更加强烈。当使者们回来时，他们的脸上凝固着米瑞阿姆仇视的目光，那目光顽固地附在他们脸上。阿东斯基的热情被搅动起来。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被触动了。仇恨触动仇恨，愤怒则与愤怒相匹配。就这样，他发现自己令人绝望地爱上了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女人。他感到他的愤怒和米瑞阿姆的愤怒两者交织在同一个花环中。

在一个冬日，阿东斯基给他的马套上笼头。这匹马是他从约旦河外地区一个土匪手里买的，他还给它配上了从大马士革买来的鞍子。他骑着马向希布伦驶去。路上非常寒冷。阿东斯基在雾气中穿过，他精神饱满，呼出的气都快结冰了。路上的人们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窄窄的街道上匆匆走过。远处的山峦曾经在短短的一瞬间在阳光中闪现，但又马上隐没在浓雾中了。那是犹太历的六月。虽然还没有开始下雪，可是空气中已经有了雪花。寒风凛冽，阿东斯基喜欢在刺骨的寒风中骑马，他喜欢那些陡峭的山。马喷着热气，阿东斯基自己唱着歌。他从来没有唱过歌，他很不熟悉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另外一个人在他身体里面唱歌。

他在雪还没开始下的时候赶到希布伦。他在找米瑞阿姆的家，他的身边跟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打扮得像乌鸦一样，还不住地嘲笑他。他们喊道：卖坟地的来了，他要找砸栅栏那个人的女儿，那女孩儿他爸正等着他哪，他手里挥着一杆鞭子，外带十个部落的土地证明！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显得格外愤怒，他的眼里充满敌意，他大喊：找那个女人去吧，当心你回来的时候会变成一只狗！

阿东斯基下了马，走近那个小伙子，镇定地对他说：我在橄榄山那边有一块好地，现在还没有人用。你要是再说一个字，我

就让你去见阎王。到那时，你会尸骨无存，别想活命。然后他提高声音，大叫了几声。

年轻人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沿着飘满烤肉和草药香味的街道跑得无影无踪。那时刮着大风，云彩积得厚厚的。小伙子不知道阿东斯基一直想笑，他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放声大笑。

等到雪花飘落的时候，整个希布伦都已经知道：阿东斯基来了，还对阿祖莱拉比的儿子说了难听的话。

阿祖莱从家里出来，在凛冽的寒风中等着阿东斯基，他的脸涨得通红。阿东斯基走近他并向他打招呼，阿祖莱说：从马上下来，先生，告诉我你是谁。不然你会受到诅咒的，你这个欺负小孩的无赖。

阿东斯基很识相，他下了马，说：我谁也没有打。有人向我挑衅，我就回击。以色列人民都彼此照顾。

拉比气呼呼地等着，一言不发。

阿东斯基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拉比眼前晃了晃，然后在他耳旁小声说了几句话。一个从窗户往外看的女人信誓旦旦地说阿东斯基说了下面一席话：我叫阿东斯基，我的父亲是本·克牢尼莫斯，《以色列之欢娱》的作者。只有您这样有见识的人才能听我的故事，只有您这样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而只有您这样仁慈的人才会欢迎一个在大雪天从圣城耶路撒冷赶来的人。这场暴风雪将要下三天三夜。

雪片越来越厚。拉比一边听，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的怒气渐渐消退了。

阿东斯基继续说（这也是那个女人转述的）：我认识闻名遐迩的本－阿姆拉姆。我知道他的身世。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事情。而且我还知道他要带到希布伦的那笔钱的下落…… 以及那笔钱的数目。还有，如何得到那笔钱。

来自希布伦那位聪明的拉比(不管他是谁)多年来在记载并不准确的古书中寻找关于十个部落的事,寻找萨姆巴提翁河,以及如何计算拯救之年的到来。这些事我都知道。我是从本-阿姆拉姆那里知道的,而他则是从一个曾跟从一位圣人学习过的人那里知道的。我甚至知道就是那位聪明的拉比派本-阿姆拉姆去完成最后的使命的。只有我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拉比对本-阿姆拉姆说了些什么,本-阿姆拉姆对拉比说了些什么。我知道为什么那位聪明的拉比没有告诉大家本-阿姆拉姆的确在马克派拉岩洞里待过,他听到了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对他说话,而且他毫发无伤地回来。我有能力在宗教事物和实际事物上帮助这位拉比,我可以帮助这位拉比完成一些特殊的工作。这位拉比明达事理,他的聪明才智尽人皆知。

在大雪中匆忙赶回家的人们瞥见阿祖莱脸上极度关切的神情。他弯下腰,在寒风和大雪中低声说:祝福你! 他抬起眼,大声宣布:我的家就是你的家,阿东斯基拉比。两个人立即进了屋,有人把马牵到马棚。阿东斯基在阿祖莱家里待了三天三夜。在希布伦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三天的故事。施劳姆津对这些故事不置可否。很显然,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让米瑞阿姆听的。事实上,每一句话都传到她的耳朵里。阿东斯基有一次告诉他的阿拉伯仆人,他的妻子米瑞阿姆的确非常美丽,他从来没有像他们相遇之前那样爱过她。他告诉阿拉伯仆人在雪中的希布伦城那美妙的三天里他对米瑞阿姆的爱,那时整个城市与世隔离,每家都忙着生火,灰色的天空看上去就像世界末日一般—— 这段爱情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事。

人们说第一夜屋里有火花闪过。阿祖莱拉比和阿东斯基之间的谈话异常热烈,每过几分钟,他们俩就会站起来拥抱良久。有一个女邻居说,窗户都燃烧起来,其他人也这样说,好像炽热

的太阳落进这间屋里。有人甚至连着三个晚上观察阿祖莱家的窗户。那些住在阿祖莱家附近的人还把窗口的位置出租给别人。

他们说,第二天晚上,阿祖莱的儿子进来,请求阿东斯基的原谅。他跪下五次。两个星期后他重返学校时,人们注意到他眼睛中有什么东西变得黯淡了。他们说这孩子沉默了五年,一言不发。即使在传染性霍乱期间,当人们看见异象,在街头说着预言,像中了邪一样喋喋不休,还试图用咒语和护符阻止疾病的传播,在这样的时刻,这孩子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只继续低声祈祷。过了三天三夜,阿祖莱拉比走出来做晨祷。雪停了,城市一片银装素裹,阳光刺眼。他整个人全变了。走进犹太会堂时,他拥抱了阿东斯基,然后用庄严的声音祈祷,他的声音响彻天地。他的眼睛放着光彩。

阿东斯基两年前在橄榄山上遇见本-阿姆拉姆。他不知道本-阿姆拉姆有一个女儿,而且这个女儿有一天将会成为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他钟爱的孩子施劳姆津。他正站在一块墓地旁,这块地他已经卖给了来自匈牙利的一位拉比。太阳刚刚开始落山,奥马尔清真寺闪着金光,刺痛他的眼睛。这金碧辉煌的景象仿佛悬在深渊之上,他觉得自己是大火中的余烬,很快就会归入虚无之中。突然,有人来到他身边。他没有注意到匈牙利人是何时悄悄离去的,他更没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出现了。那个人说:我是本-阿姆拉姆,我丧失掉了我自己。阿东斯基觉得这句话意味深长。那是一个凉爽的夏夜,两个人坐下来交谈。阿东斯基请本-阿姆拉姆喝酒,本-阿姆拉姆拿出烤熟的西瓜籽。本-阿姆拉姆告诉阿东斯基,希布伦的拉比阿祖莱派他出去寻找十部落的下落,为他的理论提供证据。这个理论充满危险和悬念,其大意为:作为大卫之子的弥赛亚将先于作为约瑟之子的弥

赛亚到来。他曾经给许多名字稀奇古怪的拉比写过信，地址都是闻所未闻的地方，他想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本-阿姆拉姆告诉阿东斯基，他有一次来到遥远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孤独的河流，他突然看见一条大鱼向他游来，那条鱼展示了许多奇异的事，还把静止的河水变成其他东西。他那时突然明白了，他意识到他的名字已经改变，他已不是刚才来到水边的那个人了。从此，他一直在找寻自己，有时甚至扮装成自己的样子，他说。他忘记了自己在希布伦还有一个家，他锁上了所有的窗户。几天前，他从西顿来到大马士革，他恢复了从前的意识。他的眼中冲出一团火，这让他意识到将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再揭示出来，这件事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告诉阿东斯基，他觉得他命中注定要去解答无人过问的问题，这是天意。他难过地小声说，他今天有点怀疑阿祖莱拉比是在利用他，而他并不知道真正的用意何在，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他说阿祖莱知道他曾去过马克派拉岩洞，也知道他听过亚伯拉罕说话，但是他不肯把这件事告诉城里的人民。本-阿姆拉姆好像被一道神秘的光照亮，他继续讲萨姆巴提翁河，他说他找到了答案，但却不知道原来的问题是什么了。他说起犹太姑娘们拿着长剑和盾牌，和她们的丈夫并肩作战，击败沙漠中的悍匪。他谈到曾遇见一位老人，老人告诉他关于拯救的秘密。他还知道，5720 年到 5736 年之间将会是战乱的时代，5736 年时，南方和北方的大军将会攻打上帝的子民。同一年，圣城将会颤抖，被诅咒的清真寺将会塌陷，群山之上又会有一座高山取而代之，圣殿的遗迹和古老的烛台都将保留在这山上。天上将会降下冰雹，这时我们的弥赛亚将显现，他将拯救幸存者，他将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没有善也没有恶，充满上帝的爱，充满完美，向永恒走去……他从《但以理书》中找到了证据。他说，阿祖莱拉比曾从他这里得到一些证

据，而他自己又找到了另外一些，还有一些他永远也不会说出来。他说，他到耶路撒冷来，是为了找一块墓地，他想有一天他会回来在这里安息，这样就不会让那些阴谋消耗他生命的魔鬼得逞。他想悄悄葬在他家人旁边。阿东斯基知道本－阿姆拉姆没有发疯。

本－阿姆拉姆描绘了他所看到的异象，他很怕说出舌尖上这些灼人的话语。他给了阿东斯基一大笔钱，他说：我一边旅行，一边筹集了这笔钱。我自己从来没有碰过它。我从不背信弃义。我整个人一旦改变，我的伦理观也改变了。但是我从没有碰过这笔钱。钱全数在这里，这是献给希布伦圣城和它的人民的。我在瞬间从我自己来到我自己，现在我要解脱我自己，离开这个地方。本－阿姆拉姆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我的前身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上帝让我变成另一个人，就像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一样，我将变成另外一个人，就连你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阿东斯基记得所有这一切。这里不便讲出所有的秘密。这个故事与施劳姆津的故事没有什么联系，只有“从他自己到他自己”这句话被施劳姆津改成“我自己身上怀着我自己”。她现在躺在特拉维夫北部的一家医院里，透过她美丽的外表蔑视着这个世界。她等待着无止境的复仇，这很可能肇始于那条吞噬她外祖父的河流，那河把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只想重申这个事实：阿东斯基对阿祖莱拉比讲的话令人震惊，而且充满各种秘密和答案；米瑞阿姆的母亲不再被视为一位被抛弃的妻子，本－阿姆拉姆也不再被视为一位骗子。据阿东斯基说，他第二天就死了，他被葬在橄榄山上，用的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和他的遗嘱都装在阿东斯基的兜里。不管是谁，只要他告诉以色列人民弥赛亚的到来，他就把他的墓地留赠给他。只有阿东斯基和阿祖

莱拉比知道他另外的名字。

阿祖莱拉比说：本－阿姆拉姆看见了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曾与死亡而战，与毁灭而战，与天使而战，他看到了灼人的烈火，他被火烧死，为的是让我们领悟。我们不要显露他真正的身份。我们不要暴露他的秘密。愿他能找到自己的灵魂。

在犹太会堂，他说：我听到过本－阿姆拉姆许多事。他已经死了。他是一位圣人。他是信使，但我们没有认出他来。他是上帝的信使，不是我们的信使。米瑞阿姆应该为她的父亲感到骄傲，她的兄弟们完全有权利回到希布伦来。

阿祖莱拉比写了一百本书，全世界都知道他。

至于阿东斯基，他又大大地赚了一把。米瑞阿姆摆脱了孤独和仇视。即使是最恨她的女人也亲吻她。她母亲大哭了一个星期，然后死去。她无法承受这一切。米瑞阿姆在没有见到阿东斯基之前就爱上了他。阿东斯基转述她父亲的话，他和她父亲的亲密关系，都让她十分激动。阿东斯基透过墙壁，把这些事告诉她，而就在此时，城里正下着五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地上的积雪几乎和门窗一样高。

第十六章

下午，我又来到医院看望施劳姆津，我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美丽的女人在七十六岁的时候仍在焦急地等待灰白头发的年轻医生。我试图深入了解约一百年前的希布伦惨案，但她不愿回答问题。对她来说，希布伦如一段尘封的往事。即使“六日战争”之后，她也没有再去那里。她对那块土地只有一种抽象的爱。海法她也仅去过一次。她和阿东斯基一起去欧洲的时候是从海法港启程的。她从没登上过卡尔梅勒山，也没去过那里的山谷。内海米亚到全国各地旅行时，她总是待在家中，不住地叹气。热浪袭来的时候，她愿意在家中避暑，怡然自得。她不了解那些出门在外的人此时总是长嘘短叹。她成年以后，只去过两次耶路撒冷。她生活在她自己那块隐秘而抽象的以色列土地之上。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懂得仇恨。圣徒、将军以及疯子都深谙抽象的仇恨，他们都具有一种不为人所知的无形的能力，能够领悟事物发生的进程。施劳姆津从未用双手触摸过真实的生活，她生活在一种永久的优雅之中。但是有一些事她永远不会说出来。她喜欢她自己身上，尤其是她父亲和祖父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不断在逃亡的感觉，在天空下疯狂的舞蹈，伟大的诗人的舞蹈，他们的诗作不愿轻易示人，因为每一个潜在的听众都是真正的敌人。阿东斯基和本-阿姆拉姆去寻找一个他们自己创造

的世界。他们满怀激情，但是周围的人们却发展出一套他们与之不能相容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阿东斯基和本－阿姆拉姆见识了魔鬼与地狱，他们虽然折返回来，但豪情未减，心中仍燃烧着他人看不见的熊熊烈火。

阿东斯基在希布伦谈了三天，详情并不都为人所知。人们赌咒发誓说拉比的家一整夜都是雾气缭绕，只能勉强看到一扇窗子。他们说雪刚一落到窗户上就立刻融化。我读了本－阿姆拉姆埋起来的书，而且追溯了他的身世。将来有一天我要把这些事情写成一本书。本－阿姆拉姆追寻卡利加尔的足迹，后者是希布伦人，二百五十年前到美国，宣扬在罗得岛的普罗旺斯建造第三神殿。我找到本－阿姆拉姆的著作，此书印数极少，纸页已破旧而泛黄。但是今年已是 1974 年，再过两年就是创世以后 5736 年了。大地将会燃烧，裂开，石头会从天上坠落。我对小施劳姆津妈妈说：看哪，本－阿姆拉姆预见到了独立战争。他说将会于 5709 年发生，他只说错了一年，应该是 5708 年。他从《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的线索中测算出了“六日战争”。他早在一百年前就描述了“赎罪日战争”，只不过他认为会在结茅日发生。我们为何不相信大毁灭之后的拯救呢？敌人携带着寒冷之地的武器，从南方和北方蜂拥而至。铜铁打铸的鸟将遮天蔽日，大如庙宇的石头向它们击去。审判的时刻将同时带来安慰与毁灭。鲜血汇成的河流将消失不见，代之而来的是抚慰与仁慈。群星自天而降，万民返归我们，死者将复活，我们的民族以色列将变成拥有亿万民众的强盛之国。锡安山上三分之一的人将被毁灭（本－阿姆拉姆著书之时，四座圣城中居住着几千犹太人），两百万人会得以幸免。死者复活之后，人口会增长二百五十倍。拯救将会像一声巨大的感叹降临到我们身上，而我们则因长期的盼望和等待而充满喜悦。施劳姆津仿佛是她父亲这本

书的活见证，她体现了犹太人的某种双重特征：我们一方面忍受，另一方面又超出历史之外。或者她仅仅是一个永远不会死去的老妇人？我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我要把这些书和秘密留待将来。现时已有这么多的悲伤与渴望，为什么还要凭添更多的痛苦呢？

希布伦的米瑞阿姆嫁给了阿东斯基。她的母亲葬在她丈夫墓地旁边，没有花一分钱。老纳忽米不愿意凭空猜测米瑞阿姆对阿东斯基的爱情，但他知道在他们相遇之前的三天三夜里，这两个人疯狂地相爱。米瑞阿姆很漂亮，离开希布伦以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她的出生地。她再也不想去希布伦。她也没去看过她母亲的墓。和阿东斯基搬到雅法以后，她也不再守从孩提时代就一直遵守的戒律。她有一次对希森医生说，阿东斯基是缝在我父亲烧焦身体上的一块布。她随后又稍作修正：一块裹尸布，或许是一块祷告用的围巾。

阿东斯基和他妻子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抵达雅法。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一天，空气中飘满柠檬树浓重的香味。在北部，沙滩一直延伸到陆地的边缘。那时在雅法居住的犹太人非常少。海浪拍打着海港边住房的台阶。没有人知道阿东斯基想在雅法干什么，为什么他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比如做墓地这方面的生意）而来到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小城。没有人意识到阿东斯基正在编造一个巧妙的故事，正在为两千年来的耻辱复仇。已经去世的本－阿姆拉姆那时是他惟一的朋友，他在梦中对他讲话。阿东斯基觉得自己应该完成本－阿姆拉姆遗留下来的事业。

阿东斯基来到雅法，盼望着其他犹太人的到来。他知道他们会来的。根据本－阿姆拉姆的测算，毁灭和拯救的世纪将始于公元 1876 年，终于犹太人 5735 年，整整一百年。在这期间将

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犹太人将会到来，建立犹太国。但是到处也将会有人们从未见过的毁灭与灾难。鲜血横流，但以色列人民终将度过这场劫难。隐藏的光变得异常明亮，一直穿透笼罩着他们的外壳，而且彻底改变天堂中的秩序。上帝会参战，被击倒，但最终将战胜一切。哦，主啊，众神之中谁有如此神力？……上帝的敌人被驱散到各处……阿东斯基等待这些事件的来临。很难想像阿东斯基，一个土地投机商，会第一个获得拯救。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到达以色列之前，阿东斯基一直守候在这里，默唱着赞歌，挥舞着无形的旗帜，希望得到拯救，希望将自己带出埃及。他每年都在心中上演"出埃及记"的场面，拯救别人，也拯救自己。土地至关重要，即使土地对于热爱和拥有它的人往往报以暴怒与敌意，但是还是必须拥有土地。阿东斯基知道土耳其帝国行将崩溃。他知道土地管理制度将会刺激人们前来定居，所以他先于别人抓住了机会。很快，第一批移民到来，他们都放弃了对弥塞亚的信仰，都开始找寻新的圣歌，都对他们祖先渴求的土地充满忧郁与渴望之情。但同时，土耳其人仍占据着港口。到处是饥荒和疾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绝望，而满载乘客的船也离开港湾。阿东斯基此时十分悲伤，因为他的先知先觉和黄金交易与其不动产是联在一起的。人们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还用意第绪语、俄语和不怎么流利的希伯来语骂他。

于是阿东斯基来到雅法。

他对于未来有所准备，对于按他自己的方式理解的节制、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也有所准备。他本人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从不在议会中投票，不参与政治，不加入任何协会，也不在深夜里高唱激昂的歌曲。

他经常清晨就离开家。集市还空无一人，屠夫正在把大块羊肉倒挂在铁架子上。西红柿和蔬菜堆积如山，同时还能听到理发师磨刀的声音。远处的大海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又归于平静。集市尚无人光顾，却充满喧闹之声。这是一个让人无限眷恋的时刻。阿东斯基骑着马，带着他的阿拉伯仆人，去外面勘察土地。阿东斯基告诉沃尔夫先生(那是个德国间谍)他喜欢土耳其人的精明和腐败。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但价格经常变化。所有人都可以标上一个相对固定的价钱。人们可以付给领事馆一笔钱，然后得到新的公民身份。土耳其帝国就是这样解体的。拉尔巴格本来是希布伦人，可现在已变成了拉比诺维奇。

我从施劳姆津眼中领会了一个重要的道理：犹太复国主义本是阿东斯基创造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接受。

因为阿东斯基热爱以色列这块土地。

全国没有一条街道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是每一座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无不归功于阿东斯基。

施劳姆津说，他是旗杆，而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旗子。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波比多诺采夫的事。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顾问，他从沙皇那里学到了一项重要的原则：严厉压制犹太人，永远不要手软，直至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掉，三分之一皈依，三分之一离开俄国。

这些话，尤其是最后一部分，构成阿东斯基思想的基点。在讨论建特拉维夫城的大会上，他甚至宣称特拉维夫这个名字因其略带东方阿拉伯味道，所以非常合适。(他拒绝住在也门人居住区旁边建造的新区，因为那一带原本一片荒芜，现在渐渐形成环绕着也门人葡萄园的城市。)他认为当地人很容易念出这个名字。其他人也点头称是。

阿东斯基在雅法安家，他说“雅法”这个词的词根是“yofi”，

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美",而且也与希腊语相连。他还从《约伯记》(他认为此书乃乐观主义作品)中找到了一个贴切的双关语。"yofi"这个词中的字母若颠倒顺序,可代表对未来的允诺,一座由拿破仑建筑于尸骨之上、在狂风巨浪中颠簸摇曳的海上堡垒。在这块海上岩石上,面对窗户,安德罗米达被献祭给海神。在耶路撒冷,人们没完没了地讨论休耕年的律法以及如何适用于新的聚集地。雅法的地位由此得以巩固。这里有土地可以购买,而且会发展成一个新的移民聚集地。雅法将成为一个中心,未来拯救的港口。

1892年,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铁路建成。火车站就靠近奈维沙洛姆。

在阿东斯基的倡议下(也许还包括别人),建立了军需品、日用品、进出口、以及后来的农业设备的企业。

耶路撒冷将永远难以摆脱对往事的回忆,但在这里我们将在土地上建造一个国家。从半新半旧的土地上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他向世人宣告,雅法到处是绸缎、花香、烤熟的鲜鱼和冰凉的柠檬片,雅法是世界上一颗闪亮的珍珠。

第十七章

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到达以色列时，阿东斯基等待的日子终于来临。人们纷纷传言，说犹太人要来了，他们要经营这片土地，耕种，修建房屋。阿东斯基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没有被这种传言所吓倒。他一直在盼望这些人的到来。

他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花边新闻，而是他很久以前就预见到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可以说在橄榄山上的墓地中，他已在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做准备了。正如赫茨尔在巴塞尔一座桥头远眺时头脑中充满未来的图景，阿东斯基对未来的展望却是在执意葬在圣地那些人的坟墓中展开的。他清楚地知道(没有沮丧或恶意，也没有过多的感情)，对于那些要耕种这片布满岩石的不毛之地的人们来说，那一日已经近了。

耶库提尔拉比是来自萨法德的使者，他对此将信将疑。他讲述了对君士坦丁堡年轻犹太人的印象。他说他们看上去像雅法附近美国人聚集地中的美国人(现在德国的圣殿骑士团成员住在那里)，他们谈论犹太人迁居以及民族复兴，用希伯来语说话。阿东斯基点点头，大声宣布他一直在盼望着他们。此举令雅法的几个极其博学的人大为震惊。人们和土耳其总督一边喝着咖啡、抽着水烟，一边嘲笑新来的犹太人和他们的计划。

阿东斯基没有笑。

他没有笑是出于下面两个原因。因为他有信仰,还因为他的身体不允许他笑。阿东斯基的嘴略有些歪。他试图笑过一次,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们以为他的阿拉伯仆人死了,而他正为此伤心难过。因为大家知道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让他难过:或者他女儿施劳姆津死了,或者他的阿拉伯仆人死了。施劳姆津那时正在他身边,所以肯定不是因为她。他们没想到他正在微笑。他总担心阿拉伯仆人的健康,因为后者能够叫出所有花和植物的名字,而且能告诉他有谁想卖地,什么时候想卖。(阿萨姆·卡萨尼几年后才来到雅法。)

这个阿拉伯人对土地的好坏很在行。他知道那种带来疟疾的蚊子总是要离开一个地方几个星期,然后再杀回来。他了解这里的环境以及土地许可证的危险。对于阿东斯基一开始的生意,他是一个理想的向导。后来,当阿东斯基不再需要指导或引领时,阿拉伯人就像一个假肢一样。

对于早期的犹太定居者,阿东斯基的态度不冷不热。他对他们有点兴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利可图。他们对未来的展望虽然激动人心,但是过于卤莽,过于模糊,因而无法感动阿东斯基。他们近乎偏执地信奉一种信念,而在他看来,这种信念有些杂乱无章。他深爱这块土地,尽管他以近乎强迫的方式拥有这块土地,但这块土地仍报之以惊人的活力。但是他对于他们乐观的憧憬颇不以为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茶叶商和小商贩会突然决定像阿拉伯人一样来做农活。但是,公平地讲,虽然他不能理解,但他并不因此而心怀偏见。阿东斯基酷爱黄金。在施劳姆津舅妈家里,任何钱币大家都要把玩良久,而一枚金币更是足以让大家欢庆一番。施劳姆津还在十四行诗中大加歌咏。这些诗写得有些拘谨,但热情洋溢,她就在雅法那间大屋子里靠这些诗来消磨盛夏或寒冬的夜晚。

阿东斯基早晨一般都去集市，然后从那里骑马出发，身边总跟着他的阿拉伯仆人。人们都知道他对主人绝对忠诚，他内心深处总希望让阿东斯基高兴，让阿东斯基喜欢他。他总是盼望能看到阿东斯基双眼闪出快乐的火花。他会说：这是块好地！他知道什么地适合种麦子，什么地适合种柠檬。他分辨得出各种味道和各种蔬菜，他讲的故事充满祖先的智慧。阿东斯基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秘密，而只有像他这样精明的商人才懂得如何运用。

施劳姆津的妈妈米瑞阿姆像爱护一件首饰一样呵护着她的容貌。她不苟言笑，身上总有一种被压抑住的野性和怨怒，如同一只受了伤的狗在哀号。她从未见过阿东斯基，但在她爱上阿东斯基那三天之后，她就退进自己的影子中，踏上她所渴望的遗忘之路。她蔑视阿东斯基，因为他使她堕入爱河，那三天纯属多余，而且充满朦胧、虚幻的光芒。她宁愿死去也不愿意他为此感到不安。

米瑞阿姆弱不禁风，雅法城里尽人皆知。最初她经常去找拉比，要一些药或者秘方。他们为她请下各种神灵，有时阿东斯基也不太情愿地掏腰包，送他们一些礼物。而更多的时候他总是私下骂他们几句。

米瑞阿姆带着骄傲的、贵族般的微笑隐退进她自己的阴影中。她学会了珍惜她罕有的容貌，这种美不易把握，很温顺，如同锁在盒子里。这是阿东斯基的看法。她开始疯狂地收集宝石，她培养出一种神秘、准确的直觉。这是一种非常精微的感觉。即使从很远的地方，她也能一眼辨出绿宝石或蓝宝石的光泽。她瞒着丈夫买宝石、卖宝石，而阿东斯基则忙于买卖土地，就像他的偶像和救主、古代的国王亚哈一样，扩大帝国的疆域。

米瑞阿姆有一个红皮箱，里面装满不少值钱的珠宝。她觉

得阿东斯基知道这个箱子。

每当拉比或者医生带来药方和药，而阿东斯基拒绝付钱的时候，米瑞阿姆就会给他们一件首饰。然后他们会把这些首饰以稍微高一点的价钱卖给阿东斯基，而阿东斯基在贝鲁特买地的时候，又会以更高的价钱卖给来朝圣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到东方来，为了与上帝靠得更近一些，为了找回死者或死去的殉教烈士，为了去沙漠寻根，或者到耶稣蒙难的地方拍照片。

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交易中获益，没有人有任何损失。

施劳姆津从中学会的东西是任何女子学校、甚至第一流的希伯来高中在两千年中所无法教授的。

即使阿东斯基发现他刚刚花了五法郎买了他妻子三法郎卖出去的首饰，他也不后悔。他从不抱怨。他自己补上其中的差额，他不在乎谁第一个获利。

施劳姆津很爱阿东斯基。她从不提米瑞阿姆。她记得阿东斯基是怎样欢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游客。他带着他们来到犹太先祖的埋葬之处，他穿过贫瘠的山地去见沙漠绿洲中的金发修道士，他付给他们钱，让他们引导游客参观名胜古迹。阿东斯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希腊和罗马的玻璃、古钱和珠宝、天使和圣徒。他知道这片饱受摧残的土地的欢乐和痛苦的呻吟。晚上，他总是到街上去散步，他好像沉醉在微风之中。他见到那些高谈解放运动、希伯来语复兴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新面孔。他会分辨谈话的内容偏向何处，然后作出相应的回答。他会替那些新来的人在一般人难以置信、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购买土地，而在心中，他始终恪守一个基本原则：没有什么民族复兴，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也没有民族重建。尽管有波罗科夫的经济理论，金字塔也不会被倾覆。

我们是犹太人。金字塔会再一次倾覆、崩塌。他知道这片

满含怨怒的土地并不喜爱这些继承古代统治权的主人。他更相信贝鲁特那些老爷们颁发的土地证明,坐在他们腿上的法国女佣正掏空他们的口袋。他不相信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土地证,他嘲笑那已破碎的梦想,这种梦想充满暴烈和疯狂,将企图重新创造自身和民族的年轻人驱向加利利。但是他看见他们来了,而他心里知道他们最终将埋葬在这里,而不是开始新的生活。他知道造物主喜爱死去的犹太人。而造物主的确在这里居住,在这里降生,在这里创造。这土地本身讲述了他没有实现的爱,而且将一如既往证明造物主对所有爱他的人无休止的报复。上帝从未将生命赐予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这土地是专为建造坟墓的,以便让世人看到救世主的来临。

如果不了解米瑞阿姆的文弱或者阿东斯基不能发笑,我们就不能理解施劳姆津大舅妈。阿东斯基是在墓地中碰到沃尔夫先生的。他知道沃尔夫不是什么医生,他也知道他的阴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全国一片饥馑,沃尔夫先生对阿东斯基多有关照。当英国人接管、土耳其人和德国盟军被赶走以后,阿东斯基保护了沃尔夫。沃尔夫先生临走时流下了眼泪。他在那里当了五十一年间谍,有很多孩子。他不认识他的亲生子女,他视自己为一位异教的神祇,在这块土地上广布苗裔。他向轮船大步走去,还背诵了荷尔德林的诗,老泪纵横。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几年后,沃尔夫先生回到沙伦那定居。纳粹当权时,他年事已高。他憎恨他们,还写了谴责信寄回德国。但是他仍不能见容于沙伦那的居民,所以再一次离开这个国家。和施劳姆津告别以后(那时她已嫁给内海米亚,生下阿帕沙德,他后来逃到美国,改名为阿蒂·布兰特),沃尔夫先生死在船上。

他离开时,施劳姆津对自己说:就在那艘法国船开了五炮、穿过我头发的那一刻,一个新时代诞生了。那个无聊而短暂的

旧时代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连厌恶也变得更加严厉。

阿东斯基爱施劳姆津胜过其他一切。米瑞阿姆则毁于对阿东斯基盲目的仇恨。她没有死,她只是像烟一样消散了。有一天,人们在她床上发现了她的尸骨。床边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首饰,还有写给阿东斯基的责骂他的信。她一辈子都在写这些信,但是没有寄出去。尽管她的尸体开始分解,可是她依然美丽如初。支撑她生命的东西有一天突然消失,她就变成一个打碎了的古罗马香水瓶:蓝色,透明,古色古香,就像阿东斯基从阿波罗尼亚买回的艺术收藏品。然而一旦打碎,就踪迹全无。

她正如这样一件物品。她的美没有消逝,即使她已归于尘土,她的美依然闪亮,好像在责备别人。她的死如同宇宙中遥远的星球被消耗殆尽、被转化成"反物质"一样,最后,只有她的美还能在柔软的绸缎上被追忆,还能被我们看到。

狂暴的爱可以是一件珍藏的首饰,也可以是缓慢的死亡。米瑞阿姆二者兼而有之。本-阿姆拉姆和她一同死去。他的名字被抹去。阿祖莱拉比没有企求上帝或死去拉比的原谅,就写了他的那些著作。本-阿姆拉姆的著作也是前人已经写过的。阿祖莱拉比从不承认自己写的东西本-阿姆拉姆早已写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米瑞阿姆死后葬在特郎派多街。多年之后,阿东斯基也葬在她身旁,他的葬礼非常独特、令人难忘。米瑞阿姆则如她所愿的那样悄无声息地下葬。阿东斯基说:她没有死,她只是消散了。

施劳姆津和她妈妈一样,具有一种罕见的美。她身体很单薄,而且易怒,集父母的情感于一身。她有一种慑人心魄的神秘魅力,很多人为之倾倒,但也令很多人感到不安。她是阿东斯基的女儿,是他反射在永恒中的影像。

时至今日,还颇有一些上年纪的人(他们的人数一天比一天

少)发誓说施劳姆津生在阿东斯基的怀里。这是在雅法很流传的说法:希森医生到达之前,施劳姆津就已经生了。她从她妈妈的肚子里一出来,就向阿东斯基爬过去。阿东斯基此刻穿着棕色西服,带着黑帽子,正坐在一旁。人们说刚生下来的施劳姆津钻进阿东斯基的身体里,然后满身是血地爬出来。她好像希望从阿东斯基的肚子里生出来。她从刚一生下来,就恨米瑞阿姆。她们彼此之间从不交流。除了出于礼貌以外,她从不找她妈妈。米瑞阿姆同样鄙视她自己生出的孩子。她叫她女儿"施劳姆津",而施劳姆津也直呼其名,叫她妈妈"米瑞阿姆"。她是由阿东斯基抚养大的。他们年复一年地从那间大屋子眺望大海,随时解决各种问题。所以施劳姆津在会读书写字之前,就已经熟悉她父亲的所有事物。

当我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我想写一写大施劳姆津的时候,她微微一笑。从她的微笑中难以察觉那些被施劳姆津舅妈的邪恶所迷惑的人们所表露的伤感。她只是专注地思考,然后说:又是我吗?

我说:不是你,我说的是施劳姆津大舅妈。施劳米特婶婶坚信我的这项计划毫无益处,只会毁掉身边所有亲近的人。她说:明天你就会写一个关于你女儿的恐怖小说了。

但是妈妈和施劳米特婶婶想到有人开始对付大舅妈,她们都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如果我写了这篇小说,施劳姆津大舅妈肯定不会读它。

她的儿子阿蒂·布兰特或阿米胡德·索洛夫斯基也不会读,他只惦记着那一点点遗产。她的后代不读关于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故事。我也许会给本－阿姆拉姆、阿东斯基或者米瑞阿姆朗读这篇小说,或者给那个向施劳姆津开了五炮、炮弹划过她头发的法国军官朗读。但是除了这个法国军官(我不知道他的下

落)以外,其他所有有资格读这篇小说的人都已不在人世。施劳姆津大舅妈不看书。即使在她最快乐的日子里,她也很少看书。内海米亚舅舅去世了,而如果让小施劳姆津妈妈读到施劳姆津大舅妈对妈妈痛苦不堪的生活幸灾乐祸的段落,她一定会不情愿地表示同情,这会让她很难受。

所以这并不是报复的问题,而是要探究那终极的恶的本质。这种邪恶闪着耀眼的光芒,而且充满诱惑。

一周之后,我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我头脑中酝酿的故事,她告诉我一个梦。那天风和日丽,她在特拉维夫北边的一所私人医院探望施劳姆津大舅妈。那时是春天。报纸上报道不幸的消息:货币贬值,边境冲突。所有人都神情沮丧,赶着回家看电视新闻。小施劳姆津妈妈离开医院,脑子里全是施劳姆津大舅妈,就像一丛有毒的荆棘。她在一条街上走,突然闻到芬芳的香气。汽车纷纷在拐角处停下来,那里以前长着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每次我急急忙忙地爬到最高处的树干上去看书时,我的裤子都会被挂破。施劳姆津妈妈微笑着回忆我被挂破的裤子,还有粘在衣服上黏稠的果汁。这些回忆让人无比悲哀。现在,那些沙子已不见了,葡萄园已关闭,长满仙人掌的地方盖起了丑陋的混凝土房子。她又不无讥讽地、自顾自地笑了起来,因为她想起施劳姆津无法忍受我竟会在她屋子里放声大笑。我不过是小施劳姆津妈妈不成器的儿子,而且又是中年人。什么时候?三天前。那天天气也不错,她这样想。

我带着我的小女儿一起去探视,她想见一见我这位有趣的舅妈。我说她并不是那么有趣。我的小女儿说:不是让人发笑的那种有趣,而是有点伤感的那种。我们只待了几分钟。施劳姆津说:你看上去不太好……然后她转向妈妈。内海米亚一点都不喜欢他。内海米亚只不过是客气而已。他知道怎么和小孩

打交道。谁说内海米亚喜欢阿米那达夫？你这么会这么傻？他只喜欢施劳姆津。

我提醒妈妈我妹妹汉姆塔尔和我女儿都生在这里，在二楼，就在我们这个房间的下一层。泪水突然涌上我的眼，让我吃了一惊。想起我妹妹生下来的情形，我仿佛回到了幸福的童年，小城生活，年轻的父母(比我现在还年轻)。我记起和父亲一起躺在大床上，等待从天而降的礼物。那是一个冬夜，寒风从海上吹过来，波涛汹涌的大海就在我父母的窗外翻滚。我们经常能看到鱼在纱窗外跳跃。父亲在打鼾，我在打盹。阿伯纳叔叔是巡夜人，他突然冲进屋子，大声宣布：那夫塔里，你得了一个女儿。然后他笑起来。当他来到门口时，父亲和我已经从床上掉了下来，因为床这时塌了。

父亲和我从床上掉下来那天晚上，汉姆塔尔出生了。至今这回忆依然很甜蜜。我搞不清楚这种甜蜜之感是不是来自我后来吃的甜麦片。也许恰恰相反：那甜蜜的时刻让麦片也变甜了。阿伯纳叔叔把这个消息又告诉施劳米特，他们一起跑到医院去看我这个刚生下来的妹妹。父亲站了起来，呆呆地看着我(他看上去像木偶戏中断了线的牵线木偶)。他问我，在凌晨五点三十六分和一个七岁的男孩能做些什么事。我说也许我们应当先去看看妈妈。他说：对，可是她让我给你做好饭，我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我从床上掉了下来，我要给儿子做早饭。我们又笑了起来，因为就在阿伯纳叔叔来之前几秒钟，我们的确从床上掉了下来。后来证实，妈妈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刻生下汉姆塔尔。阿伯纳叔叔在医院里，听到妈妈马上就要生了，他以为已经生了，于是赶紧跑来，正好看到我们从床上掉下来。他还得跑回医院，而这时人们告诉他，他的姐姐就是在他们从床上掉下来的时候生了。我们可爱的小汉姆塔尔一生下来，就让所有的人遭罪。不

过，我也是第一次吃上"老头牌"麦片。父亲不知道怎么做麦片，但他不想在儿子面前显得无能。所以他冲进厨房，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他做出的麦片是我吃到过的最好吃的。后来，他每天早晨都给我做麦片。他的做法十年之内没有人知道。后来，他终于告诉我他的秘方。现在我也给我女儿做麦片。她们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的。妈妈想学这种方法，但始终学不会。我妻子也学不会。施劳米特婶婶说，其实不是什么方法，而是音乐……有一种什么东西加入到水、糖、奶油和燕麦之中。

谁是在这儿生的？施劳姆津大舅妈问。

汉姆塔尔，还有我女儿！我指着她。施劳姆津妈妈露出祖母特有的慈爱的笑容，同时又把施劳姆津桌子上的什么东西摆正。

啊！施劳姆津大舅妈叫了一声，她的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古怪的神情，如同一个将要上绞架的人，又像一只被人重重踩了一脚的猫。她指着二楼，不耐烦地说：是呀，永远有人在那里出生！

小施劳姆津妈妈的心情又高兴，又忧郁。她想明白梦的含义。夜晚非常安静，又充满烦恼。她睡了一个小时，梦见她来到一个屋子里，里面全是镜子。她在每一个镜子中都看到一个不同的自我，好像她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有一面不同的镜子。小施劳姆津妈妈聚精会神地读着我写的书，那是她亲爱的儿子所写的、讲述施劳姆津大舅妈的书。那些印在重重叠叠的镜子中的小施劳姆津一边哭一边说：看哪，一本讲述美丽女人的书，一本讲述美丽女人的书！她自己则反唇相讥：不要给她写书，不要用你的魔力唤回阿东斯基。不要更多的毁灭！他已经毁了不少东西了。上帝，让他们活下去。他们怎么得罪你了？为什么要报复？施劳米特婶婶和有些人一样，他们认为写作是一桩恶毒的

事情，它只带来痛苦和复仇。我自己也意识到，写作是把自杀和爱连在一起。我知道写施劳姆津舅妈的人实际上是在写自己。所以，我是通过这个可怕、邪恶、而又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女人在写我自己。我由此变得更加邪恶，我已准备好命中注定的报复行动，报复我自己。这是我的报应。

施劳姆津大舅妈的故事能不能写出来？我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我现在已无路可退。我可爱的小施劳姆津到处修复碎片，搭救尚未淹死的人，在怜悯他人的同时也怜悯自己。但是，报复近在眼前。那些本不需要获救、却被她搭救的人，心中充满恚恨。

第十八章

一位年迈的律师，仪表堂堂，尽管天气很热，他仍穿一身黑西服，汗珠从厚厚的衣服下面渗出来，他面色红润……他已经气急败坏地打过了电话，想得知更多的细节。施劳姆津比他技高一筹。他大模大样地来到巴克雷斯银行，可是像一个被责备的孩子一样被回绝了。银行早已得到明白无误的指示，不得为他提供服务。他正在调查是谁下的这道命令。难道像施劳姆津这样的女人会愚弄他？他已经为她服务了四十七年，半点差错也没出。她很久以前就甩掉了他，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在特拉维夫北面一所私人医院的大厅里遇见他。他的双眼露出茫然之色，他好像一个遭人偷袭的人，不愿意露出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我和他仍是对头。他刚被赶出施劳姆津家，现在他悲伤地看着我，神情呆滞。看着一个小伙子开着一辆漂亮的赛车招摇过市，他回想起过去他也曾驾着华丽的马车四处疾驰。他的眼睛仿佛对我说，变化实在太快了，但是，年轻人，我是不会在你面前认输的。和其他被施劳姆津羞辱过的人一样，他希望去理解、去爱她的邪恶，而且只有在有资格嘲笑她的一群人中，他才会对这位绝妙的女人挖苦一番。他的眼睛似乎在告诉我，我绝对不会在你面前嘲讽施劳姆津。你还不够格！你还没有达到我们的水平！

我坐在花园里的天竺葵丛中。汉姆塔尔跑上去，冲施劳姆津大舅妈微笑。那个律师在等出租车。在回家的路上，他将会哭泣，然后擦去眼泪。他会给其他年迈的律师、他过去的老友打电话。他会孤独地躺在那张旧床上，穿着白色的睡衣，在那个夜晚死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已毫无用处。

她在她四周建了一道屏障。只有在安息日的下午，当她没有接待什么重要客人时，她才会偶尔同意来看看我们。妈妈自己做饭。星期五她下班以后，总是去采购，而且还让我买这买那的：比如孟德尔街的蛋糕，那个胖子卖的奶酪和黄油。那个胖子住在德国人居住区里一栋红屋顶的白房子中，靠近梧桐树和糖果店。他的店里有一位黑头发的女孩，她眼中闪着梦幻的光芒，她有一种纤细、外露、恼人的美。这个穿黄色镶花衣裙的女孩总是从挂着希特勒照片的房子里给我拿来奶酪。她故意无视我的过去，这种淡漠深深刺痛了我。但是，奶酪唤起被我遗忘已久的温柔之情，它让我回想更遥远的过去，我曾和父亲一起在夜里坐着这个胖子的马车赶往加利利。父亲在月光下唱着德国歌，她和我则向裹在黑暗之中、但却异常明亮的山谷里扔石子。我想起她头发中的沙粒，父亲朗诵诗歌时她的笑声，混杂着德语和阿拉伯语的嬉笑怒骂，喷着响鼻的马。我想起那个加利利的夜晚，这些情景感人至深，但从未融为一体。

后来，妈妈炒菜的时候用了所有的炉子，也用光了灯芯。爸爸为此责备她。他正在擦玻璃杯，把它们擦得锃亮。他打碎了一个杯子，然后煞有其事地喊道：看哪，你与我订了婚。她喊道：谁订婚了？我们没有多余的杯子了，可是施劳姆津马上就要来了！她哭了起来。爸爸为了逗她高兴，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美国人和中国人挖隧道的故事。这个故事他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美国人找了一百个工程师，让他们伏案工作。然后他们找

了两组工人开始挖。他们算好，六月二十四号星期天四点钟，两组人马将会相遇；这样就挖好了一条隧道。而中国人找了一百万人在山这边挖，另一百万人在山那边挖。如果两方能相遇，就挖好了一条隧道。如果互相碰不到，那么就可以挖好两条隧道！所以目前，不需要什么案头工作。爸爸笑起来，妈妈却没有笑。杯子打破了。施劳姆津第二天下午就要来了。

饭做好了，大家都翘首以待。爸爸上午会在阳台上读歌德，凝望大海。妈妈做最后的准备，加一点味，加一点调料。一切都准备好了。下午十二点半，就在卡皮洛维奇将要预言纳粹德国投降的准确时间之前，他们来了。内海米亚面带微笑，施劳姆津大舅妈戴着一顶大帽子，显得疲惫不堪。她对我们满怀同情，她理解地看着妈妈，好像在安慰她，然后指着阳台上的爸爸对她说：你这是自作自受！爸爸笑着回击：来了一个悍妇！内海米亚不禁哈哈大笑。施劳姆津说：也许我们应该说德语，那夫塔里不懂希伯来语。我说，如果我的希伯来语像爸爸的一样好，我的记分册上就会是“优秀”，而不是“有进步”了。她回答说：是的，但是一旦成了德国人，就永远是德国人。我们知道爸爸可不是这样，但我们都没吭声，生怕会引起争论。

沉默。我们听“耶路撒冷之声”的新闻和卡皮洛维奇的分析。然后，四面八方突然响起唱诗班的歌声，而爸爸唱起了“阿依达”。从我们家的阳台上能看到大海，这之间有一片沙滩。邻居家的孪生子在沙滩上撒尿，用尿把他们的名字撒在沙滩上。施劳米特婶婶从她家的阳台上向外张望，望着装满苔藓标本的试管以外的世界。她为她白白逝去的年华悲伤不已。这时，施劳姆津大舅妈说：真是物以类聚。在雅法也是这样。我记得阿东斯基对我说，告诉我你的邻居是什么人，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我不抱怨。是啊，过去的日子很难。内海米亚像往常

一样觉得不舒服。我今天吃了三片药，而他突然想睡觉。我对他说，内海米亚，我们今天要去看小施劳姆津，我要去。他呢，可怜的家伙，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个不停。看看他，他很快就会饿死了。但是有谁在乎呢？

我们终于坐下吃饭了，妈妈端上汤。我等着，内海米亚已经喝了两勺了，他脸上露出微笑。爸爸专心致志地掰开一片白面包，妈妈站起来，坐下，又站了起来。汉姆塔尔坐在高椅子上笑着，嘴里塞满葡萄，身上弄得湿乎乎的。

施劳姆津舅妈尝了一口，把汤含在嘴里。这是一个令人痛苦不堪的时刻，充满自我牺牲、无声的指责和无穷无尽的折磨，她就这样悬在生与死之间。最后，她终于把这口汤咽了下去，像一个受了伤的婴儿一样露出一副苦相。她把勺子放在碗里，用餐巾擦了擦脸，然后就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爸爸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可内海米亚却停了下来。她说：是——啊。她把声音拖得很长，随后她面色苍白，好像要晕倒一般。她说：今天帮厨的人有问题。他们什么都不懂，有些人不该知道的事反而懂得很多。这种人多得不得了，他们为别人料理家务，是因为他们的主人为了赚几分钱就给英国人当司机或别的什么。他们就住在别人家里，谁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现在他们又开始做汤了，结果怎么样？可怜的小施劳姆津可受了害。我得给她找点更可靠的人。如果我能活下去，如果我能保住这条命，不让它明天像夜晚一样枯萎……我要给他们一点厉害！

她不提问，只是不停地说。

我们都瞪大眼睛看着她。汉姆塔尔奶声奶气地说：施劳姆辛舅妈，施劳姆辛舅妈，拖车翻到月亮上去了。鱼鱼在盘盘里。鱼，盘子，糊糊。

爸爸赶忙解释：鱼在盘子里变成了糊糊。内海米亚觉得自

己已从尴尬的境地中摆脱了出来，于是赶忙把汤喝了下去。他没有抬头看妈妈，因为施劳姆津舅妈滔滔不绝的话让她无法脱身。爸爸又说：汉姆塔尔现在还说不成话。她 不会说“k”或者“g”。她把“看”说成“叹”，把“刚”说成“当”。鸭子怎么叫，宝贝儿？

哒，哒，我那可爱的小妹妹汉姆塔尔说。

内海米亚笑了起来，他把汤喝光了。施劳姆津只喝了那一勺，她说：她跟她爸爸一样聪明！妈妈不想让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于是说：施劳姆津，这汤是我做的，是为你特意做的！

施劳姆津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道汤，味道真棒。可是太不巧了，我早饭吃得太晚了。你做菜的手艺真不错，尽管有人整天做别的事情。我希望今天我们不要吃鸡，现在的鸡肉实在太老了。

妈妈做的鸡她连尝都没有尝，她有说不完的怨言。我们一边吃鸡，一边听着她没完没了的唠叨。然后，我们坐在阳台上，看着大海变蓝、变紫，云彩从海上划过，鸟儿在穆斯林墓地上方盘旋。施劳姆津舅妈不知道阿萨姆·卡萨尼仍埋在那里。十年之后，他的墓才被移到别处。

第十九章

施劳姆津从医院的窗户里看着外面的鸟。小施劳姆津妈妈坚持认为施劳姆津大舅妈以前从未谈过鸟。现在，她花好几个小时观察鸟。她的书桌上放着两张照片：阿东斯基和装扮成小丑的内海米亚。施劳姆津舅妈七十六岁时开始看鸟。将近七十七了，我订正说。小施劳姆津妈妈证实了我的说法。她又吃惊，又高兴。那个穿戴讲究的医生对鸟没有兴趣。他正为一位体弱的女人做检查，没有注意到她眼中闪现的鸟。多年以前，在阿萨姆·卡萨尼临死前的双眼中，在年迈的阿东斯基的玄想中，也有鸟在闪动。施劳姆津也许正走向安息的时刻。

我一开始满心希望了解施劳姆津，但只是瞥见了她一生中几个重要时刻。我虽有些失望，但还是将我知道的材料整理一番，希望能理解它们，或者至少把它们编排一下。她头发中的五枚法国炮弹，抑郁的时候或者狂喜的时候……在这个邪恶女人的身上有一种魅力和优雅。她是阿东斯基梦中情人、一个妖女的女儿，虽是米瑞阿姆的女儿，却常年得到一个来自西顿的妖女的帮助。

她眼睛中有什么东西正开始消逝。就在她发现鸟并开始逗它们的时刻，我注意到那种既吸引我们又令我们痛苦不堪的神秘的东西变得黯淡起来。她坐在病床上，这一个月就要花一万

两千里洛特……窗外的鸟儿拍打着翅膀，跑过来吃她让护士扔出去的面包屑。她撅着嘴，冲那些鸟儿叫。但是她眼中的神采已经熄灭，或许把别的什么东西熄灭了。当那种东西不在的时候，它反而显得异常巨大；当它消失的时候，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和施劳姆津妈妈一起在施劳米特婶婶家里，我们想弄清施劳姆津大舅妈的一些事：有三个人没有列为她的继承人，这三个人一直屈从于她。我们决定给阿蒂·布兰德写一封信。施劳米特婶婶不愿意，妈妈也不太情愿，于是我自己写。我告诉他，往日的施劳姆津突然之间死去了。有一天，她合上眼睛，等她醒来时，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再说讽刺挖苦的话，只是抱怨我们夜里不给她盖被子，指责我们没有给她介绍妈妈的新丈夫。仅此而已。我在信中说，她不再对我说我长得有多难看。她不再谴责我以前偷邮票的事，她甚至记不住把家里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你应该来。我在信里说，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我知道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因为她受了多少苦。虽然她的五份遗嘱我一份也没见到，但我知道她的遗嘱里面没有你的名字。可是，她是你母亲，你惟一的母亲，你应该来看看她。阿特，你应该来，你可以给这次访问安上另外的名字，你也可以找一个遗嘱执行人帮你讨回你应得的东西，但是你应该来，这是你的责任。至少，内海米亚的证券属于你。房子呢？房子怎么办？阿特没有马上回信。我给另一位朋友写信，让他劝劝他。朋友回信说，阿特的生活好像很糟糕。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他试图让自己的孩子免受“我母亲的诅咒”。那位朋友还说，阿特正和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儿混在一起，她比他小二十四岁。在情绪激动或悲伤的时候，他称自己为阿帕沙德。他郁郁寡欢，像他母亲一样，试图将自己从镜子里的深渊中，或者从灯光明亮的

舞台上救出来。我对自己说：和他妈妈截然相反，他爱这个世界的色彩斑斓，但是恨自己的时候，却是黑白分明。

我明白。十五年前，施劳姆津决定去美国看儿子。她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她之所以屈尊纡贵来看他的原因。她想看看能不能救助他，能不能见见她的孙子孙女，要不要把她父亲留给她的书和几件家具送给他们。她希望了解他为什么执意把一个日本婊子当做妻子，为什么他要生黄种的孩子。

我妹妹汉姆塔尔那时也在美国。她从旧金山出发，去纽约旅行，途经芝加哥时住在阿特家里。她发现阿特那时情绪很低落。他把孩子们叫过来，给他们看奶奶的照片。他努力给孩子们解释：奶奶说外国话，她过几天就要来了，你们要听话，要按我说的去做。孩子们都怕她。他们不认识她，但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他们并不盼望这次会面。请注意，我刚才的措辞非常慎重。

阿特的一个女儿病得很厉害，可是她长得很美，身体发育也很好。她叫美莉桑达。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她长得和施劳姆津与米瑞阿姆像极了，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是这一系的第三代，和她前面两代人长得一模一样。我有一次对阿特说，我从没见过和她祖母长得如此之像的人。他浑身一颤，然后问：为——为——为什么？我喝了几口水，等着他结结巴巴地问完，然后回答说：这还用问？如果你看过你姥姥米瑞阿姆的照片(我可是看过)，你就会明白这简直是个奇迹。希布伦有一位老人，像保护护身符一样保护着她的照片。他死的时候，还死死抓住不放。人们说他是一位睿智而且博学的学者，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拉比。这位学者曾被阿东斯基羞辱了一次，结果有五年时间一言不发。后来，他结婚生子，大屠杀时逃离了希布伦。但是，他一直保存着米瑞阿姆的照片。他把它像一件护身符一样挂在胸前，有时候则像一把小小的屠刀。我对阿特表哥(那时他

叫阿帕沙德)说,如果你见过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这简直是个奇迹。

阿特是股票方面的行家,但对奇迹所知甚少。他对于米瑞阿姆的家史或者本-阿姆拉姆都毫无兴趣。他不太会说希伯来语。他一直在为女儿治病,但最终仍无济于事。她非常美丽,可是脾气很不好,总给人惹麻烦。他一直为她的病操劳,连妻子也失去了。他的生意失败了,钱也所剩无几。可是,他后来又东山再起,经济又宽裕了起来,这让他觉得很宽慰。在美国,阿蒂·布兰德被认为是很冷静的人。他在股票、证券的赌博游戏中表现很好,最后在芝加哥一所从未雇佣过犹太人的公司谋得了一个显赫的职位。他兴奋地告诉我:就算是一个皈依了的犹太人也不可能坐到这个位子。他的英语很流利,他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有一次他说起一百年前林肯被刺的事,竟流下几滴眼泪。

但是,他说希伯来语的时候,总是结结巴巴的。

他和以色列人或家里人在一起时,整个神情完全改变,他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雾,显得死气沉沉的。他马上会结巴起来,对以色列地或以色列国讽刺挖苦一番。施劳姆津有一次激动地说:到他这里,一切都了结了。

虽然他竭尽全力,可是美莉桑达却没有康复。他现在知道了怎样忍受这一打击。施劳姆津说这都是通过基因遗传下来的,也就是说,从我外祖父希姆哈那里传下来的。她甚至可以证明这一点。她总是说,就拿小施劳姆津的儿子阿米那达夫为例吧。有谁像他那样心理失常?靠别人为生,以破坏家庭为乐。真丢脸。养的女儿都不是自己生的。

我一言不发。

我表哥离了婚的妻子在马塞诸塞的大学里干得很不错,她也许为他感到惋惜。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一年。施劳姆津的

恶毒深深刺痛了她，她不得不离开他。有一天，阿特喝醉了以后，把他自己孩子的母亲叫做日本婊子。

施劳姆津打算来看儿子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桑德拉还没有离婚。我妹妹汉姆塔尔在从旧金山到纽约的路上，在芝加哥逗留了几天。她在阿特的家里过得很愉快。她还在芝加哥的时候，施劳姆津的信到了。

在信中，施劳姆津想当然地认为阿帕沙德会到纽约机场接她，然后从那里一起来芝加哥。她在信中说，我很可能会晕头转向的，弄不好在转机的时候会上一架去俄国的飞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阿特很忙，被这件事搞得心烦意乱的。他说他不能去纽约接他妈妈，理由如下。他说，首先，这毫无道理。她到纽约以后，下了飞机，走几步路，再上另一架飞机（空中小姐穿黄色制服），然后就到了芝加哥机场。她是一个成年人，又在国外旅行了很多次，为什么他要大老远跑到纽约去接她呢？难道只是为了把她从一架飞机领到另一架飞机上去吗？

阿特那时钱有点紧张。路上的花费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

他怕和他妈妈单独在一起。

汉姆塔尔此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后来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她表哥着想（也是出于她女性的同情心），她愿意去纽约迎接施劳姆津，陪她登上“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把她送到她儿子身边。

阿蒂·布兰德又高兴又感激。他费了很大力气，用结结巴巴的希伯来语试图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后来改说英语，用了一长串断断续续的句子回忆了她童年的事情，好像在描绘一座用糖做成的、即将喷发的火山。

汉姆塔尔告别了桑德拉和阿特，坐飞机去了纽约。在一个

风雨交加的星期天，她从一家中国餐馆走到另一家中国餐馆，仔细对比包在"幸运饼"中纸条上的简短预言。她喝了不少葡萄酒，虽然精力越来越难以集中，她还是努力研究她的未来。纸条上有的说她将长命百岁，有的说她将周游世界。她费了半天力气，发现她的未来一片光明。有人为了开玩笑，甚至在"幸运饼"里的纸条上说，他在广东一个宴席上被捉到，他恳求说：快来救我，不要让那锋利而无情的红色剪子剪掉我这资本家的器官。

她笑了，又喝了些薄荷茶。然后，在去了六家中国餐馆之后，在狂风暴雨中，她去了机场。

飞机到达之前几分钟，雨突然停了。汉姆塔尔后来对我说，一定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走到外面，肚子里装着六家中国餐馆的菜，她在心里说：雨呀，求求你，不要下了！（她又把她舅妈的名字放了进去，想到施劳姆津大舅妈马上就要来了，她心里充满敬畏之情。）她说：求求你，别下了，别让舅妈生气！

汉姆塔尔后来说：我没有对着雨大声喊。我只是小声说了几句。

突然之间，雨一下子就停了，就像汉姆塔尔做电影剪辑的机器一样，说停就停。

飞机在晴朗的天空下，在刚刚下过雨的地上降落了。晚霞很快就会在开阔的空地上撒下金色的余辉，然后夜幕会降临，覆盖万物。

汉姆塔尔等着飞机。在酒吧里，她认识了一位正在喝威士忌的老飞行员、一位机场管理员和两位塑料做成的模拟空姐。管理员允许她到跑道旁边去等。汉姆塔尔正忙着消化她胃里的上海菜和广东菜。飞机降落，在雨后的空气中滑行。飞机上各种灯闪着耀眼的光芒，最后又突然熄灭。

施劳姆津大舅妈穿着华丽的纯毛套装，她的发型由成千上

万根小针固定着。当她发现汉姆塔尔时，她尖叫了一声，整个机场都为之一震。在刚刚还亮如白昼、现在已一片漆黑的跑道上，在引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一位可爱的女人在高声尖叫。

施劳姆津的叫声盖过了一切。

阿帕沙德在哪儿？她大声问。在哪儿？他不方便？为什么是你？谁找的你？谁叫你来的？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跟着我？走开，丑八怪。有其母，必有其女。我想她大概也来了吧，想造反吗？想把我有的这点钱拿走吗？走开！

汉姆塔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她吃了一片药。医生说过，这药见效很快。但他并不知道他给汉姆塔尔的药是为了应付施劳姆津的。“利眠宁”和中国菜一起发挥作用了。雨停在半空。施劳姆津离开以后，雨还会继续下的。

但是施劳姆津坚决不下飞机。她对身边越聚越多的人说，她要等到她可怜的儿子出现为止。她提着一个小箱子，仔细检查着传送带上的行李，她决不让某个无赖把她仅有的那一点点微乎其微的财产偷走。这个世界已经对她太刻薄、太无情、太不公平了。她喊道：让我儿子来！他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傻子到底是谁？她在飞机和候机室之间找到了一个凳子，一屁股坐下，还说她哪儿也不去。汉姆塔尔眼中满是泪水，她连哄带劝，反复解释，但无济于事。人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有人微笑，有人带着同情和怀疑的神情看着她们。施劳姆津叫住了机场管理员，她要求和经理、市长面谈，她还说她认识总统。她毕竟曾在外交使团工作过。她认识所有的要员！如果不满足她的要求，她就一直坐在这里。

她决不离开。

机场经理是一个成熟稳重、风度翩翩的人。他对这种怪事习以为常，他的工作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也试图让她平静

下来。她瞪着他,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

汉姆塔尔想提箱子,施芳姆津打了她的手一下:别偷我的东西!你和你妈都一样!不愧是希姆哈家的人!给你个脸盆,你就会把整个机场都卖掉。你可以为我的女佣工作,拿一桶热水,用漂白剂和蓝色漂白剂给她洗衣服。你的手和那夫塔里的一样!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地凑到阿东斯基的女儿旁边?你都不认识他……听着,我知道你的名字,她转过去对机场经理说。

他说:夫人,请到办公室来,我们会把问题解决的。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说你叫什么?她问道。

麦克斯·艾伏伦,他这样回答。

麦克斯·艾伏伦?她把这几个字慢慢地念出来。她的脸上突然一亮,有一度她的眼睛里闪耀出一种职业般的光彩。你?你想吓唬谁?你是麦克斯的儿子……你的名字是阿西亚萨夫·拉布尔。

经理的脸红了起来。生下来有这样一个名字……

她一把抓住他。听着,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你的姨妈凯齐娅来参加内海米亚的葬礼,我们免费送她去墓地,她还问你父亲一些模棱两可的无聊问题:爱我,不要爱我!……你的事我都知道。听着,拉布尔……

他低声说:可我在这儿的名字是麦克斯·艾伏伦!

好了,随你吧!可我哪儿也不去。她是我丈夫的同父异母妹妹的过继的女儿,她想把我带走。你一定要救救我!

他说很抱歉,有人正找他。他手中的通话机响了起来。这场混乱过后,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人群散了,汇入了温暖、明亮的机场大厅。只有可怜的汉姆塔尔还留在那儿。施芳姆津和汉姆塔尔走向候机室。她们找到

一个孤零零的凳子，默默地坐下。汉姆塔尔说：舅妈，您听我说，阿特来不了，美莉桑达身体不好。他本来说什么也要来，可是正好我要来纽约，所以他想……

他根本没有思考能力，你别给我编故事了！

汉姆塔尔又说，他想，如果有一个亲戚来接您，也可以。我到这儿来只是送您上另一架飞机，离这里只有一百五十米远的那架飞机。十分钟后，它就起飞，去芝加哥。您很快就会到达芝加哥，见到阿特。

他的名字是阿帕沙德！

见到阿帕。

是阿帕沙德！

阿帕沙德。

他们还不够好吗？他们已经同化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那些和周围同化的犹太人吗？希特勒把他们全杀了。

那些不想同化的人也都被杀了，汉姆塔尔说。

施劳姆津仔细地打量着她，不明白这个孩子来这儿干什么。天哪，她已不再是个孩子了。他们都长大了！他们很快自己也要生孩子了！

她说：他们已经同化了。你听着，我现在马上回去。我要回家。

不，您不能这样。他正等着您呢。

好，我去。她站了起来。汉姆塔尔想让她坐下，但没有用。她大吵大闹，一边哭，一边绞着双手。她又吸引了一批新的观众。随后，她又坐了下来。汉姆塔尔跑前跑后，给她拿来水和茶。她还给施劳姆津买了一块三明治。施劳姆津尝了一口，就把它扔进垃圾筒里，她说味道难以忍受。简直太难吃了！然后，她们取了箱子，刚要走，她却又坐下来。已经晚了，飞机已经起

飞了。

汉姆塔尔考虑了一会儿，要不要给阿特打电话？她决定不打。她给他拍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新的抵达时间。她又跑去换机票，仔细询问有关情况。施劳姆津想：他是不是想杀了我？她买了保险，把亚哈国王列为保险的受益人，地址是撒玛利亚。她的签名是"撒玛利亚女王"。她不觉得这很有趣，她让汉姆塔尔解释她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汉姆塔尔说她自己刚才是在笑，可施劳姆津不觉得这有趣。没有人在我耳边笑过，她一边说，一边冲向另一个柜台，汉姆塔尔急忙跟在她身后。她又尝了一个三明治，又把它扔掉，然后让汉姆塔尔为她付钱。（汉姆塔尔的现金快用完了。）她宣布她要飞到芝加哥去，好好教训儿子一番，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然后，她们又重新坐在凳子上，她突然大声问：芝加哥？是不是美国蛮荒的西部呀？有很多反犹分子？

汉姆塔尔解释说，西部离芝加哥还有很远。

是不是还有那些暴乱，还有土匪和警察？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加利·库伯？

他是个演员，汉姆塔尔说，她快支撑不住了。她的脑子一片混乱，眼睛很疼。她盼望着飞机早点起飞。

我得小心一点，施劳姆津眼泪汪汪地说。她擦着眼泪，想起她自己的痛苦和儿子的偷窃。我有一个儿子，她说，而他不愿意见我。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你不是有两个儿子吗？

是的。

有一个儿子不愿意见我。我从一亿光年以外的地方来，可是他却让我失望。他过去曾在我肚子里。到他两岁的时候，他爸爸才肯认他。他们叫他"那个人"。这孩子忘恩负义。他不知道我为了他做了什么样的牺牲。我差一点就失去了阿东斯基的

同情。他自己的父亲不承认他。全家人,包括你妈妈,都不承认他。他在我房子里长大。我和他就像在城堡里一样被围困在里面。她说,他们想把他从我身边偷走。她的啜泣声在整个屋子里回响。现在,他看不起我了,还派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你知道吗?我可以去见他,但是他必须同意再变成一个犹太人!

可是,施劳姆津,他就是一个犹太人,汉姆塔尔争辩说。

真的吗?因为我是不会去希腊的。内海米亚有一次应邀去希腊,可是我不愿意去。那儿的人坏极了,每个人都是。你知道希腊人。汉娜和她七个牺牲了的儿子……安提奥克斯。当一个犹太人可真不容易。

是的,汉姆塔尔回答。

我也不会去波斯,那只会让我们想起那些恶棍。你还记得哈曼和他邪恶的儿子吗?维撒塔,最小的那个儿子?你可千万要小心。你敢肯定芝加哥没事儿吗?

百分之百肯定,汉姆塔尔说。

她最终乘上去芝加哥的飞机。只剩汉姆塔尔一个人,她头疼欲裂。她心里想:这个女人!她总是那么漫不经心地说出那些古怪的话。她总是举着如剃刀般锋利的长矛去见别人,粗暴地伤害人们的内心,强迫别人屈从于自己的思想。她知道施劳姆津那些话没头没脑,但是节奏分明,总是充满恶意,又总是愚不可及。这些话能产生强烈的效果,而且就像圣徒,语言大师,巫医,万众归心的政治家一样,产生不断的回响。

我告诉汉姆塔尔,英国人说,专制暴政的一个标志就是过度简化一切问题。施劳姆津就是这样一位迷人而可怕的暴君。

第二十章

阿米那达夫那时十岁半。有一天，他接到施劳姆津大舅妈的信，让他去见她。那时是夏天，天气很热。他骑着他红色的“波奇奥”自行车，而别的孩子骑的是“罗利”。他们的眼中闪着嘲弄和恶毒的神情。他心里想：为什么我没有骑一辆“罗利”，而骑了一辆法国自行车？他又想：可是我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退回到过去，随大流可是头等重要的事。他骑上了罗斯切尔德大道。

下午很热。海风开始吹了。他来到施劳姆津家。内海米亚出去了。马路对面的房子里，莫艾尔先生的女儿在弹钢琴。她弹的是肖邦的曲子。她可爱的双手敲击着发黄的键盘，背后是一个壁炉，镶着闪闪发亮的瓷砖，还挂着一幅哭墙的画。阿迪娜·莫艾尔的弟弟正在院子里和一个身穿外国衬衫的男孩打网球。

施劳姆津请他喝一点儿果汁，这让阿米那达夫困惑不解。施劳姆津舅妈为什么请他来？她为什么让他喝果汁？随后，她东拉西扯，旁敲侧击（就像爸爸所说的一样），最后，她拐来拐去，终于问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两个多月以来，她仿佛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小施劳姆津妈妈在雅拉的婚礼上打算送什么礼物？阿米那达夫假装说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心里想，要不

要告诉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她为什么这么急于想知道。

雅拉是施劳姆津的侄女。虽然她从1917年开始就和雅拉的爸爸极为疏远,但是她多多少少还承认雅拉。

施劳姆津舅妈说,雅拉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也不十分聪明,人们甚至不把她当做阿东斯基的后代。但是她心甘情愿地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现在要和一个本地的小伙子结婚。阿东斯基准备在他豪华的住宅(就在施劳姆津家对面)里为她举行一场婚礼。

阿米那达夫不知道小施劳姆津妈妈决定送什么礼物。但是,就是这一点他也没有随随便便说出去。他考虑是不是先编出个什么东西来,然后再告诉她真相,这样可以看看舅妈的反应如何。他早已亲身领教过施劳姆津刻毒的语言,她住在这所冷冰冰的房子里,管他叫"希姆哈"(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一位外祖父)。虽然他只有十岁半,但他懂得在施劳姆津面前最好三缄其口。不是施劳姆津,而是"大"施劳姆津。这不仅仅因为她比小施劳姆津妈妈大几岁,还因为他意识到她的确总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朋友推着自行车在雅尔公河边散步时,他说,她像一个高大的女祭司。

妈妈要给雅拉买双旱冰鞋,他告诉施劳姆津舅妈。

施劳姆津专注地盯着他,琢磨着他说的话。

她知道小施劳姆津妈妈是不会给雅拉买旱冰鞋的,因为她是在阿东斯基的家里举行婚礼。但是她知道,如果阿米那达夫说旱冰鞋,那就表示施劳姆津妈妈准备买一件很贵重的礼物。对阿米那达夫这样一个街头的捣蛋鬼,从移民营出来的流浪儿,一个当时穿着蓝色制服,满脑子共产主义思想的傻小子,有什么比旱冰鞋更能让他心动的呢?

哦,施劳姆津说。太棒了,阿米。那么,我就可以给她买一

个项圈了。阿米那达夫不做声，他知道狗才要项圈。大家都知道施劳姆津并不喜欢狗。瑞克斯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在阿米那达夫看来，她谋杀了瑞克斯，阿帕沙德的口吃也是她造成的。但是他和他周围的人常年和大施劳姆津周旋，所以他明白，如果她说项圈，那意味着她在考虑买一件引人注目的礼物，肯定能赛过妈妈的礼物。

回到家以后，他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施劳姆津妈妈问了他很多问题。她想尽可能弄清楚施劳姆津到底说了什么，她的语气如何，她在说项圈之前想了多长时间，她到底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她是说“买个项圈”还是说“给她买个项圈”？她说话的时候是站着还是坐着？

施劳米特婶婶也赶了过来。阿伯纳已经去海法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她让阿米那达夫详细描述施劳姆津是在什么时候说起项圈的。是在让他喝果汁之前还是之后？当他说妈妈要给雅拉买旱冰鞋的时候，她有没有眨眼睛？她有没有站起来，嘴里嘟嘟囔囔的？她的眼神很冷漠还是很温暖？她给他果汁时，她的原话是什么？

这场审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施劳米特婶婶和施劳姆津妈妈躲在一间屋子里，她们嘀咕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施劳姆津听到“旱冰鞋”的时候，她肯定认为小施劳姆津妈妈准备给雅拉买一盏灯。（她们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爸爸，他禁不住放声大笑，然后又告诉了阿米那达夫。）

为什么是灯呢？

施劳米特婶婶的推测是这样的：施劳姆津当然不会相信阿米那达夫知道施劳姆津妈妈到底想买什么礼物。如果他知道的话，即使他想撒谎，他也会说得更清楚。所以他一定不知道。那样的话，他不知道的事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她要买的是项链，还

是金表，或是家具。阿东斯基不会让希姆哈家任何人给他的孙女买家具。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也不愿意接受一件小礼物，给他孙女的一件象征性的礼物(毫无疑问，他还会散布一些谣言，而谣言肯定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那还剩下什么？家具？不会。金项链？不会。如果小施劳姆津妈妈准备买这样的东西的话，阿米那达夫肯定会知道(找珠宝商会成为尽人皆知的大事)，他会说一辆自行车，而不会说旱冰鞋。和金子有关的东西会激起他强烈的好奇心。由他发起的青年运动试图通过一种刻苦自砺而且绝对平等的新生活来拯救以色列，这场运动暂时压制住了他的这种好奇心。施劳米特婶婶的推理是：如果这种我们人人都有的，都被压抑的好奇心被激发出来，那么他会说自行车。谁都知道他做梦都在想要一辆黑色的“罗利”牌自行车，来代替他现在有的这辆红色的“波奇奥”自行车。有人曾偷走他的“波奇奥”，又马上还给他，还附上一封道歉信：您这也叫自行车？别的孩子都骑“罗利”，“罗利”是最好的。这辆“波奇奥”有什么用处？

上面都是施劳米特婶婶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她说“旱冰鞋”这个词对施劳姆津舅妈来说代表小施劳姆津妈妈要买的礼物不可能是金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家具，很可能是闪光的东西，但又不会是用来坐，站，躺的。考虑了这一切可能性以后，“旱冰鞋”又说明什么呢？

简而言之，施劳姆津舅妈猜想的大概是灯。

第二天，阿米那达夫听到大人在打电话，他这才认识到施劳米特婶婶实在是太聪明了。施劳姆津舅妈打电话问那夫塔里的白喉好了没有。

小施劳姆津妈妈说他已经好了，但是他是三年前病的，而且是冬天，不是夏天。

施劳姆津大舅妈对这些委婉的暗示无动于衷。她嘟囔了几句，说这种病是德国人带进来的。她又说：他们觉得阿帕沙德这个名字不够好。对了，拜格－拜格怎么样了？

你说的是谁？

拜格－拜格，施劳姆津舅妈回答说，他是塔娜的爸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吗？

从来没有，小施劳姆津妈妈说。

关键是拜格－拜格和人们在贝扎勒集市买的灯一样有趣。

贝扎勒集市不卖灯，小施劳姆津妈妈小心翼翼地回答。她又说：为什么突然谈起灯来了？

你听好，施劳姆津，施劳姆津大舅妈说。别带一卡车礼物来。阿东斯基不会觉得怎么样的，而且这也不会影响我准备留给你的遗产。别让那个小姑娘太高兴了。她很可爱，可是像我儿子的爷爷一样蠢。你也许不认识那个人，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和你混在一起。在特拉维夫和雅法所有的女孩中，你可是独一份呀！

你在说什么？

混在一起，施劳姆津大舅妈大声说，她尖利的声音满含嘲笑，令人恐怖。和你混在一起，就是引诱你的意思！如果你想赛过阿东斯基的话，一盏灯可没有什么用。雅拉不会高兴得跳起来的，别人也不会那么激动。比如说，阿东斯基把卡尔·奈特街上的一栋漂亮房子给了她，还有三套公寓房，都是在她的名下。当她那个傻乎乎的丈夫死了或消失以后，她的收入就够她生活的了。她的丈夫也许会成为德国人，为了歌德或者贝多芬而从事间谍活动，就像某个叫那夫塔里的人一样，他管我叫泼妇，可是他不知道我掌握的东西可够他受的。

谁的丈夫？施劳姆津妈妈吓了一跳。

她后天就要嫁的那个丈夫！施劳姆津大舅妈尖声叫着。这个新丈夫只是权宜之计，阿东斯基以后会给她找一个更合适的。她只好同意了，你知道。她谈起爱情就像我一样，就像一个真的懂得什么是爱情的人一样。阿东斯基说，那又怎么样？就这样吧。但是，那所房子在法律上是在她的名下。有一条清清楚楚的规定，她不得转让所有权。你可能也知道。

可是，灯是怎么回事？小施劳姆津妈妈问。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我没想买灯！

那么说，你是要买旱冰鞋啰，施劳姆津大舅妈说。然后她猛地把电话挂上。

施劳姆津妈妈给雅拉买了一部留声机。没有人想到这件东西。小施劳姆津妈妈拿八张工资支票作了抵押，才买了这部留声机。但是，效果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施劳姆津大舅妈从贝扎勒的集市上买了一张小桌子。她让木匠在上面钉了一个木杆，又让一个老电工把灯座从里面垂下来。灯一定不能露在外面，不仅因为它的颜色暗，样子古怪，还因为线路有问题。据施劳姆津舅妈说，人们只要看上它一眼，就会受到致命的电击。

人人都为这部留声机而喝彩。雅拉的丈夫围着它跳舞，好像它是一件印度的图腾。雅拉打开开关，有人拿来一张唱片，然后两支老歌开始在屋里回响。

那夫塔里想说服雅拉回家挑几张蒙特威尔地的唱片，但是施劳姆津大舅妈早已提醒新娘要提防那夫塔里，因为他是一个德国间谍，他总是一开始用唱片收买人，而最后把情报送回柏林。她说，我很熟悉这些间谍。问问阿东斯基，他以前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沃尔夫先生。他把瓦格那工厂的准确地址透露给法国人，结果法国人炸了工厂，炮弹还划过我的头发。

那时阿米那达夫还不知道五发炮弹的故事，但是他觉得有

点不对，于是问道：为什么德国间谍要把德国工厂的情报送给法国人，德国和法国不是在打仗吗？

他们一直是反犹分子，施劳姆津舅妈辩解说。他们都是，就像波斯人和希腊人一样。

阿米那达夫骑着自行车来参加婚礼。他穿着蓝衬衣和短裤。枝形吊灯在门厅闪闪发光。身穿制服的侍者端着盘子往来穿梭，盘子上是三明治和闪光的酒杯。这所房子看起来像一座宫殿，男士西服笔挺，女士长裙拖地。他在书上读到过很多关于这个正在没落的世界的事情，而且他穿着蓝色工作衫，骑着波奇奥自行车，终日与这个世界战斗。但是，就在这里，就在特拉维夫，这个没落的世界就在他眼前展现着。

所有这一切映衬在沙丘和狐狸出没的葡萄园的背景之下，显得异常古怪。乐队在演奏，客人在跳华尔兹和探戈。阿米那达夫躲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观察着，就像一根被随意扔掉的烟蒂。他盯着这些人，心里想：我眼前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呢？

孩子们往往会把自己想成另外一个人，他们会想他们所看到的是不是自己真的看到的。他们拥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品性。房子里人声鼎沸。来客中有英国军官，他们身穿白色军服，戴着各种勋章和缎带。还有从雅法、耶路撒冷、约旦河外，甚至贝鲁特来的富商。街上停满黑色的豪华轿车。司机在路边打牌。特拉维夫城中有声望的人都来了，他们的西服上还残留着卫生球的味道，他们的礼帽因为刚从箱子里找出来，还带着褶痕。阿东斯基神采奕奕。新娘的爸爸四处寻找施劳姆津，但是她故意躲着他。内海米亚一边喝着白葡萄酒，一边和一个英国人下象棋。那个英国人是这个政府或者是约旦河外地区的高官。雅拉光彩照人，她身穿白色的绸裙，裙子勾勒出她身体美丽的线条。阿米那达夫穿着短裤和蓝色衬衫，头发蓬乱，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小

施劳姆津妈妈正在庆祝留声机带来的巨大成功。施劳姆津则忙着告诉每一个人这台留声机是小施劳姆津妈妈从市长第赞格夫先生那里偷来的。市长这时已微醉,正动情地抚摩雅拉的黑发。她面色苍白,眼睛紧盯着她年轻的丈夫。

第赞格夫先生说他自己没有留声机,也从来没有过。但是,施劳姆津的话引起了几个阿拉伯人和一个英国人的注意。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一个英国女人突然跳了起来,冲向端着酒杯的侍者。她拿起两大杯香槟,一饮而尽。她脸色苍白,但是现在她的脸颊开始泛红。

雅拉的丈夫告诉每一个人:我有了一台留声机。

他喝醉了。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真的是他的婚礼。

早晨他本来先来到那塔尼亚那里,他喝了一瓶药水,然后坐在凳子上哭。他心里想:今天哪里会有晚会呢?他想起了阿东斯基,于是他带着乐队和香槟来到这个庆典活动中。他遇见了几个朋友,他认为他只是在学校的话剧中演一个角色。

他以为他演的是新郎,雅拉演新娘,阿东斯基演他自己,而拉比就是演拉比。

雅拉在新娘的面纱下哭泣。

她的丈夫第二天早晨会醒来,将会发现这并不是在做戏。他欠了债,娶了一位妻子。雅拉知道他将会是她第一任丈夫。她将会更爱她第二个丈夫。但是,她还是希望这第一个丈夫也能爱她。

雅拉渴望爱情。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会认识许多男人。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引诱她,只是为了让她相信,她一生中所遇见的每一个男人都应该给她一点爱。她非常美丽,极端堕落,又极端纯真。

直到今天，她还住在卡尔·奈特街的房子里。她很孤独。她从没去医院看过施劳姆津，她蔑视施劳姆津。施劳姆津把她所有情人的名字都先后告诉了她三个丈夫。施劳姆津对雅拉解释说，她相信他们都应该相互认识一下，因为他们彼此都有关联。

这是雅拉的第一次婚姻。她看上去容光焕发，又满含忧郁。施劳姆津向小施劳姆津妈妈暗示，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处女。

施劳姆津大舅妈连这个也知道。

雅拉的爸爸嘟囔着英语，到处在找施劳姆津。夜深了以后，他试图和总督夫人套近乎，但是被三个面相凶恶的侍卫给挡了回去。他们保护总督夫人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友善，令人难以忍受。

阿米那达夫一生也忘不了这种让他感到陌生的豪华场面。在尚未完工的建筑物的映衬下，这场面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无人居住的房屋，街上的游手好闲者，穿着短裤的希伯来警察站在阿兰比街上指挥交通，社会主义青年点燃的篝火。这些青年唱着歌：除旧，迎新。欢庆的场面无法让人缅怀正在崩溃的旧世界。人们殚精竭虑，试图在沙滩上建造城堡，试图营造新的废墟。这种努力既感人至深，又令人困惑。跳舞的人们略显疲惫，他们已无从分辨将要发生的事是不是只是电影中的画面，他们不知道舞台总监是不是准备挪动布景，留出一块空地，一片充斥着木板和背景的虚空。在阿米那达夫心中涌上一种受到挑战的感觉，一种挥之不去的光荣之感。他的人民永远不屈服，永远是那样坚忍，永远上演着他们自己古老而光荣的歌剧。

第二十一章

闷热的七天。干燥的热风从沙漠上吹过来，人们躲在屋里，把门窗都关上。街上的汽车裹在热浪里，树上落满黄色的灰尘。天上没有云彩。夜晚很凉爽，人们似乎可以在星空里漫步。施劳姆津舅妈把自己关在房里七天了，不听广播，也不看书。她喝冰凉的柠檬汁，想着已无人居住的院子。她看见一些发了疯的猫，有时在她的幻觉中，她看到绅士和淑女们从那所豪宅里走出来，在修剪整齐的院子里打网球。但是他们都已不在了。穿着短裙的秘书在装了空调的屋子里打字，给并不存在的客户写信。年轻的律师看上去一脸疲倦。房子周围长满无人修剪的灌木，草地也没有人浇水。施劳姆津正等着阿蒂·布兰德一家人。内海米亚已死了三年了。早晨小施劳姆津妈妈打过电话，施劳姆津舅妈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然后她猛地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阿特到了两小时以后，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阿特让我们赶紧去。他是两小时之前到的。他说天气热得不得了。他正和施劳姆津在一起，他急着要见家里人。他计划待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妈妈纠正他。

我决定待两个星期，他和妈妈说话时开始结巴了，语气里充

满疲惫。

我们下午三点到施劳姆津家。阿蒂·布兰德,他的妻子桑德拉,他们的大女儿和一对双胞胎都坐在阴凉的屋子里。美莉桑达留在美国。我们到了以后,阿特小声说他们只待两天。他面带羞愧地说,他们得回去,因为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必须回去。

这不是他的错。

屋子里看起来很拥挤,所有人都坐着,一言不发,盯着一个想像中的中心。

我们拥抱,亲吻,说了几句客套话,见了见孩子。我们吻了一下施劳姆津敷了粉的面颊,坐下,也陷入了难堪的沉默中。那对双胞胎在笑,他们讲英语,带着美国中西部的口音。桑德拉虽然没有流泪,看上去却快要哭了。

施劳姆津好像在凝视远方,她用手在我吻过她的地方使劲擦了擦。在阴影的映衬下,她看起来很可爱。内海米亚在美国上学时的一张照片挂在墙上。施劳姆津开始说话了,她在对我说话,屋里充满着紧张和压抑的气氛。桑德拉盯着阿特,阿特盯着地板。那对双胞胎咯咯咯地笑。妈妈倒了一杯冷饮,施劳米特婶婶给孩子们拿来点心,希望她们能喜欢她。可是,孩子们怕她。她有点生气,于是坐下来织袜子。

施劳姆津开始谈话。他是不是在跟我说话?

我的儿子,她说。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十五年了,也许更长。他来看他爸爸,只待了一分钟,然后就消失了。他没有来参加葬礼,但是他却来参加我的葬礼,就是今天,他指望得到一笔遗产。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他的情妇和他那些私生女也都来了呢?她们的长相都和我们家不一样。她们长得像谁?她们的日本爸爸?看看她们,阿东斯基的孙子孙女。听,她们只说英

语。他连一点点希伯来语也不教她们。为什么？过来，可爱的双胞胎。我——是——你们的——奶奶！

她们没有理会她。双胞胎的老大笑了笑。她的脑子也有点不好。施劳姆津说：到奶奶这儿来。她也许有东西给你们。她们没有动，她们只是在观察她。她坐的姿势像个主人（阿东斯基），像一棵老橡树一样散发出仇恨，将狡诈和恶意送到屋里每一个角落。我爱上你了，老妇人。她总是能敏锐地嗅到她的猎物，而我已经被她柔和而强大的魔力俘获了。她可以迷惑我，但是她无法征服我。她意识到我自己的价值，因为她自己身上没有。

她说：看看他的妻子，看看他给我带来了什么。他们很安静，他们刚来，可已经准备走了。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不好吗？因为太热了吗？难道芝加哥的天气好吗？它们冬天有暴风雪，夏天有热浪。谁都知道。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知道，阿米，从前有一个K夫人，住在雷霍夫·哈雅尔康。她的公寓里有四间房子，三个窗子朝着大海。这可不是芝加哥那里反犹太人的海，而是我们犹太人的海，就在特拉维夫……她在墙上挂满织物。希伯来语“挂毯”怎么说？我们不会说。真可惜，布格拉肖夫医生已经去世了。他什么词都知道。我是在他家遇见内海米亚的。那时可真激动人心，我们都充满希望。但是，对阿帕沙德和他妻子或者他们那对长得并不太像的双胞胎来说，可不一样。她们俩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第赞格夫不是想引诱我吗？你吓了一跳。他们都追我，甚至在内海米亚想把我儿子偷走的时候，他们也在追。我一直为我儿子和他们斗。现在他都掉头发了。他真逗。他长得不像我，也不像阿东斯基或者内海米亚。也许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他说话结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狗窝。他也许认为我现在住在那儿。他真没礼貌。他为什

么不给我写信？他为什么不爱我？你告诉我！……但是，那个女人，K夫人，她的墙上挂满了挂毯。红挂毯，带金线的。棒极了。我告诉你，她有的是钱。她丈夫在打仗那四年，一直把黑市上的肉卖给你妈妈。他卖给你妈妈，还卖给其他几个像你妈妈一样老实巴交而且腿长得难看的妇女……K夫人有很多钱，可她租了我们的房子，而她自己——阿米，听好了——她自己住在厨房的池子下面！真可怕。我经常去找她，我们一起坐在池子下面，聊一聊阿东斯基的马车或者她的第一个情人，一个英国军官，在阿克被愚蠢的恐怖分子杀死了。阿米，她真的是在池子下面生活。

妈……阿特想插一句。他的声音像是从无底的深渊中升上来的。

听着，她说，我在和阿米讲话，他没有从他妈妈身边跑掉。我告诉你：你别想偷走我的房子。我可是个穷人，又不幸又孤独，但我还是想办法攒了一点钱。阿帕沙德，亲爱的，我可不打算住在池子下面！……我要住在这里，一直到我死。这是我的房子，是阿东斯基盖的。内海米亚在这里种了树。听着，阿米，你这个人性情暴烈，但是还能让人接受；你不是特别聪明，可还算讲道理。明白吗？他们为什么这个样子？看哪，他们就会坐着，什么话都不说。孩子只会说英语。听着，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奶奶。我要给你们一点钱，作为礼物。看，她们还是不到我这里来。她们就会傻愣着。怎么啦？我的英语不好吗？我知道我不像我儿子那样是个美国人，我也不像她们的妈妈那样是从日本来的。他娶了她，她连饭都不会做。她有工作？她图个什么？她丈夫怎么办？她为我儿子做了什么？这难道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吗？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看看她！看看她的孩子。她们是她的孩子吗？也许是别人的孩

子。日本人像白人一样生孩子吗？……你知道我儿子是坐“五月花号”去的吗？他是乔治·华盛顿的后代！孩子们，告诉我，你们的爸爸是不是华盛顿的后代？

妈妈。

阿帕沙德。

我的名字是“阿特”。

我来告诉你你叫什么。你还没有皈依，这是你的出生地。

妈妈。

看看她，这个从日本来的人，她是个什么人？

妈妈。

阿帕沙德。

妈妈。

阿——

明天我们……

阿帕沙德。

妈妈。

阿蒂·布兰德一家在这间屋子里待了两天。桑德拉把在心中藏了十五年的话都对施劳姆津说了。她说的时候，施劳姆津像一个真正的淑女一样充耳不闻。她认为听一个彻底欺骗了她儿子的日本婊子说话，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

桑德拉结束她的独白以后，阿特嗫嚅了几句，然后招呼他的家人，一起走出屋子，来到热风扑面的街道上。他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两天以后，他像逃离火灾一样和家人返回芝加哥。施劳姆津舅妈称：是小施劳姆津妈妈说服阿特尽早离开的，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想让我妹妹汉姆塔尔嫁给阿特，或者做他的情人，以便可以拿到一些遗产。她说小施劳姆津妈妈、汉姆塔尔和我一分钱也得不到！阿帕沙德也别想得到一分钱！她说，他可以继承

这所房子，因为她五份遗嘱中有四份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他的大女儿必须给她写一封信，承认在她内心深处她仍然是一个犹太人。她必须说明她不会受她父亲的影响而背弃犹太教；

—— 阿特必须改名，改回他出生时的名字；

—— 桑德拉必须离开这个家；

—— 阿特的大女儿不能嫁给基督徒或黑人；

—— 阿特必须停止诋毁以色列；

—— 阿特家里每一个人用希伯来语给她写一封信，为所做的事情向她道歉。

我给阿特写了一封信。他的回信充满痛苦和无可奈何的幽默。他说他的女儿和一个年轻人生活在一起，但这个年轻人并不是犹太人，而且他女儿也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她是一个现代女性，大学毕业生，她对施劳姆津的房子毫无兴趣。她也不会给她写信。他自己也不会写。那对双胞胎不懂希伯来语。就是这样。

汉姆塔尔和她丈夫结婚已经十年了。当妈妈听说施劳姆津舅妈指责她想把汉姆塔尔嫁给阿特，就是为了得到她那栋摇摇欲坠的破房子中一些一钱不值的家当时，妈妈气得大叫了一声。只有在爸爸去世时，我才听到过妈妈这种叫喊。

第二十二章

又过了几年。上周，阿蒂·布兰德到了。妈妈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最终答应回来。

施劳姆津的头脑一日不如一日。她和现实日益疏远，她整天躺在床上，几个小时不停地啜泣，或者冲着鸟儿叫。

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鸟，妈妈信中这样写。

阿特到了。他看上去和从前大不一样。他现在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桑德拉在马萨诸塞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他的大女儿很快就要结婚了。他现在的妻子和他女儿差不多大。他看上去更沉稳，更单纯，既迷人，又令人困惑。他来是向他妈妈告别的。她可能只能再活一天，也可能还可以活二十年。她的身体并没有死，她只是变得很虚弱或者很脆弱。她的头发没有掉，她依然非常美丽。迄今为止，她仍然是我所见到的最美的女人。但是，她的思想与现实越来越没有关联，她抱怨说我们偷走了她的书、纸、铅笔和空气。

她被仇恨完全销蚀，但是她的仇恨如此古老，以至于她的恶毒显得有些不太协调。她眼中有一种东西正在熄灭。她被包裹在一种柔软而透明的苦恼之中。有时，她看上去像一个孩子，也许她很久以前曾经是这样。她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我们不知道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阿特给他妈妈带来一个镀金的鸟笼，里面是一只长尾小鹦鹉。他把笼子挂在她床头。护士笑了起来，但医生没有笑。他已不再给她做额外的检查了。这是妈妈要求的。他对施劳姆津恨之入骨，就是对阿特也是不理不睬的。

阿伯拉姆斯老法官这周去世了，我们去参加他的葬礼。他死以后，再也没有人了解我舅妈的财产状况了。阿特必须自己解决这个谜团。他和五个律师一起商量，他们扯着仅有的一些头发。没有人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小施劳姆津妈妈、汉姆塔尔、我的妻子和孩子、老纳忽米和我都去了阿伯拉姆斯的葬礼。合唱班领唱了传统的祈祷文。有人建议由我来为死者做祈祷，他们说我是死者的亲戚。

我为他祈祷。

他使花朵枯萎，他将罪犯送入监牢，而我的祖先既有花朵，也有罪犯。我是罪恶和美的亲属。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与施劳姆津大舅妈联系在一起，她那么美丽，又那么邪恶。

特拉维夫北部私人医院的收费又提高了。因为货币贬值和其他因素，现在的费用是一个月一万四千里洛特。阿特把鸟笼挂在施劳姆津床头。笼子里有一只长尾小鹦鹉，鹦鹉不会说话，它只会唧唧喳喳地叫。

她整天躺在床上，学着鸟叫的声音：唧唧，咕咕。

她还要在这里躺很多天，很多年，也许很多世纪。

鹦鹉有一天会死掉，另一只会取代它。有人会来管护理费的问题。纳忽米很快也会死去。他脸色非常不好，就是把他在阿伯拉姆斯的葬礼上安葬，也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他们都要死了。施劳姆津的房子越来越破旧。一切都令人很辛酸，很难过。阿特走了，我站在医院的大厅里。阿米胡德·米尔怀特来了，他想知道是不是……我告诉他，这要等五年到二十年。他赶紧走

了，可怜的家伙。

她躺在那里，像一座坍塌的宫殿，被毁坏的神像，划过她头发的炮弹宣告新千年的结束。她仍然像一个用泥土和人性做成的、充满邪恶之美的庞然大物。她像人造水晶一样纯净，她在无限的时空中漂浮，在绝望和光荣之中漂浮，那里住满各种各样的鸟，无时无刻不在鸣叫：唧唧，咕咕。